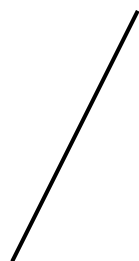




V - ECO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回归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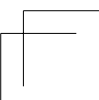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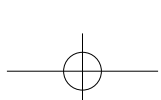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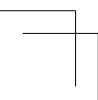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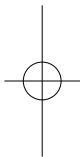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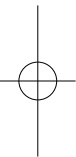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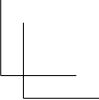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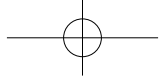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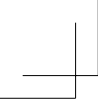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GO BUSH!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





V · ECO

生态环保 / 绿色建筑 / 可持续社区

Ecology, Environment, Green Architectur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2013年7月出版
Published in July 2013

出版支持：万科集团
Vanke Presents
制作支持：现代传播集团
A Modern Media Production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Published by China Youth Press

总策划：王石 邵忠
Publishing Directors:
Wang Shi, Thomas Shao

主编：欧宁
Chief Editor: Ou Ning
编辑：黄振伟 华健 顾明 顾湘 耿焱 朱喆
Editors: Huang Zhenwei Hua Jian Gu Ming Gu Xiang Zhi Ye Zhu Zhe
主编助理：徐荔莉
Assistant to Chief Editor: Xu Lili
编辑总监：韦业宁
Managing Editor: Wei Yening

上海编辑部
Shanghai Editorial Office

上海市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56层
56 / F, HongKong New World Tower, No.300, Middle Huaihai Road, Shanghai 200021
Tel: +86 21 63353637 Fax: +86 21 63353635

北京编辑部
Beijing Editorial Office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甲2号中国红阶大厦1座11层
11 / F, Tower 1, Zhongguo Hongjie Building, Jia 2, Gongtido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7
Tel: +86 10 65610550 Fax: +86 10 65610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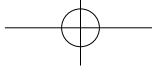
*

投稿邮箱 (E-mail): veco201306@gmail.com
微博 (Sina Micblog): <http://www.weibo.com/n/V-ECO>
博客 (Sina Blog): <http://blog.sina.com.cn/vecomagazine>
脸书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veco.china.39>
豆瓣 (Douban): <http://www.douban.com/group/v-eco/>



V·ECO 的印刷纸张来自获得 FSC™ 认证的森林。V·ECO 提倡你看完此杂志后与他人分享，此行动将有助于有限资源的重复利用。本出版物文字和图片版权受到保护。任何未经允许的复制、收藏和转译都将承担相关责任。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本书立场。

The V·ECO mook's paper is from FSC™ certificate. Please recycle this mook.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prior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Interviewees' views only represent their own positions.



Contents ● 目录

FEATURE



GO BUSH!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

深度



回归土地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REPORT ㄟ 报道

寻找乌托邦 ㄟ 欧宁 · · · · · 011

PHOTO STORY ㄟ 图片故事

丛林之路 ㄟ 朱锐 摄影 · · · · · 037

CASE STUDY ㄟ 个案

河岸社区：经久不衰的奥秘 ㄟ 徐轶婧 · · · · · 048
虹谷社区：共同产权、共识决策及可持续发展 ㄟ Robert Jenkin · · · · · 054
复兴社区：安那其实践 ㄟ Olive Jones · · · · · 061
地歌社区：生态环保设计 ㄟ 黄宁 · · · · · 068

PHOTO STORY ㄟ 图片故事

嬉皮岁月：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虹谷社区 ㄟ Robert Jenkin 供图 · · · · · 074

INTERVIEW ㄟ 采访

Robin Allison ㄟ 赵婷 译 · · · · · 087
Robert Jenkin ㄟ 周焰 译 · · · · · 089
Simon Jones and Carol Parkinson-Jones ㄟ 姚欣 译 · · · · · 090
Kerry Francis ㄟ 周焰 译 · · · · · 091
Malcolm Rands and Melanie Rands ㄟ 赵婷 译 · · · · · 093
John Ringer and Candace Bagall ㄟ 朱喆 姚欣 译 · · · · · 095



FURTHER READING 延伸阅读

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Tim Jones and Ian Baker 099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099

Permaculture One: A Perennial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s

Bill Mollison and David Holmgren 100

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Kathryn McCamant, Charles Durrett and Ellen Hertzman 100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部落生活：1970年代的复兴社区 John Glasgow 摄影 103

新部落主义 John Glasgow 116

XX

TOPICS

话题

) (

) (

FOOD 食物

大有机：从超市到农场 Michael Pollan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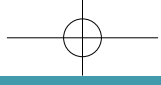
AGRICULTURE 农业

世界各地的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 138

XX

CONTRIBUTORS 参与者索引

ACKNOWLEDGMENTS 鸣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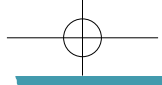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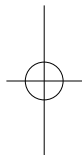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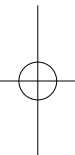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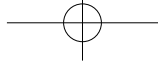
×

GO BU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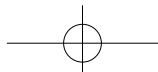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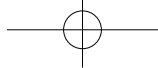


深度
×
回归土地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 新西兰另类社区寻访地图 ❑ The Visiting Map of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





北岛 ● North Island



南岛 ● South Is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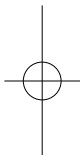
北岛 ● North Island

- 旺阿雷 ● Whangarei ● ❖
- 妈妈琪生态村 ● Mamaki Eco Village ● ❖
- 华伊普 ● Waipu ● ❖
- 地力提取公社 ● Earth Extract Ohu ● ❖
- 柯罗曼德尔半岛 ● Coromandel Peninsula ● ❖
- 猴人社区 ● Moehau Community ● ❖
- 兰努伊 ● Ranui ● ❖
- 地歌生态社区 ● Earthsong Eco-Neighbourhood ● ❖
- 奥克兰 ● Auckland ● ❖
- 惠灵顿 ● Wellington ● ❖

南岛 ● South Island

- 塔卡卡 ● Takaka ● ▼
- 尼尔森 ● Nelson ● ✕
- 复兴社区 ● Renaissance Community, aka Graham Downs Community ● ✕
- 虹谷社区 ● Rainbow Valley Community ● ❖
- 塔斯曼湾 ● Tasman Bay ● ❖
- 下蒙特雷 ● Lower Moutere ● ❖
- 河岸社区 ● Riverside Community ● ❖
- 黄金湾 ● Golden Bay ● ❖
- 奥塔哥 ● Otago ● ❖
- 达尼丁 ● Dunedin ● ❖
- 华伊塔提 ● Waitati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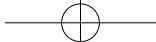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报道₀

R e p o r t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寻找乌托邦

● 欧 宁 ●

● 何处是桃源

塔卡卡 (Takaka) 是新西兰南岛城市尼尔森 (Nelson) 附近的黄金湾 (Golden Bay) 西南面一个小镇, 人口只有 1200 人左右, 我们的车在它的主路上呼啸而过时, 只看到一些分布稀疏的炸鱼店、咖啡店和一个规模不太大的超市。到达这里之前, 我们已开了一个小时的盘山公路, 它的出现, 标志着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

向西, 经过连绵的牧场和两座桥, 人烟越来越少。20 分钟后, 我们经过平原上最后一幢房子, 柏油路终止了, 接上了一条很窄的碎石路。它是依山开凿出来的, 没有路基, 没有护栏, 透过浓密的灌木丛, 可以看见右边一条河奔腾而起的水汽。手机信号消失了, GPS 无法使用, 路上没有人, 也看不见动物, 四周只听见河水奔突的声音。贴着山岩小心行驶, 我们的车犹豫起来, 不知是否走错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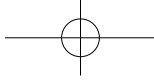
V



0

1

1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我们没有向导，谁也没来过这里。我们决定开回那幢最后见到的房子那里去问路。可是到了那里，叫了半天，没人。不久有一辆车从河谷方向开出来，停在房子前的信箱那里。“请问虹谷社区怎么走？”我们走上前去，车窗摇下，一个白发红脸老太太探出头来：“我就住在虹谷社区，刚从里面出来！你们就是前些天跟我们联络来访的吧？年轻人，要相信自己，往前走没错！”



我们这才知道几乎要到达目的地了。那条河就是在地图上看见的安那托基河（Anatoki River），它向东奔流，注入黄金湾。我们要寻找的虹谷社区，已经近在咫尺。迷路的恐慌顿时消散，我们继续前行，不久就看见成群吃草的奶牛，金黄的落叶在路旁层层叠叠，河雾穿透车窗，触手可及，继而又低低地飘浮在树林里，被夕照映成烟霞，空气清冽，沁入肺腑，斜顶木头房子在不远处若隐若现——我们以为身处仙境，直到车子在一块写着 Rainbow Valley Community House 的牌子前停了下来。

● 回归土地

1974 年之前，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叫格洛弗斯平地（Glovers Flat），地权属于 1940 年代迁来的 Holmwood 家族，他们曾在此开设一个锯木厂。1974 年，他们因要移民澳大利亚，于是把这块地放入市场抛售。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人 Jim 和 Lynn，他们的经济收入可能不足以参与当时美国风行一时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而且也不想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生养下一代，于是想到土地更廉价的新西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碰到有同样想法的另两对新西兰年轻人，Peter 和 Mary Jane，Bill Holloway 和 Carol Parkinson，他们一起用 25000 新西兰元购下了这里共 103 公顷的土地，并改名 Rainbow Valley，开始实施他们的嬉皮公社梦。



他们为此成立了公司，并平等持有股份。刚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只有几块根本围不住牛羊的围栏以及一间仅有三面木板墙的谷仓。他们住进这个谷仓里，头一个夏天就被当地报纸公布为“不合格住宅”，他们不得不与当地政府论战，并着手申请盖新的房子。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农场，以有机方式共同耕作和放牧，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采用共同抚养的方式，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期间有成员离开，也有新成员加入，所有关于公社的公共事务均采取“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形式来决定，因为要求每个成员都达成共识才可作出一个决定，所以过程极其漫长。但这种分享水平权力（Horizontal Power）的方式却作为公社的精神原则一直被坚持下来。¹



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结社行动，可以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回归土地”运动在新西兰这个偏远的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回响。“回归土地”的精神理念源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的平均主义（Distributism）思想：它试图发展出一条既不同于社会

1* 关于虹谷社区的历史，参考它的官网：<http://www.rainbowcommunity.org.nz> 以及 Robert Jenkin 的学士论文，“Shared ownership, decision-making by consensus, and sustainability at Rainbow Valley and Tui Communities”，新西兰梅西大学，2011，未发表。



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生产资料应广泛分配给普通民众，而不是集中控制在国家或少数资本家手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过度发展的消费浪潮，城市环境的崩坏，水和空气质量的恶化，能源危机，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失败感等等，引发人们向往自然和农村，寻找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可公平分享社会资源甚至展开民主实验的另类生活方式。²“回归土地”运动主张离城学农，在可共享产权的土地上进行环境友善式的耕作和放牧，在远离尘嚣的大自然中生养孩子，以直接民主方式培育和运作小型社区，把头脑中的乌托邦付诸实践，它和以嬉皮士为主体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互有重合，与平权运动、环保运动一起构成了六七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观。



“回归土地”运动在美国有本“圣经”，那就是对艺术和社会都有强烈兴趣的生物学家 Stewart Brand 创办于 1968 年的《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定期出版的目录主要推介各种产品例如衣服、书籍、工具、机械、植物种子等，涉及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学习、土地使用、住宅和园艺、工业和手工艺、社会交流、社区建设、流浪装备、自我教育等领域，帮助读者自己动手去发展富于创意并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人生活。这些产品的挑选非常严格和细致，反映出 Stewart Brand 想要以生态环保和社会公正的理念改变美国工业生产方式和消费者习惯的努力。它们大都是创新产品，不仅实用且有教育意义，物美价廉，并附有手绘的详细有趣的使用图示，读者可以不经出版人直接向生产者邮购，并且可以马上动手投入使用。Stewart Brand 不是以抽象的理论或口号而是以各种切实可行的工具把他那个时代的前瞻思想组合演示出来，为个人实践提供一个简单便利又包罗万有的“工具箱”，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目录旋即成为大受欢迎的行动指南，它在往后岁月的定期出版把“回归土地”运动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推至高峰。



史蒂夫·乔布斯 2005 年在斯坦福大学（Stewart Brand 的母校）的演讲中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非常精彩的出版物《全球目录》，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圣经之一，它就像今天 Google 的纸本形式，但比 Google 早了 35 年。”³《全球目录》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作为便利的搜索工具以及它对生产者 and 消费者之间沟通平台的搭建，更在于它极富创意的编辑方法背后所传达的社会思想和环境哲学。1972 年，新西兰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全球目录》（The First New Zealand Whole Earth Catalogue），它受美国版本的影响，但全部是本土化内容，随后在 1975 年和 1977 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本和第三本，成为新西兰本土的“回归土地”运动的吹鼓手。在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美国作为全世界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震央，它的每一个动静都波及到地球的其它角落。新西兰的民间反核运动（反对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和主张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反越战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和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与美国遥相呼应。而因为天堂般的自然条件和开明政府的支持，它的“回归土地”运动实际上比美国的更深入、更广阔也更持久。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²* 参考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ck-to-the-land_movement

³* 引自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Whole_Earth_Catalog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1974 年，在当时新西兰总理 Norman Kirk 的倡议下，工党政府颁布了 Ohu Scheme（公社计划，Ohu 是毛利语，意指互助友爱的生活共同体），以政策支持新西兰公民到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开展共同生活的公社实验。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当时新西兰各种社会运动所诉求的精神理念的认同，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年轻人积聚已久的反叛能量，减轻城市地区的就业压力。和美国一样，那时很多新西兰的中产阶级孩子，马上要从校园毕业，他们不想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到大公司上班，在城市中置业和成家，他们向往和主流价值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Alternative（另类）是他们的关键词，Go Bush！（到丛林中去！）是他们发明的更有新西兰特色的“回归土地”的口号。政府的“公社计划”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年轻社群中暗涌的“回归土地”的精神冲动，另一方面又催激它变成更大的潮流。这一年，有不少年轻人并不依赖政府支持，而是自发到偏远山区或平原农村地区觅地结社，虹谷社区正是其中之一。

● 梦想之谷

虹谷社区中心原是 Jim 和 Lynn 修建了一半的住宅，1977 年他们因为未能获得新西兰的移民资格，返回美国去了，留下它成了社区公用的房子。门前有大片开阔的草地，凹下去的地方砌了一圈石头，可以围坐起来烧烤或聚会，入口是洗手间和柴房，一楼是有壁炉的客厅和开放式厨房，一段用枯树枝做护手的楼梯通向二楼，是卧室。打开任何一扇窗，都是满眼的绿。屋内陈设全是手工打造的家具，那种随意和老旧的味道，与世无争的脾气，和城市流行生活趣味迥然有异。它有点像新西兰人说的 Bach，这个词是 Bachelor Pad（单身汉住处）的简称，指体量较小、外形普通、陈设简朴的房子，或偏僻老家的旧屋，因家庭繁衍、扩大、迁徙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变，变成旧物收纳所，或一年可能只用一次的家庭聚会、怀旧或度假的空间。



Bill Holloway，社区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当年的嬉皮，已届壮年，但身体矫健，仍葆活力。因为他的房子离社区中心最近，便过来给我们安排床位，点燃壁炉，告诉我们须自己开车到塔卡卡去采购这几天的食物。他说社区中心是成员们一起开会商议事情或聚餐的地方，偶尔也接待背包客（Backpackers），只收取非常便宜的床位费，一方面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补贴社区的公共费用。我们在厨房窗口看见一个本子，上面写着 WWOOFer Work Record（有机农场志愿者工作日记），WWOOF 是 Willing Work on Organic Farms（有机农场志愿工作）的缩写，WWOOFing 指在有机农场从事志愿劳动，WWOOFer 则指有机农场志愿工作者。Bill 说最近社区里正好有两个来自法国南部的年轻 WWOOFers，要在这里待三个星期，帮忙种菜、修水渠和打理花园，然后获得免费食宿。接待遥远他乡的有机农场志愿者，是虹谷社区与外界保持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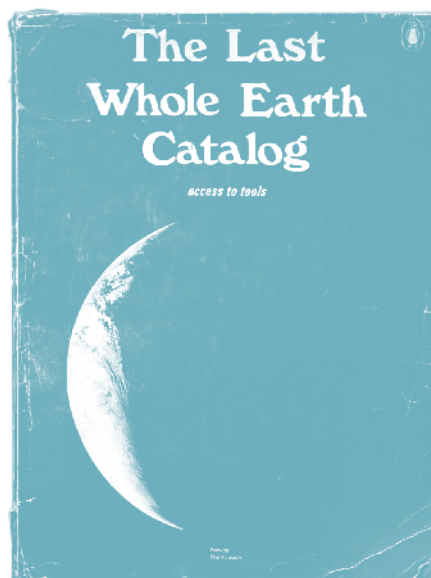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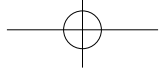
V



0

1

4



《最后一本全球目录》，Stewart Brand 编，1971 年。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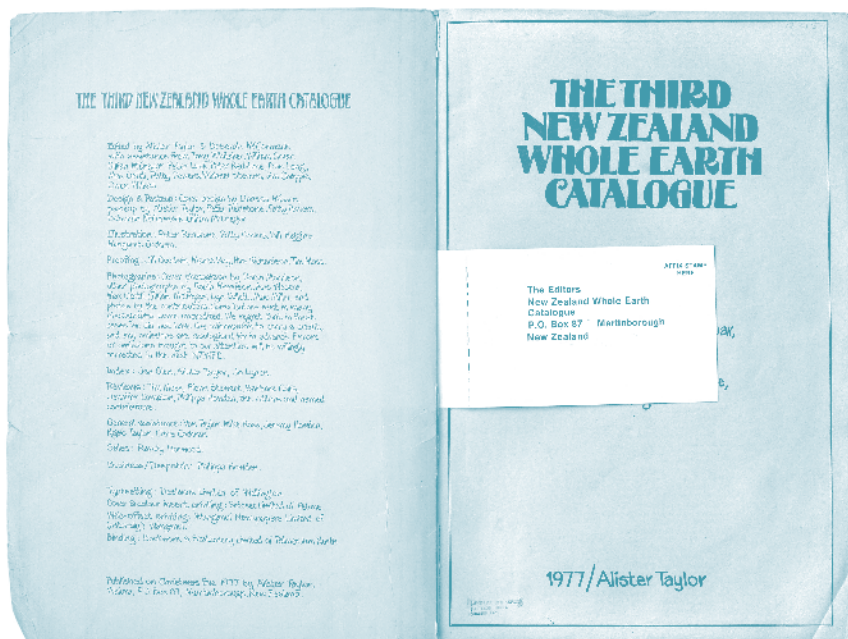
深度

REPORT



报道

《第三本新西兰版全球目录》，Alister Taylor 编，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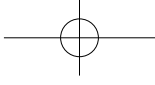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V

T

0

1

5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客厅书架上有许多影集，记录了社区从 1974 年至今的发展。有一张 Bill 拍于 1974 年的照片，他长发及肩，裸身在户外的浴缸中泡澡，他那时的伴侣 Carol Parkinson，给他浇水，胸前抱着他们的小婴儿。Bill 说他并不喜欢 Commune（公社）这个词，它给人很多误解，正如人们对嬉皮也有很多误解一样。有一部新西兰导演 Dan Salmon 拍摄的纪录片，故意使用人们的偏见来命名——《肮脏血腥的嬉皮》(Dirty Bloody Hippies)，⁴但实际上它采访了很多当年在新西兰的农村地区建立另类社区的嬉皮（包括虹谷社区的几个当事人），探讨他们对今日社会的正面影响，以此破除人们认为嬉皮只爱裸体和吸食大麻的偏见。在一篇谈及此影片的文章《嬉皮如何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中，Dan Salmon 写道：“40 年过去了，好的嬉皮思想，例如在地生活，养蜂，替代能源，拯救海鲸甚至农夫市集，已经行之日久，非常普及。”⁵

对于如何定义自 70 年代以来在新西兰农村地区进行的共同生活的实践，人们的确存在不同意见。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Lucy Sargisson 和美国圣路易斯密苏里大学教授 Lyman Tower Sargent 在他们合作的专著《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中列举了众多说法：Intentional Communities（理想社区），Intentional Societies（理想社会），Communal Societies（共同社会），Cooperative Communities（合作社区），Practical Utopias（实践乌托邦），Communes（公社），Withdrawn Communities（避世社区），Enacted Communities（制定社区），Experimental Communities（实验社区），Communal Experiments（共同实验），Alternative Societies（另类社会），Collective Settlements（集体聚落），Mutualistic Communities（互惠社区），Communitistic Societies（共产主义社会），Utopian Societies（乌托邦社会），Concrete Utopias（具体乌托邦），Utopian Experiment（乌托邦实验）等。⁶尽管这些定义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确切存在的某种特性——不过，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接受的是“理想社区”的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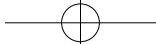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们遇到了 Robert Jenkin，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本由 Tim Jones 撰稿、Ian Baker 摄影、出版于 1975 年的书《难得的自由：新西兰的另类社区》，⁷这是两位作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走访新西兰各种另类社区的记录，和《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是目前仅有的两本相关专著。Robert 指着书中一个在森林里骑摩托车的长发墨镜青年说，“那就是年轻时的我！”1970 年至 1980 年间他在黄金湾地区参与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在 1974 年 Tim Jones 和 Ian Baker 为写书来到黄金湾时与他们相遇。1988 年他遭遇人生最大的惨痛，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丧生，在这场磨难中他现在的生活伙伴 Anne Taylor（在谷外给我们指路的那位）给予他巨大的精神支持，自此他们一起入住虹谷社区，成为永久持股成员。Robert 对地区历史非常有兴趣，他自学毛利语，1999 年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 1642 年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与毛利人在黄金湾的首次相遇。后又在梅西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2011 年完成的学士论文是对

⁴* 此影片完成于 2011 年，Youtube 上可观看：第一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bHkFjr_eo 第二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veD78wBa4> 第三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StUsmBXn8> 第四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QBhU-NpXdQ>

⁵* Dan Salmon, “How the hippies really did help to change our world”, *The New Zealand Herald*, Feb 13, 2011. http://www.nzherald.co.nz/lifestyle/news/article.cfm?c_id=6&objectid=10705881

⁶* 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Ashgate, England and USA, 2004. 第 2 页。

⁷* *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author: Tim Jones, photographer: Ian Baker, Hodder & Stoughton, Auckland, London, Sydney, 1975.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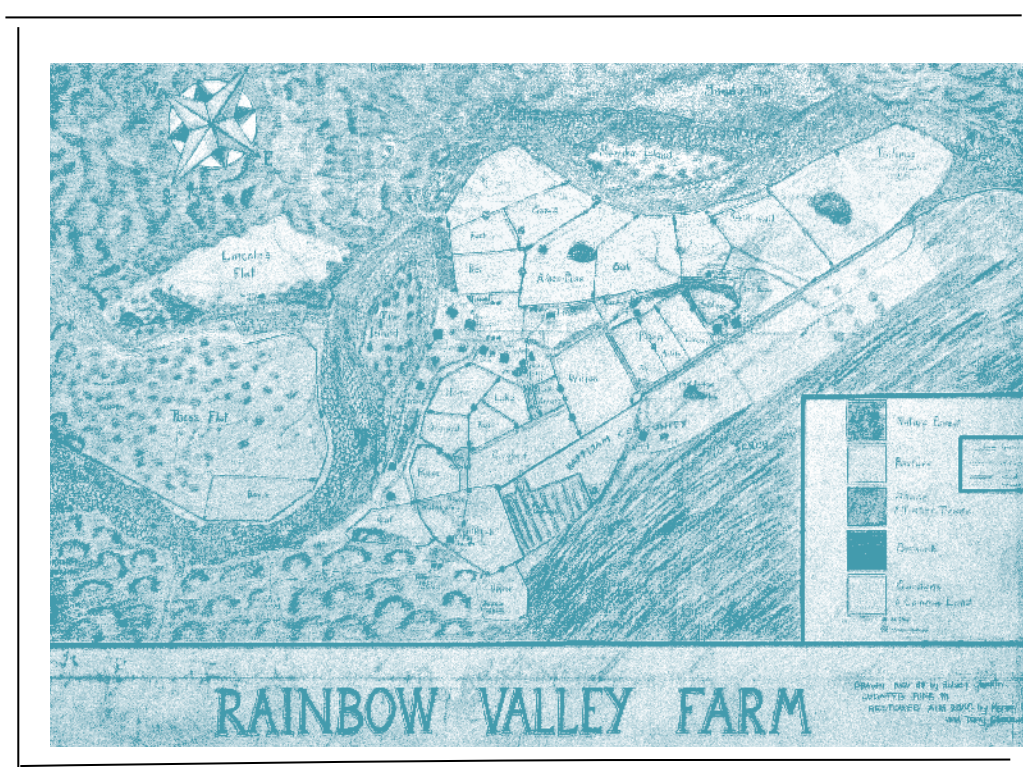
深度

REPORT



报道

虹谷社区的规划图。



V

T

0

1

7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虹谷社区和黄金湾另一个理想社区 Tui 的个案研究，2013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对新西兰理想社区的总体历史研究。



Robert 带我们去看社区的农场。农场面积有 37 公顷，其中草地用来放牧牛羊，生产的牛奶、牛肉和羊肉供社区成员自用，多余部分也供应给市场，部分土地用来种土豆、洋葱和其它蔬菜，还有部分用来种水果、坚果以及用作木材和柴火的树木。开阔的草地，偶尔点缀其中的牲畜圈，成群低头吃草的牛羊，路旁疯长的灌木丛和金雀花，几处散落的独幢住宅与远处的河流、森林一起构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景画。农场严格遵守有机的生产原则，尊重动物权利，不管是牛、羊、马、猪还是鸡，全部采取放养的方式，让动物获得安静和自由的环境。但它的收入一直以来并不景气，为了生计，1981 年社区成员又成立了一间公司，做负鼠皮毛加工，一直到 1986 年才停止经营，之后大家不得不到塔卡卡去找一些可帮补开支的工作。Robert 和 Anne 给我们看了几件遗留下来的负鼠皮毛大衣的样品，还出示了当年的邮购目录小册子，那上面的男女模特和他们的衣服仍散发着 1980 年代的时尚气息。



在河谷的一处高地，是社区成员 Simon Jones 和 Carol Parkinson-Jones 的家。Simon 是 Tim Jones 的儿子，Carol 和 Bill 分手后，和 Simon 在一起生活。我们去做客，那是一幢现代主义风格的山间别墅，刚建成不久，窗明几净，景观怡人。他们在尼尔森有自己的生意，儿子又是建筑营建商，和中国还有业务往来，经济条件较为优渥。Carol 是虹谷创始人之一，在条件艰苦的早期，冬天她经常跳到安那托基河中去“取暖”，让更冰冷的河水激发身体的抗寒机制，她笑称，“这是以毒攻毒”，一边给我们分享她自制的甜点。说起虹谷的故事，Simon 认为它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近 40 年，最大的原因是当初制定的社区组织架构：注册公司，公平持股，共享地权，共识决策。这个架构会跟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2003 年，经所有持股成员同意，公司改为信托性质，以此减低决策所需的时间成本，使社区在吸收新成员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2010 年，社区成员同意可以出租部分土地，也可以出售部分股权。目前社区除了 10 名持股成员外，还有 12 个非成员住户。“像 Graham Downs 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社区，之所以无法长久维持，就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组织架构。” Simon 的口吻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当年的嬉皮。



V



0

1

8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安那托基河湍急的水流，引领我们步入了虹谷社区那 40 公顷的森林。它毗邻卡胡朗吉国家公园 (Kahurangi National Park)，在最险峻的河段，社区成员搭建了一条索道，一个自制的缆斗可以把人送到河对岸，可是我们谁都不敢试。我们小心走在指定的步行路线上，树木藤蔓缠绕，水汽扑面而来，冷飕飕的感觉让我们胆战心惊。1860 年淘金的遗址，隐藏在森林中，已经被荒草覆盖。就这样摸索着，我们花了点时间才走到了自认为的“出口”，看见那里钉着一块牌子：eco-fragile, no horses (生态脆弱，禁止马进入)，才明白这是个入口，我们反着走过来了。因为长期的都市生活，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难得的自由：新西兰的另类社区》，Tim Jones 撰稿，Ian Baker 摄影，出版于 1975 年。

《难得的自由：新西兰的另类社区》一书收录的 Ian Baker 记录嬉皮士生活的照片。



V

T

0

1

9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刚才我们对神秘的森林心存恐惧，心想它应是强大的，可吞灭一切，可是这牌子却提醒我们，它很脆弱，连马走进去都是一种威胁。我忽然想到，其实所有建造乌托邦的梦想，也是很易碎的，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如果没有守持和变通，这些梦想也会化为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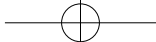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 白云之乡

新西兰地处太平洋南端，它最南的国土已快接近地球南极，在 1642 年塔斯曼发现它前，毛利人称这块土地为奥特亚罗瓦 (Aotearoa)，意为“白云之乡”。与其它大陆遥远的距离，以及“百分百纯净” (100% Pure，新西兰旅游局官方网站用语)⁸ 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最符合人们的乌托邦想象的地方。这里绵长的海岸可以接收丰富的海产，浓密的森林有狂野的动物世界，山中有未经开采的矿藏，平原地区土地肥沃，良性气候适宜作物生长，简直是一块宝地。荷兰人就像给纽约命名一样，参照他们原本属土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于是这块地方便变成了 Nieuw Zeeland。这样一个殖民色彩非常浓厚的名字，经历 1840 年归属英国，1947 年独立，一直保持不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新”字，吸引了更多人离开自己已经厌倦的故土，前来这里开创新生活。怀揣乌托邦梦想的人，更是趋之若鹜。

毛利人把这些外来者称为帕克哈 (Pakeha)，后来这个词便用来通称一切非原住民。早期殖民者前来拓荒，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购买土地，挖掘矿藏，清洁森林，焚烧荆棘和荒草，开拓耕地，建立家园，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还要承受孤独以及对原乡的思念之苦。可是他们筚路蓝缕开辟出来的新世界，却给这个地方带来很多问题：他们引进的物种打破了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他们的耕作方式导致这里土壤受到侵蚀；他们开荒拓地、建立城市导致森林滥伐、鸟类灭绝；他们所建立的经济制度以开发为导向，不顾生态和环境的代价；他们所采用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以确保宗主国的利益为原则，未能平衡同样生息于此的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虽然毛利人后来能以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的方式，争取到他们作为原住民的权利并促成整个社会对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但人们对于新西兰作为一片远离尘嚣、宁静美丽的人间乐土的想象已经大打折扣。

从 19 世纪开始，已经有很多帕克哈开始反思这样的问题。他们开始学习毛利人的语言和文化，思考毛利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领会他们朴素的生态思想，吸收他们共同生活的古老经验，并开始在一个小范围内探索与殖民体系或所谓的“现代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理想社区的实践从那时的零星实验开始，一直贯穿整个 20 世纪，更在 1970 年代达到高潮，并一直持续至今。这里面的参与者不仅有新西兰公民，也有北美和西欧地区甚至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毛利人虽然没有置身其中，但他们的文化和思想遗产却对新西兰两个世纪以来的理想社区运动贡献良多。毛利人最早在这里的生活，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体，土地和海洋和人之间是互惠共生的关系。他们尊敬土地如同神灵，多数

⁸ <http://www.newzealand.com/cn>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鸟瞰河岸社区，1979 年。



V



0

2

1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神话故事都与土地有关。他们没有地权观念，共同耕作狩猎捕鱼，互相帮助，分享收获，把所有自然资源都视为大家可以共享的东西，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上等同于公社，这种共同生活的文化成为后来很多理想社区实践的原型。



河岸社区（Riverside Community）是新西兰现存历史最久的理想社区，位于尼尔森地区塔斯曼湾（Tasman Bay）西南端的小镇下蒙特雷（Lower Moutere）附近的山谷里，1941年由基督教循道卫理教徒（Methodist）Hubert Holdaway（1896-1963）在自己的农场创立。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年，有感于轴心国对于其它国家领土的武力侵略比早期殖民者更为残酷，Holdaway联合几位对这场战争具有共同观点的本地教友，决定组成一个反战的基督徒社区。创立初期，社区由不同的家庭组成，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基本上不接纳单身男子和离异人士，妇女被要求只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Holdaway甚至反对妇女在外为薪酬工作，即便在社区内部也不例外。不过，因为早期不少社区男成员都因为拒服义务兵役被监禁，河岸社区的妇女在支撑社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有的妇女甚至也参与政治运动，在新西兰各地加入反战游行，代表社区宣示和平主义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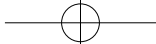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河岸社区也采用共享产权，共同劳动，共享收获和共识决策的制度。出于基督徒的仁爱，同时也学习毛利人的互助传统，社区还经常接纳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例如酗酒者和吸毒者），试图帮助他们改掉恶习，并为他们提供开始新生活的基本所需。这虽然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社区一直坚持。就像共识决策的方法虽然需要开无数次的会，进行无数次的讨论，过程漫长而痛苦，但这种分享权力的原则却一直不变。由于社区成员的努力工作，农场的经营非常成功，不仅可满足社区内部所需食物，更可供应周边地区和国内市场获取不错的收入，这为社区克服各种困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岸社区声名鹊起，吸引大批来自新西兰其它地区以及海外的新成员加入，因为历史条件的改变，它的宗教色彩渐渐弱化，开始转型为一个以合作农业为主同时反对竞争和暴力的和平主义社区。⁹作为新西兰现今年岁最长的理想社区，它仍然在运转，就像一块活化石，见证了个国家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再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

● 无竞争社会

当我们靠GPS指引一路寻找河岸社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河岸咖啡馆的牌子：它就在公路旁，被一条铁铸的青色飞翼龙用足爪抓起，竖在半空中，特别夺目。再往前几米，才是河岸社区那块比较低调的牌子。咖啡馆有一个前院，长满了爬藤、竹子和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植物。推开栅栏门，走过前院，进入咖啡馆，看见里面天花板、墙壁挂满了铁艺作品，标价出售，主要是用铁皮做的灯和雕塑，风格和飞翼龙相似，估计出自同一艺术家。后院种满了不同品种的大小仙人掌，很多是盆栽，可出售。我们之前联络

⁹ 关于河岸社区的历史，参考 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Ashgate, England and USA, 2004. 第 101-109 页。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Hubert Holdaway 是河岸社区创始人之一，这是他 18 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照片，1916 年。



Hubert Holdaway 在河岸社区嫁接果树，195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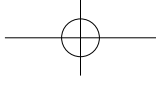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V



0

2

3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河岸社区，一直没收到回复。咖啡馆是社区经营的，只有一个姑娘在忙碌，她只在这里工作，不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事情知道不多，这天是星期六，她的经理也不在。我们只好自己走走看看。



咖啡馆旁边有个木头小房子写着 The Food Club (食物俱乐部)，门开着，没人。里面的农产品可谓琳琅满目，全部标价出售：河岸社区特制蜂蜜，500 克，7.5 新西兰元；有机辣椒酱，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150 毫升，18 新西兰元；有机斐济果酱，300 克，5 新西兰元……看来它不仅卖河岸社区的出品，也寄卖附近的农场的。再走过去是小小的社区办公室，门关着，门口信箱里塞着很多信和报纸。穿过一片开阔的空地，前面是 Che Vincent 画廊，门开着，也没人，里面的作品也标价，和咖啡馆的相似，不过除了一些铁艺，还有毛利风格的木雕。社区网站上说这画廊是 2012 年开的，Che Vincent 就是这位艺术家，他开始是和咖啡馆合作，现在自己开了这个画廊。



快中午了，我们回到咖啡馆，试了它的新鲜羊肉，社区自养的，非常可口，地道的“农家菜”味道。这儿没有 WiFi，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用 3G 手机上网细读社区的网站。¹⁰ 上面的内容非常简要，但有一些前面提到的两本专著没涉及的信息。比如说 Holdaway 当年拿出来的农场有 30 英亩，战后社区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再购买新地，现在连农场、丘陵山地和平地共计 208 公顷；在农场主业外，社区新增了咖啡馆、商店、画廊、社区中心（场地可出租）、招待所、梨园、有机花园等副业，所有收入按家庭人数分配，而不是按工计酬；社区的资产由信托基金拥有，房子和汽车均是公有的，社区成员没有私产；社区资金一般用来支付成员的保健、牙科护理、电力和电话费用，有时也支付教育和旅行费用；每个家庭有独立的住所，孩子可到本地学校入学或家庭自教；目前社区有 20 个成人成员，10 个儿童成员，每星期三下午都有一次社区成员的聚餐，有时也欢迎外面的来访者加入分享。



网站上声明社区也接受租户、访客和 WWOOFer，只是要限定人数；而对新成员的吸收，则要求非常严格。有意加入者要先非正式到访社区一次，可住社区招待所或露营，但农忙时除外；下一步是提交关于自己的背景资料 and 申请为期两周的正式到访，如果被批准，这次则可以住在设施齐备的独立住所，并被邀请到社区成员家吃饭，以及参加某些工作和活动；再被通过之后，可以申请预备成员资格，预备成员的观察期长达两年，在这期间任何私人资产均要被冻结，在社区中的生活标准与社区成员等同；社区希望预备成员能贡献自己的能力，但获得成员资格不一定与能力有关，而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可以接纳任何人；社区比较需要有农业经验的人；预备成员必须是新西兰居民。



河岸社区当初成立是因为反对战争，它的创始人们认为一般社会所鼓励的竞争其实是导致战争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们想在河岸社区实践一种没有竞争、只有合作的另类社

¹⁰* 河岸社区官网：
<http://www.riverside-cafe.co.nz>



会。这一努力一直贯彻在河岸社区至今 72 年的历史中，在一代又一代的社区成员中薪火相传。今日它不仅致力于争取和平、反对暴力，也关注新西兰本土和国际范围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议题，并且每年都捐款支持其它组织用于消灭贫困与苦难。尽管成员不断更替，但每年都会庆祝专门为社区创始人们设立的纪念日，并一直信守他们最初的理念：“设若一群人把他们的资源都集中起来，简单地合作和生活，他们定能创造出新的资源和盈余用于社会更大的利益。”



除了创始人纪念日，河岸社区每年还庆祝春分、秋收、冬至、毛利新年（Matariki）、复活节、圣诞节、国际良心拒服兵役日（International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Day）和帕瑞哈卡（Parihaka）国际和平节，有时还举办音乐节和各种工作坊，可惜我们一样也没赶上。午饭后我们继续向社区里走，经过草场，看见几只新西兰黑猪，又经过社区中心，看见一大群人在院子里聚餐。再往深处走，是更大的草场和社区成员们的住宅，都是自己动手建造的，因此风格各异。等我们折回来时，社区中心那群人已经进到房子里去唱歌。因为定了下午从尼尔森去奥克兰的机票，我们没有过去搭讪。后来才知道，那是社区组织的歌咏活动，黄金湾虹谷社区的 Robyn Holloway 也在场，她是 Bill 的太太，专门赶来参加的。“新西兰另类生活的圈子就这么小！”她说。

● 变化的年代

1950 年，新西兰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的人均 GDP 排名第五；2001 年，它跌到第 20 名。农业和畜牧业曾经是它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全国一半的出口总值依靠农牧产品，羊肉、奶制品和粗羊毛的出口值多年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近年来，农牧产品市场从英国转往亚洲地区，出现了不同的产品要求，羊毛和肉类的需求变了，物流中心也因为亚洲新崛起的经济体而东移，全球化经济格局的改变令新西兰的农牧业大受影响。政府开始削减农业计划，转而着力于把新西兰宣传为旅游者的天堂，开始大张旗鼓发展旅游业。新西兰旅游局把目光对准近年来崛起的最大游客输出国——中国，开始设中文网站，邀请大批中国媒体前往新西兰体验旅游，甚至协助姚晨在新西兰举办婚礼，试图以明星效应吸引更多中国游客。2013 年，新西兰移民局更给予中国游客两年内多次往返的免签证待遇，对去完新西兰旅游的中国游客，以 500 新西兰元的代用券鼓励他们参加对新西兰旅游进行评估的问卷调查——如此细致入微的工作，简直把中国人视为救星。



而中国游客早已臭名昭著。在古迹上刻画“到此一游”，到处高声喧哗，乱扔垃圾，在葡萄种植园和酒庄不懂装懂，在奢侈品店前大排长龙，在机场抢着退税……让他们蜂拥到新西兰的火山、森林、滑雪场或海滩，简直是场灾难。如果要保住传统农业，吸引外来投资进行高科技农业创新，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留住新西兰“绿色乌托邦”的美名，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V



0

2

5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则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如果要发展旅游业，则可能对环境生态产生破坏。这个两难处境已经上升为新西兰的政治议题，把这个国家推至一个充满争议的十字路口。一直以来，新西兰的理想社区都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种经年的努力已经帮助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要对环境友善、要发展生态农业、让人们可以继续在新西兰安居乐业自由发展的共识，而政府对此做得远远不够。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植根深远的反对力量，新西兰目前还不至于沉沦为 GDP 的偏执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中，新西兰居于第六位，仍处于前列位置。这个指数并不认为 GDP 是衡量人类发展的唯一标准，它再加上健康和教育两个要素，是综合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共三项计算出来的，而预期寿命一项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环境水平和宜居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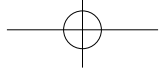
自上世纪 70 年代的高潮之后，新西兰的理想社区仍然继续探索新的模式。1995 年，一群更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开始计划新的实验。1999 年他们在新西兰北岛的大城市奥克兰西郊的小镇兰努伊 (Ranui) 附近找到一块 4 英亩的老果园，2000 年开始动工兴建第一批住宅，并命名为地歌生态社区 (Earthsong Eco-Neighbourhood)，2008 年完成了含 32 户住宅、一幢社区中心以及公共花园、池塘和果园的工程，共投入 1500 万新西兰元。¹¹和偏处农村的社区不同，这是一个在大都市地区进行共同生活实验的社区，以可持续的生态作为自己的核心理念，在建筑、设施、规划等方面既融合了不少传统的节能方法，也吸纳了很多新的环保技术。它采纳了新西兰理想社区通用的共识决策制度，但又在此基础上引入美国一些共同社区所发明的色卡表决方法（以不同颜色的卡片进行表决）。最为人称道的是它所坚持的永续农业 (Permaculture) 哲学，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通过注重生态环保的设计和工程，把建筑、社区和农业结合成一个和谐永续的生活系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把源自欧洲的合作居住 (Cohousing) 理念首次在新西兰实践，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个案。地歌生态社区是新兴的理想社区中最为著名的，它代表了新西兰理想社区运动在新时代的探索，在农业萎缩、旅游业狂飙突进、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的现实处境中，成了生态建设的一个夺目的样板，吸引了不少媒体报道和公众的参观欲望。因此社区一年设有 4 次开放日，由社区成员导览，和公众分享他们的经验。



永续农业的英文 Permaculture 由 Permanent (永久) 和 Agriculture (农业) 这两个词合并而成，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生态学家 Bill Mollison 与 David Holmgren 出版于 1978 年的著作 Permaculture One 中。¹²当时为了反对上世纪 60 年代所谓“绿色革命”推动的快速扩张而极具破坏性的“现代农业”，两位作者在书中创立了永续农业的学说，主张以最大的自然力、最小的人力去设计和维护一个具有多样性、稳定性和韧性的农业生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动物、植物、水、气候、土壤互相供给，一方所缺可以通过另一方的剩余获得，一个东西排放的废物可以成为另一个东西的营养，从而形成一个永久、良性的循环，而不像“现代农业”那样只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开始

¹¹* 关于地歌生态社区的历史，可参考它的官网：<http://www.earthsong.org.nz> 以及 Vivian Hutchinson, *How Communities Heal - stories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The Florence Press, 2012, 第 19 章。

¹²* Bill Mollison and David Holmgren, *Permaculture One: A Perennial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s*, 5th edition, Tagari Publications, 1990.



地歌社区买地前的航拍图及买地后的规划图。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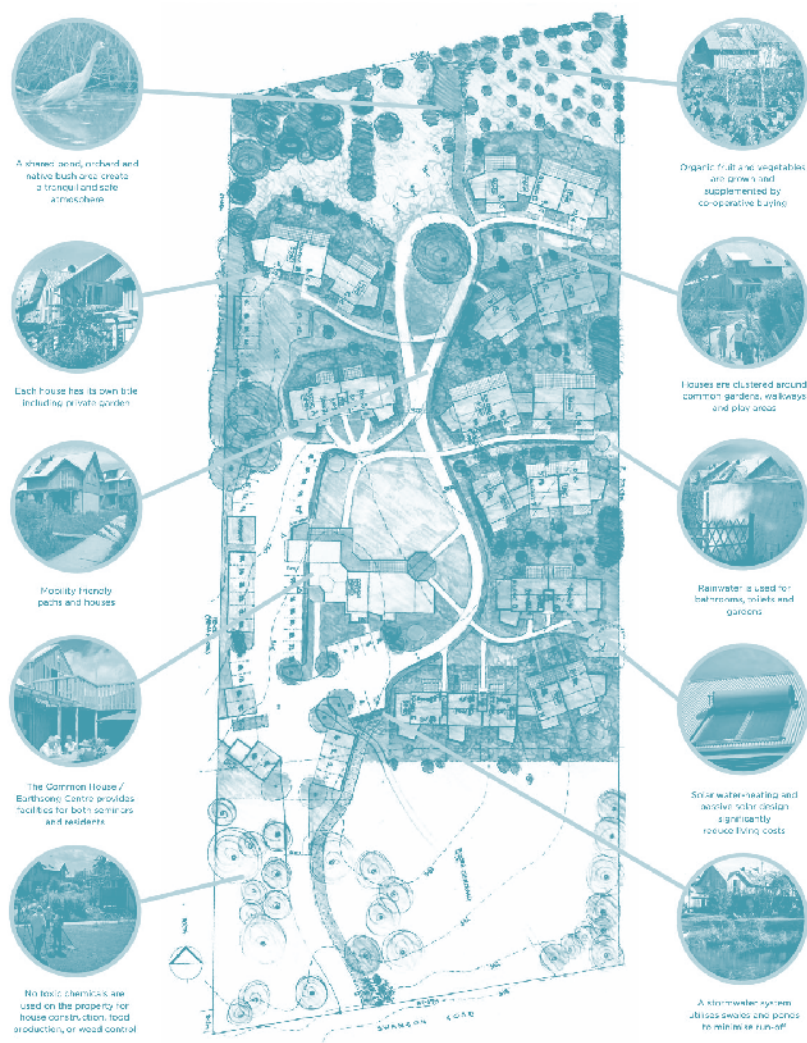


深度

REPORT



报道



V



0

2

7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于资源的投入，结束于产出和废物的排放。永续农业的思想不仅适用于农业生产，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建设，因为人也是生物的一种，社会系统内含于一个更宏大的自然系统之中，因此，Permaculture 这个合成词还隐含“文化”之义。它的核心价值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无论是经营一个农场，还是运作一个人类社区。¹³

而合作居住的概念最早则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丹麦。当时多数住宅区的规划都是以核心家庭（即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带孩子）为标准，没有考虑因为男女平权和离婚率增高而产生的社会变化，例如单亲家庭或父母都在外工作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在家无人照顾，这种缺乏社区共同生活的独户住宅无法令下一代健康成长。建筑师 Jan Gudmand-Hoyer 和作家 Bodil Graae 不满意一般城市住宅区这种疏离和陌生的氛围，他们向往一种类似乡村公社但又不远离城市的共同社区，这样他们仍可从事平时的职业并保持城市里的人际交往，于是他们在 1964 年与一批友人，在哥本哈根郊外买地成立了 Hareskov 社区，这个社区里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共享厨房、餐厅、洗衣房、图书室、儿童玩乐设施、花园等，大家经常定期聚餐、开会、共同讨论社区内的事务。它虽然因为本地人的反对而很快夭折，但 Gudmand-Hoyer 的一篇关于此次实验的文章《过时的独户住宅与乌托邦关系的消失》（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Utopia and the Dated One-Family House）却成为丹麦合作居住运动的精神种子。到 1990 年为止，丹麦共有 140 个合作居住的社区，每个规模多数在 15 户至 30 户之间。而在荷兰、瑞典、挪威、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大量这样的实践。¹⁴ 地歌生态社区综合了这些国家合作居住的经验和上述永续农业的思想，成功地在新西兰把它们付诸行动。

● 都市共同体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地歌生态社区邀请我们参加他们每周两次的聚餐活动。社区中心（他们叫 Common House，公共房屋）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开放式厨房，以及一个可容 100 人用餐的餐厅，餐厅门口摆放着标价出售的各种有机蔬果，包括茄子、甜椒、大蒜、红菜头、南瓜、猕猴桃、香蕉和酸橙。餐厅边上紧挨着一个小的会客厅，摆着许多沙发，厨房旁是洗衣房，里面有 4 台洗衣机服务整个社区（这比每户一台共 32 台要节能多了），还摆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洗衣房后面是客房，可接待外面的访客。外面有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凉亭，有一张大圆木桌和数把木椅子，走廊外面的草地上也摆着不少桌椅。不远处是一个生态干厕，用木屑和谷糠干燥粪便，再用作社区花园和果园的肥料。今天厨房里有 4 位社区成员负责做饭。社区成员自由组合成 8 个轮流做饭的小组，每组的 3 至 4 人，每月负责一次聚餐，包括拟订菜单、买菜、煮饭、服务大家用餐、洗碗和清洁厨房。大约 7 点钟左右，饭菜已准备妥当，成员们三三两两到来，开始排队领食物，有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有小孩，当中还有几个亚洲面孔。我们参与这次晚餐，每人要付 10 新西兰元。接待我们的社区创始人之一 Robin Allison，在门口摆出了一个牌子，说明我们今天会拍

¹³* 参考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maculture>

¹⁴* 参考 Kathryn McCamant, Charles Durrett and Ellen Hertzman, *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second edition, Ten Speed Press, Berkeley, California, 1994. McCamant 和 Durrett 合著的原版出版于 1988 年，第二版加入了 Hertzman 的内容。



摄照片和录像，如果有成员不愿意入镜，可以事先知会我们，充分显示对成员们个人意愿的尊重。

／

Robin 和她现在的生活伙伴 Amanda Garland 与我们坐在一桌。Amanda 是英国移民，她的祖母 Margaret (Peggy) Garland 是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上世纪 50 年代曾访问中国并与路易·艾黎 (Rewi Alley) 成为好朋友。Robin 大约 50 多岁，从小在奥克兰中心区长 大，后来离家去南岛达尼丁 (Dunedin) 的奥塔哥 (Otago) 大学读书，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回归土地”热潮中，19 岁的她开始了第一次的公社生活经验，她当时在达尼丁北部一个叫 Waitati 的村子买了个便宜的小房子和半英亩地，在那里住了 18 个月，参与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Co-Op)，帮助组织“春天音乐节”和参与当时新西兰另一本鼓吹另类生活的著名杂志《蘑菇》(Mushroom) 的工作。1977 年她离开新西兰前往澳大利亚、南美和欧洲游历 3 年，其中在伦敦工作了一年，这期间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25 岁时决定回家结婚生子。回到新西兰后她发现了自己对建筑的兴趣，于是再到奥克兰大学攻读建筑学。她的学士论文主要研究“边缘”，那时她已经接触到永续农业的设计理论，她认为“边缘”其实是一个可以发生多种连接和转化的空间，不同事物在这样的空间中互相联系，可以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生存系统。取得学位后，她成了一个全职的建筑师，同时抚养两个孩子。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她发现自己迷失了，孤独感越来越强，开始怀念早年在 Waitati 的公社生活。

／

有一天，她在一个妇女书店中闲逛，看到了美国建筑师夫妇 Kathryn McCamant 和 Charles Durrett 合著的那本被人称为合作居住运动“圣经”的书《合作居住：探索我们自己当代的居住之路》(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我完全被这本书的概念打动了，它仿佛按响了我内心所有的门铃，是的，我的心在说，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是的，我的孩子就是要在这样的社区成长！”说到自己人生的转折点，Robin 颇为兴奋。她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幅未来的图景，但不知如何把它转化为现实。1992 年，她参加了新西兰国内一年两次的“良心政治”(Heart Politics) 集会，认识了不少关注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家庭教育和社区建设的朋友，在他们的支持下，她开始有了创建一个生态村的想法。1994 年，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95 年她组织了从西雅图到访新西兰的生态村研究学者 Robert Gilman 的演讲和讨论会，从中学到了美国社区的色卡表决方法，同年她公开发起了征集志同道合者的活动。4 年后他们找到兰努伊的地，梦想开始呈现出它在现实中的雏形。

／

在晚餐之前，Robin 领我们在社区中走了一遍。社区取用围合式设计，周边通过植物与社区外的道路隔开，汽车不能进入，只能停在南边社区中心附近的入口，八组带小花园的二层联排住宅分散在东西两侧，把中央的大片绿地和池塘湿地围合起来，蛇形道路连通各组住宅和北边的花圃、果菜园以及专门保留的野生灌木丛，沿路通过植物的巧妙分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V

T

0

2

9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布形成富于变化的步行景观。公用绿地和花园里装有滑梯、跳床、绳球和秋千，供孩子们玩耍。所用建筑都采用本地无毒材料，绝不使用油漆等化学品。房子朝北开窗，冬天利用日照取暖，室外种植爬藤，夏天用以遮挡阳光，外墙使用夯土，冬暖夏凉。所有住宅均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社区共有6个混凝土水罐，用来收集雨水，用于卫浴和花园浇灌。因为有充足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住宅面积都不大，但户型能满足从单身独居（一个卧室）到多子女家庭（4个卧室）的不同需要。社区的规划和建筑设计聘请专业建筑师 Bill Algie 担任，Robin 负责工程的组织、管理、沟通和协调。建造过程困难重重，“日日夜夜我都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被两个世界撕扯，社区内部和外面的承建商。”因为社区成员间经常有不同意见，而传统建筑工业又不适应这种要求严格的生态设计，Robin 可谓绞尽脑汁。

尽管她不愿承认，但 Robin 其实担当着社区领导者的角色。基本上所有理想社区都主张平权，不设领导者，大家依靠共识决策的方法处理社区事务，但一个有说服力、能解决问题并肯担当的核心人物对于一个社区的维持和发展却非常关键。地歌生态社区以“新西兰共享住宅有限公司”的法人资格进行运作，对新成员的加入非常开放，不像别的社区那么严格，只要买房或租房就可加入，这样做的理由是让社区的成员构成在种族、文化和职业背景上更加多元化。Robin 是法人代表，她要照看社区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在不同背景的成员中营造共同的归属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我们谈论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时候，不单指自然生态，也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她非常看重每次的色卡表决会议和社区聚餐，当人人都在社区事务上体验到参与感，在餐桌旁发展出相濡以沫的友谊，这才是共同社区的真正价值。这天是一位因中风而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先生的生日，晚餐进行到最后时，大家给他送上蛋糕，并为他一起唱生日歌，颇有一个大家庭的气氛。我们买来的几瓶红酒不知不觉被大家喝完了，我们起身告别，在夜里开车，只15分钟就已经到达奥克兰市中心。

● 成与败

托马斯·摩尔最早发明的“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既是脑海中的理想之地，也是现实中的乌有之乡。尽管后来关于乌托邦的虚构或论述多如牛毛，但多数人都相信，这么美好的地方，在世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努力去寻找或建设，最后不仅会一无所获，还有可能导致“恶托邦”（Dystopia）的出现，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以及晚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2003）¹⁵都描绘了这种可怕的未来世界。新西兰的理想社区运动所寻找的乌托邦并不是宏大的国家梦想，而是一小群人在很小范围内进行共同生活的试验，努力让他们笃信的环境理念和社会思想能落地扎根，变成真正的实践。他们之中有失败的例子，也有成功的个案。这种进入现实操作层面的乌托邦探

¹⁵ 英文原版 *Oryx and Crake* 于 2003 年出版，简体中译本《羚羊与秧鸡》，2004，译林出版社；繁体台湾译本《末世男女》，2004，台北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索也许不是尽善尽美的，却是有益无害的。



地歌生态社区在完成它的基本建设之后，又成立了一个子公司——“步行工作（Walk-to-Work）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准备在社区通往兰努伊中心区的道路（地权属社区拥有）上，发展生态友好型的商店和办公室，与此同时，还准备把社区的成功经验渗透到兰努伊中心区。兰努伊中心区目前虽然有点破败，但却汇聚了不少创新组织和社会企业。Alison 已经与兰努伊中心区发展联盟中的许多商业用地持有者进行协商，再联合其它志同道合的机构，准备推动它的再生，把它建设成一个以步行为主、可连接不同社区、业态多元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郊区小镇。地歌离大城市近，创立时间虽晚，但观念新，比起在深山里少人问津的虹谷，或在农村地区与世无争的河岸，它不仅生存力强，而且雄心勃勃。



在奥克兰，住着不少当年理想社区运动的参与者。新西兰最大的环保家居清洁和身体护理品牌 ecostore 的创办人 Malcolm Rands 和 Melanie Rands 夫妇，1986 年曾在北岛的港口城市旺阿雷（Whangarei）东北部的海滩附近共 160 英亩的土地上，建立了新西兰第一个以永续农业为特点的生态村 Mamaki，在那里将近七年的乡居生活，孕育了他们以环保方式生产无化学添加剂的清洁护理用品的想法。ecostore 创办于 1993 年，它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产品很快获得消费者追捧，为减低运输所产生的能耗，Rands 夫妇于 2002 年把家搬往奥克兰并在那里开了第一个店，2006 年产品开始进入新西兰的超市，2008 年进入澳大利亚，2009 年进入美国，从 Mamaki 生态村出发的良心企业 ecostore，逐渐成长为国际品牌。



至今 Mamaki 生态村仍在，Malcolm 忙于为出版社写他的自传，同时打理越来越庞大的公司。“虽然事务繁多，但我们仍可以感觉像是活在极乐世界里。晚上在奥克兰跳上车，第二天早上就可在 Mamaki 醒来，没有人跑来跑去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像一条无所事事的狗一样在山谷和海滩漫步。”可是，他再也做不到当年建立生态村时的要求——在村里必须长居，不可只来度假。Mamaki 是“充满大爱的女神”的意思，Malcolm 在此收获了 Melanie 的爱情和 ecostore 快速扩张的事业。Mamaki 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在澳大利亚赚了点钱，然后周游世界，盘缠散尽，才回到新西兰，是一个令母亲忧心的浪子。在奥克兰的图书馆，他花了一个下午看完了一本关于有机生活的书，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然后就有了 Mamaki 的故事，而今日的 ecostore 只是当年他在 Mamaki 的另类生活结下的果子。



但也有很短命的社区例子。现在奥克兰联合理工学院（UNITEC）任教的建筑师 Kerry Francis 在 1974 年参与成立的地力提取公社（Earth Extract Ohu），是政府当年颁布“公社计划”时 4 个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的公社之一，当时他们选择了政府划定的 30 个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V



0

3

1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地块中的一块，位于奥克兰北面一个叫华伊普（Waipu）的小镇，共 39 公顷，初期连 Kerry 在内共有 8 位成员，其中 3 位建筑师，一位化学工程师，一位教师，一位艺术家，一位摄影师和一位男演员。因为这块地比较贫瘠，农业开发成本非常高，社区一直靠一些在奥克兰工作的预备成员的支持，但 1979 年社区遇上了财务危机，农村银行拒绝给他们贷款，他们不得不向当时比较成功的河岸社区举债，但河岸也没有余钱可借。到了 1981 年，只剩下 Kerry 一个人留下来，其他成员都走了。他给我们看一份 1983 年 7 月 30 日出版的《周末杂志》（Weekend Magazine）对他的采访，上面有他对政府的“公社计划”颁布 9 年后的评介，那已经是他在社区的最后日子了。



把 Rands 夫妇和 Kerry 介绍给我们的平面设计师 John Ringer，年轻时也是一个另类生活的热衷者。他曾自己创立公社，但没有成功，后在新西兰政府推行“公社计划”期间加入了北部的一个公社。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在 1981 年认识了现在的生活伙伴 Candace Bagall。Candace 是位于柯罗曼德尔半岛（Coromandel peninsula）的猿人社区（Moehau Community, Moehau 指生活在柯罗曼德尔半岛的原始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社区创建于 1974 年。那时的 Candace 还是奥克兰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和其他 54 个成员一起在半岛最北端买了共 1100 英亩的土地，在那里自主建房，共同耕作，设立录音室，举办音乐节，制作陶艺和铜雕。John 和 Candace 经历多年的公社生活后，对公社内部的冲突、无休止的争吵以及漫长累人的会议感到厌倦，于是决定退出。John 在奥克兰开了一间设计公司，Candace 服务于公共卫生行业，他们把家安在奥克兰西部的山区中，从奥克兰回到那里约需一小时的车程。



政府的“公社计划”有名无实（实际上 1975 年这个计划就结束了），划定的土地肥力太差，又缺乏贷款支持，Kerry 的社区自然难以为继。但像 John 和 Candace 这样的退出，则是很多自发的理想社区走向式微的主要原因。“像猿人这么大的社区，现在只剩下 8 位老成员还住在那里。很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共同生活，也有人是因为在公社内组建的家庭慢慢开始破裂，需要逃离失败的婚姻；更多人是因为随着年岁渐长，激情消退，要找新的工作谋生，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Candace 坐在自己家中的花园平台上，被阳光照得眯起了眼。说起往事，她有点儿感慨。“我们是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一代，年轻时参加过很多抗争活动，因对社会不满而选择走入丛林。那时的生活有苦也有乐，但永远值得铭记。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完全被消费主义席卷而去。”虽然她和 John 又选择回到城市工作，但他们改不了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习惯。他们的家在山谷下，有果园、树林和农场，和十多匹马和两条狗生活在一起。

● 越洋斐济果

斐济果（Feijoa）据说在新西兰非常普遍，寻常人家只要有空地、院子或花园，都会种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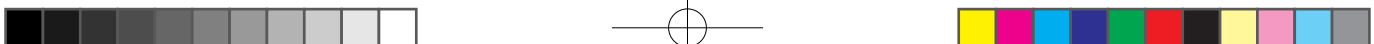
V



0

3

2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公社：另类生活社区》，新西兰国土调查局为“公社计划”（Ohu Scheme）顾问委员会出版的推广小册子，1975年。

1983年7月30日出版的《周末杂志》（Weekend Magazine）对地力提取公社（Earth Extract Ohu）创始人 Kerry Francis 的采访。



V
T
0
3
3



FEATURE



深度

REPORT



报道

5月正好是它的采摘季节，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 Rands 夫妇的公寓，John 从自己家的果园摘了一袋去看老朋友。它呈蛋形，两头尖，表皮绿色，非常柔软。John 从袋中拿了一个，用水果刀当中切开，给我一把汤匙舀出里面的果肉来品尝。非常多汁，香味芬芳，有点酸甜，极开胃。当 John 告诉我它的名字的拼法时，我才想起在河岸社区见过用它做成的果酱。知道我喜欢，John 在请我们去他家时又摘了一大袋，让我们带上飞机。一想着它非常脆弱易烂、难以保鲜且要跟着我们飞越太平洋，我就有点儿担心。



斐济果又名费约果、菠萝番石榴，原产地在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自 20 世纪初由中南美洲地区传入新西兰，找到它适合生长的气候，于是开始成为这里非常普遍的水果。在新西兰，除了直接食用外，它还会被制成果汁饮料、果酱、冰激凌等，还可以用来制作葡萄酒或苹果酒，也可以注入伏特加。早期殖民者喜欢新西兰这块土地，正是因为它什么都可以生长。理想社区这种事物，并非新西兰原创，但它从美国和欧洲引入后，比原产地生长得更为蓬勃。因为这几年我在安徽农村开展“碧山计划”的工作，做的好像是相似的实验，而这个工作又在奥克兰美术馆展出，所以便选择了理想社区这个题目来做田野走访。这些乌托邦的实践，就像斐济果一样，柔软易腐，保鲜期非常短，需要非常细心的呵护，才可经受长时间的越洋飞行。而到了中国，它是否适合朋友们的口味，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本来对 Graham Downs 非常有兴趣，但据说这个社区已经很少人住，加上时间有限，就没有列入访问行程。所幸 Robert Jenkin 与我们分享了 John Glasgow 拍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照片，那些裸身劳动的场面，正是对土地最彻底的回归。新西兰所有理想社区使用的法律框架和组织结构，不论是公司、信托还是基金，在他们的制度环境中非常合理有效，但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地权的处理，与大的政治制度相连，更是我们在中国无法实践的。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永续农业、合作居住以及生态环保观念的具体实施，还有小范围内的共识民主。后者不仅在理想社区广泛使用，更被成功引入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是一种鼓励人们直面不同意见，体验思想冲突，再以科学方法寻找共识，作出决策的过程，是分享权力的有效工具。以前我研究过它的细节，¹⁶但这次是亲身聆听用户体验。尽管它需要耐力，也可能很磨人，但它内含的精神非常神圣迷人，如同一颗斐济果，值得一尝滋味。■

2013 年 6 月 18 - 26 日，碧山

※ 感谢徐轶婧与朱锐的同行以及协助

16* 可参考拙文《自治：乌托邦或现实政治》，收入广州时代美术馆“自治区”展览出版物，侯瀚如主编，香港文化出版社，2012。第 28 - 33 页。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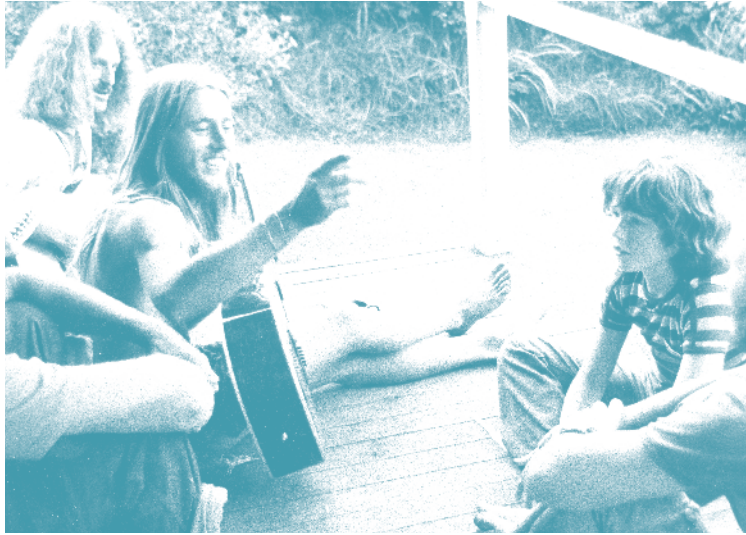


深度

REPORT



报道



1970 年代猿人社区的生活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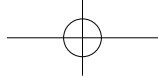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V



0

3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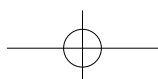
丛林之路

朱锐 摄影

P h o t o
S t o r y

图
片
故
事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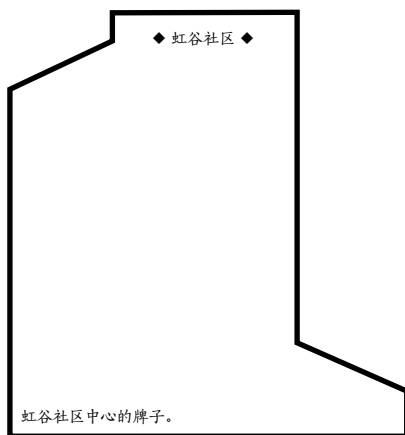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



1 虹谷社区中心的牌子。

V



0

3

7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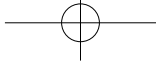
V

T

0

3

8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4



5



◆ 虹谷社区 ◆

- 2 植物掩映中的小木屋。
- 3 虹谷社区成员 Carol Parkinson-Jones 在劈柴为壁炉生火。
- 4 一匹马在河谷平地。
- 5 通往森林的小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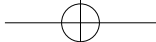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V



0

3

9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6

7



8



V



0

4

0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 河岸社区 ●

- . 6 河岸社区竖在公路边的牌子。
- . 7 河岸社区文化中心。
- . 8 社区成员的例行聚餐。
- . 9 河岸社区的一个成员在社区文化中心。
- . 10 河岸社区出产的有机洋葱。

\\ . 9

\\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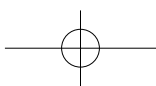
V



0

4

1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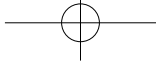
V



0

4

2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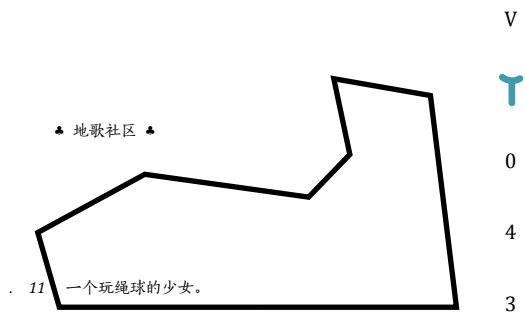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1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2

▲ 地歌社区 ▲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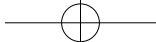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0

4

4

12 走在社区长满花草的路上。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V



0

4

5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 . 13

♣ 地歌社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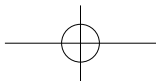
- . 13 社区中的生态干厕。
- . 14 地歌社区创始人 Robin Alison。
- . 15 地歌社区的例行聚餐，为过生日的社区成员庆祝。



\ . 14



\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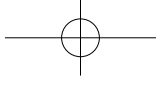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C a s e
S t u d y

个
案₀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河岸社区

经久不衰的奥秘

徐轶婧

创办于 1941 年的河岸社区 (Riverside Community) 是新西兰最老的理想社区之一, 由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以促进和平、互助合作、发展可持续生活模式的原则建立, 至今已在南岛尼尔森附近的下蒙特雷谷 (Lower Moutere Valley) 走过了整整 72 个年头。另类社区文化在 20 世纪新西兰历史中跌宕起伏, 这些社区充满热情、富有理想, 但能坚持下来的主要是少部分 1970 年代中期嬉皮士潮流下创建的公社和 1990 年代后以生态村模式为主的社区。1940 年代建立的河岸社区, 受到外部影响和内部矛盾的洗礼, 保留着初始的传统也做出过改变, 幸有宽广包容的河岸土地一路陪伴。

种下和平

塔斯曼湾环境优美, 气候舒适, 土地价格相对便宜, 吸引了许多理想社区在此创建。但与大多数后来到此聚居的理念社区不同, 河岸社区的成立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社区大部分成员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循道会会员。循道宗, 又称卫理宗, 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



宗派之一，认为传统教会活动方式已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问题，主张着重向穷苦的下层劳工阶级传福音，宣称求得“内心的平安喜乐”便是幸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几位志同道合的循道宗教友、和平反战者，坚信大家一起在社区的集体生活将能解决许多社会公正的问题，许多战争的起因也将消失，他们在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上，在下蒙特雷开始了一种以宗教为出发点的生活实践。他们为社区起了个顾名思义的简单名字，“河岸”，让人联想起那首黑人福音老歌：“我将放下负担 / 到河岸去 / 到河岸去 / 我将学习不再战争……”用现在的话说，河岸是个多么接地气的名字！在河岸的土地上，河岸成员种下了苹果和梨，种下了他们的社区生活，种下了善因——期盼人类和平的种子，种下了内心的平安喜乐！



几位早期成员在二战期间因拒服义务兵役，而被送往塔拉纳基（Taranaki）地区的拘留营，其中一位就是 A. C. Barrington（Barry）¹，新西兰著名和平运动家和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他于 1947 年带着妻子儿女加入河岸社区。他曾多次开着贴满反战标语的“和平大篷车”到处演说，反对战争和种族歧视。这些反战循道教友从暴力抵抗战争逐渐转向积极建立合作、平等、劳动的生活模式。他们的行为曾经不被社会认同，在二战期间直到战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社区的孩子们在学校遭到骚扰，这个与社会主流观念对着干的另类社区也经常被讥讽为住满了“血腥的（该死的）和平主义者”。



战争结束后，社员们终于能够松一口气，被分隔几年的丈夫们从拘留营回到妻子们身边。物质匮乏、缺少劳动力等等的难关过去，社区也成立了宗教慈善河岸社区信托基金（简称 RCT），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们买下附近土地，也清理出山丘空地。1946 至 1962 年间，社区添加了许多新的设施，将已经废弃的房屋再利用，重新开垦土地。1950 年代中期，河岸社区已经有 20 公顷果园，以及有 44 头奶牛、62 头猪和 800 头羊的农场。然而，社员人数却增长缓慢，到 1960 年代末，虽然有一些孩子和青少年，社区主要成员都是中年或老年人了。

● 天地所养

河岸社区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其成功的果园和农场经济。创办成员 Hubert Holdaway² 为社区贡献了 12 公顷的土地，同时也担当了组织指导社区劳动力的角色。在社区成立之前，Hubert 就已从事果园行业十多年，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



早在 1950 年代，河岸社区的果农们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从种植到采摘，从分类到包装，从储藏到运输的全过程。他们在果园直接使用蒲式耳箱将苹果打包，一年的箱子需求高

¹* A.C. Barrington 的简介可参考：
<http://www.teara.govt.nz/en/biographies/5b11/barrington-archibald-charles>

²* Hubert Holdaway 的简介可参考：
<http://www.teara.govt.nz/en/biographies/5h29/holdaway-hubert-reginald>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达 40000 个。有个相关的“灾难性”的小插曲：那年在一晚的暴雨后，社区的沟渠洪水泛滥，Hubert 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小桥上观看水势，突然看到大量苹果和箱子随波而下，流向大海。“不知哪个可怜虫今年收成不保咯。”正说着，一个带着编号的箱子大摇大摆地漂过，“H420！那是我们的！”原来那是堆放在 Patterson 门前正准备送到棚屋的苹果。



后来河岸购买了有气垫装置的挂车，每次能装大约 80 个蒲式耳箱的苹果，挂车将苹果运到棚屋再进行包装。50 年代末，社员们新添了传送带和分重机，提高了效率，后来又 将棚屋的木地板拆除，浇灌水泥，并购买了一部可以安装到拖拉机上的叉车，这样一箱箱苹果就能在一层层木隔板上堆高了。



社区的第一经济基础是苹果园，和大多以农业为基础的社区相比，河岸所产的苹果以售卖为主，而不是供内部食用。各种水果、蔬菜、鸡蛋等等根据需要分配，但有时社员也从外面购买本可以自己生产的食物，主要原因是大家忙于打理果园没有时间再照料菜园。大部分时候，由于季节性强，加上体力活繁重，河岸社区会依赖雇用临时工来分担果园里的活儿，对许多社区来讲这可能是致命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都需要现金来支付工资。河岸社区很幸运地与当地银行关系良好，得到足够的贷款支持，保证现金流的顺畅，在每年苹果销售季节资金回笼时再一次性付清。诚信健康的经营模式与专业果农生产经验相辅相成，天地所养已不是梦想，河岸社区像果园一样茁壮成长。少量不符合大小规格的苹果被放在大路边的小木屋里自助售卖，Barry 在这里放上和平主义文献和社区宣传单，慢慢地这里成了一个社区与外界的“接头点”。



成功的果园是社区坚实的经济后盾，但也引发了社区成员在两个问题上的长期分歧：其一，农作物多样化；其二，有机耕种。第一点相对第二点更容易达成共识，在兴趣和劳动力、知识的能力范围内，河岸逐步增加了奶牛农场和其它新的农作物。关于有机耕种的争执持续了多年，老社员担心支撑社区主要经济来源的原有系统的改变将会引发生存问题，而新社员其实不在乎有机食物生产过程多于社区本身，一直坚持要求改变。很长一段时间，新西兰苹果和梨商会的政策支持倾向于非有机的一方，而后来，随着使用农药对健康和环境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普遍，社区的耕种模式也慢慢地发生了转变。



从 1970 年代开始，奶牛农场成为了社区另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其面积相对增加，老果园的部分区域被改为草坪，一些剩余仍未被开垦的土地也被开发出来。同时，一小部分农场面积也被改为园艺用途，种植果树、柑橘、草莓。土地用途的改变并不是随便就能发生的，每一次的集体决定都经过了艰难漫长的过程。影响决定的因素有许多，当然，经济性很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比如缺乏管理投入，或者是有有机还是用惯常耕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考量。从 30 年前开始，在农场管理过程中定期使用 245-T 号农药是

V



0

5

0



能够有效控制金雀花灌木的常规方法，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只有每年彻底焚烧农场草原一次——并不是什么进步聪明的好招。最后决定停止使用农药，金雀花马上就疯长起来，社员们用断木拖拉机将灌木暂时控制住，又经过一段时间试验寻找替代方法，在没喷洒农药的三四年里，社员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冬季的数月里与大自然较量，铲除越界的坚韧灌木丛。



1980年代末的一次社员脑力激荡会讨论了社区产业多样化的问题：从经营一个老人疗养院到农业旅游，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东边新开第二个农场，饲养驼羊。在现有的农产品的基础上发展出副产品是个不错的可能性：制作水果罐头、果酱、果汁，或者为特殊市场生产有机干果，将新西兰的绿色食品出口国外。有些非农业的新产品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效果，因为个人能力和精力有限，同时需要社区集体足够的投资。身体力行的农事与社员们的原则和理念息息相关，为了细微的调整或者根本的质疑，大家开会讨论，共识决策。大家动脑动手，用心耕耘这片属于河岸的天地。

● 精神归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主流文化在新西兰风行一时。这期间共有 77 人加入河岸社区，带来了年轻的新鲜血液。许多的新社员并不在乎社区基督教和反战主义的起源。当时开放多元的社会大环境，分散了社区重要的宗教核心，也导致了新老成员之间的代沟和冲突。



河岸社区在创建之初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教社区，头 30 年，因为相同的信仰，社区的早期成员在相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过问题和危机，但都基本平稳度过。每天早上的晨起祷告，是社区集体性的体现，日复一日地，在无形中团结了所有单独的个体。同时，例行晨会会将一些社区小事有效地快速讨论并解决，而正式的社员会议则每个月才开一次。当“回归土地”的嬉皮浪潮到来时，这个已经成功运转几十年的社区吸引到的新成员，却认为 1940 年代激进的思想到了 1970 年代已经落伍。这是河岸社区新旧更替的时代，基督教特色逐渐消亡，到最后只剩下少许的精神诉求。这个过程中，有些创办和早期社员选择了离去，而留守的也慢慢被边缘化。社区创始时反战反暴力的核心原则虽得到了保留，但已不再是重点。



除了“外因”还有“内患”。人们明显感觉到，社区这时面对的问题比 30 年前创办时要复杂许多。那时，问题不过是解决简单温饱，不外乎是决定为漏雨的家庭紧急地搭建一个临时小屋，或者大家一起想办法攒钱购买辆农用拖拉机。现在社区的每个人都有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农场和果园经营顺利，一些体现价值观和原则性的问题却浮出水面：是不是该买洗衣机、地毯，或者一部时髦的照相机？虽然用从家庭津贴省出来的钱购买，但却极有可能触犯了集体的志向和理想。什么才是在土地上互助生活的必需品？当出现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V



0

5

1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多余的资源，多少应该投入社区长久以来坚持的对外慈善公益捐助，多少应该支持发展个人兴趣和专业追求？河岸社区是所有社员共同的精神归宿，但要所有人的理念完全一致不太可能，作为集体只能在核心信念共识的基础上（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求同存异。河岸随着社员们的加入、离开、老去、新生，时宽时窄，渐行渐远。

● 共同成长

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是从城市搬来的孩子，河岸的成长环境优势尽显：一个小孩，可以在木作工作室消磨时间，或者直接躺在草堆里看云彩，又可以到农场里跟着绵羊转圈，再长大一点可以跟着社区里的修理工学着研究摩托车或跟着专业的手工艺者学编织。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和同伴们一起去河里和池塘玩耍，河岸的孩子们自制了各式漂浮玩具，大家能在水里泡上一下午。有的男孩儿甚至还有玩具枪，由他们的反战和平主义父亲们制作。

在 70 年代以前，社区的孩子通过教会活动与外界社会接触。社区孩子在当地的小学和中学读书，一位下蒙特雷小学校长在 1975 年曾如此评价过：“河岸社区的孩子们的强项是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我们也在学校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在一个相对专制的气氛下其实很难鼓励言论自由。”与同龄孩子们的不同之处还有许多，比如午餐时社区孩子拿出家里烘焙的全麦面包素酱三明治，而其他孩子吃白面包配千岛酱和午餐肉。有个社区孩子发现她的大多数高中同学对政治毫不关心，也看不到别人的个体性，她觉得她的价值观和理念与她的朋友相距甚远。

很多河岸的青少年在社区里工作过，用他们赚到的钱去发展兴趣爱好，或者继续读书等等。1990 年，当时生活在河岸社区的青少年们曾回答过一份问卷，关于社区生活最棒的和最糟糕的事儿，以下是其中的部分答案：

最棒的：人们友善的态度和集体感；可以全职工作；社区提供的安全感，是一个很久以后仍可以回来的地方；可以随时使用社区的机器设备；有很大一片地可以做点什么；大家庭的感觉。

最糟糕的：在学校被找麻烦，被叫嬉皮；青少年参与机会不够；不管你做什么或说什么，在两天之内，不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河岸社区的每个人都会知道，而且都会提起；被太多成年人看低或看紧。

那年，青少年团体还提出过一些建议，包括：应该有一个青少年之家；提升音乐室的环境并让年轻人自己管理；除了农业或园艺之外应有更多就业可能，比如开始运营一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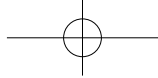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V

T

0

5

2



机餐馆；更多社区野餐和运动项目；社区该停止公益捐赠。当被问到“当你成年后是否愿意继续在社区生活”时，回答各有不同：“绝不”；“这是一个家庭成长的好地方”；“如果一个人的话我不会来这儿”；“等我老了我会回来”。也有人说他可能会到部分产权共享、部分劳动共享的其他社区去。



河岸社区成员 Lynn Rain 在《社区：河岸的故事，1941 - 1991》(Community: The Story of Riverside 1941-1991)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人类长久以来就一直生活在社区里——近亲远戚，村庄，部落，工艺行会。在工业社会里，许多原有的社区关系被打破了。人们生活在只有直系亲属的家庭里，从事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分离，与邻居要么互不相识，要么只是攀比新车或者境外游的目的地。但是，社区仍然能被找到：在酒吧和一帮酒友在一起，在城郊的咖啡馆里闲聊，在玩伴们的家长会议，在法律边缘的帮派。”³



而今，经久不衰的河岸社区有 208 公顷土地。仍然经营农场和果园，新增加了有机咖啡馆（当年年轻人的建议已经实现），雕塑艺术画廊、活动中心等。社员仍保留着共享产权制度，继续共同分担社区劳动，根据需要领取津贴，共享收获，并仍然共同决策。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和生长在河岸土地上的一切一起，进化演变，生生不息。■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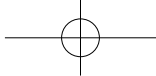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³* Lynn Rain, *Community: The Story of Riverside, 1941-1991*. Lower Mouere: Riverside Community, 1991. 第 6 页。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虹谷社区

共同产权、共识决策及可持续发展

● Robert Jenkin ●

作为稳定和成熟的社区，虹谷社区（Rainbow Valley Community）打破了之前的学者对于理想社区的断论。一位在《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杂志的撰稿人曾经写道：

“基于自由的社区必然会倒闭，通常在一年之内。如果社区想要存活，它必须是独裁的。一个独裁的社区并不能提供比其他传统社区更多的自由度。”如今虹谷社区已经历了将近 40 载。他们不但没有失败，反而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创造了新的自由。新西兰学者丽贝卡·里德（Rebecca Reider）曾经讲道：“共同的理想和愿景是很重要的开始，但是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有机体，人们在其中交往并且发展。”虹谷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由一群有共同理想和愿景的人发起的。他们倚着相同的目标，从自由市场、对抗性政治和消费主义分离出来。

● 共同产权

基于个人成长的社区并不是 1970 年代的新发明，这实际上是和 1649 年在圣乔治山（St.

V



0

5

4



George's Hill) 垦荒的掘土派 (Diggers) 的精神是一致的: 他们呼吁停止私人产权, 希望借此消灭暴力和战争, 他们的口号是, 地球母亲爱她所有的孩子, 如果人类能够节制, 她能养活我们所有人。大卫·比赛特 (David Bisset) 在《蘑菇》杂志第 8 期写道: “如果个人的工作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 而不是只为几个精英的最大效益服务, 那么整个社会和地球的关系就是建设性的合作利用而不是毁灭性的剥削。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地球是由人类的信任托起的, 而不是由任何人占有的。”



大多数被理想社区的生活吸引的人都排斥资本主义和唯利至上的动机; 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中产家庭, 都是满足父母期望的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 有良好的收入, 有明智的投资。但当他们年长一些, 观点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卡罗 (Carol), 虹谷最早的成员之一, 讲到她刚来的时候非常开心, 当时她内心总有很多纠结: “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人, 而且我非常个人主义, 所以和别人共享一块地方一点都不容易。我喜欢那片种植园, 但是我也想有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土地。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儿时接受的教育是截然相反的。现在我能够更尊重这种生活方式, 也更融入。”



在新西兰实践共同产权很难。一些社区也尝试了一些特别的途径绕过“限制性法律”。一般来讲多人共有的住房在理论上是非法的, 所以这些分享土地的人要特别低调, 以防受到制裁。虹谷在 1983 年之前一直都是这样, 直到黄金湾给他们“乡村公社”的名誉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虹谷的法律框架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共同拥有土地以减少经济风险。1993 年新的公司法使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更灵活, 并且其各个股东的角色也更清晰。虹谷所有常驻成员都是股东。根据虹谷原始的公司条款, 51% 以上的多数通过率才能决议, 但是最调整的条款要求 75% 的通过率。股东有权利出卖他们的股份, 但是不能够受到任何压力。直到 2010 年 51% 通过之后还可以出卖土地, 并且所有的股东都分利。



西蒙认为信托形式可能是社区最好的法律框架: “我们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这是运营公司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很多社区都有一个信托, 他们有两个层面: 信托, 主要是为了维护土地; 另外一个框架就是社区。信托是一个整体的宏观框架, 主要为了下一代维系土地。我觉得对整个社区来讲, 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构。”



将近 40 年来, 虹谷通过协议治理社区, 但是也有一些特例。离开的股东本应把他们的股份交回给社区,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最初这个规定是为了运营公司并且建立信托机制, 但是太难实施, 最后就搁浅了。大家的态度开始有变化。卡罗说她最开始不认为公司的运营形式能很好地反映他们的自我管理方式, 但是后来她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手段。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V



0

5

5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虹谷的一些区域实行相对灵活的“经理制”。公司开始对外出租已经快 34 年，股份也会和房租联系在一起。签订房租合同的人加入虹谷也算是加入成为成员。整个过程像是购买一个头衔。房子周边的土地会更私人化，并且界限也会更加永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与投资 and 继承有关。

大家希望离开的时候也能够把自己的股份卖到一个满意的价钱，并且老人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继承他们的股份，即使孩子可能都不回来。卡罗说：“我把自己看成房主，在卖掉我的房子和周围的土地之后我也可以获利。”如果父母有收入，他们的孩子也应该有。并且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有意向的人想投资，他们一定也会考虑回报，毕竟时代变了。罗宾 (Robyn) 说：“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从未考虑过保障问题。最后我们能获得什么呢？我从未想过！但是我知道有人想要。他们把它看做投资，而不是他们情感和躯体的一部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想，我能理解。”

共享所有权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经济体。会员决定加入的很突出的优势是价格。凯西 (Cathy) 讲道：“即使我们是需要投入一些资金，但是和买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房产相比，这简直是微不足道。”卡虎 (Kahu) 也说如果让她从无到有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她根本不可能享受现在的这种生活。凯西觉得没有房产并不稀奇。“对我来讲，整个土地所有权的概念都很奇怪。就好像，谁拥有空气？谁拥有水资源？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生活的星球。土地不是商品。土地是我们的家园，是整体的一部分。我对个人所有权没有任何概念。”

而罗宾和卡罗认为有所有权没什么不好。罗宾说：“我们拥有这片土地，我们保护和照顾这片土地。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拥有这片土地，我们为这片土地骄傲，我们为它负责。”

但是让虹谷感到不安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允许多建多少房子。这个数字会影响新成员的加入。白瑞 (Barry) 说：“今年我们的协议申请取消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已经在这个小气泡式的生活里过了 20 年，我们原以为只要我们需要更多的房子我们就可以申请建造。但是自从孩子离开之后我们的住房率已经降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大，有新的协议过程，还有环保法庭。我们的土地能建新房的能力十分有限。”

在虹谷，三套社区所有和两套成员所有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理由很现实。虹谷需要资金保证社区的日常维护：因为社区的房子开始变旧，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护；社员的年龄也开始变大，越来越不能自己动手。但是总的来讲，共同分享产权的优势远远超过缺点。卡虎说：“有无穷无尽的优势：抚养家庭，种植粮食，很多很多。通过一群人住在一起，分享土地，我们有很多收获。”卡罗说：“如果我离开一段时间，会有人帮我喂

V

T

0

5

6



羊。”安 (Anne) 也讲到，大家也都承担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能和兴趣，我们在不同领域协同合作。她说改变是必然的，她也接受这些改变。她说：“我们开始变老，也在试着应对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好事。”



学者马特·派瑞 (Matt Perry) 曾经提到成长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有革命理想的一代人有“过多的酸楚”。虹谷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这一代人。当然他们的态度改变是非常实际的，而没有太多酸葡萄心理。他们对曾经笃信的一些事情现在也都有一些不确定。罗宾说：“我曾经希望在我去世之后这个社区能一直延续，但是我现在的看法有一些不同了。这曾经是我的梦想，我们的梦想，但这可能就只会停留于我们的梦想了。我希望在将来它能一直存在，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一直让这个社区持续。我会在这里一直静候他们的到来……但是，我对未来真的不确定……”

● 共识决策

共识决议是一个集体决议过程，它需要不只是大多数的同意。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或者缓和反对意见。《韦伯词典》解释共识的第一个意思是：“大致同意”；第二个意思是“整体信仰或者情感的统一”。《简明牛津词典》的定义为：“所有相关因素的同意。”



虹谷目前由大多数的意见做决定。如果需要投票，75% 以上意见就可达成协议。罗宾说：“我们不是总能达到共识。如果遇到瓶颈，我完全同意用投票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停滞不前会对人有非常消极的影响。考虑到我们的年龄阶段，我们已经没有精力非要让所有人都同意，尤其是事情卡住的时候。”西蒙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追求共识。我觉得我们也不会致力于一直追求共识。”



学者欧立夫·琼斯 (Olive Jones) 认为很多社区最后倒闭的原因就是不能很好地调节争端。虹谷认为争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努力地追求共识。这也是它能够持久的原因之一。



卡罗认为：“只有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达成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对集体最好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时候，才会达成共识。”



虹谷有一个非常有黏性的小集体。他们一群 6 个人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圈子内，他们互相的信任度都非常高。圈子里的人说，他们自己本人和整个社区没有任何摩擦。罗宾说：“有时我会和其他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一直信任他们，所以我也听从他们的意见。当其他人都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就不会说出我自己的不同意见，因为我非常信任我的集体。最重要的是集体的团结。我从来不会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因为我不喜欢’，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当然，如果集体内的成员黏性太大也会有问题。集体决定可能会导致武断的决议，有时可能会失去创造力和平衡。黏性很高的集体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如果做得不好，共识可能会给人有压迫感，让人不得不同意他们不愿意同意的东西。曾经一位虹谷的股东离开虹谷之后并没有交还她的股份。多年之后她解释到她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同意一些决议。

虹谷每隔几个星期会召开一次团体大会。通常所有住在社区内的居民都可以参加。一般情况下只有所有人同意或只有一两个人不同意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决定。如果不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他们就只能投票。但是这种情况在虹谷很少发生。大多数的课题都很容易解决，但是有时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大家很难达到共识。一些对理想社区有兴趣的人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们很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有时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强烈的理想，一些争吵的缘由也是非常典型的。在这些时候达致共识就很难。大家必须开诚布公以表达尊重与信任，必须交流才能解决问题。虹谷的人不想简单地加快共识进程的速度，他们希望效仿毛利人的解决问题方式。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一直谈一直谈，直到大家都同意为止。

虹谷也会时常组织一些活动来促进个人增长和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活动是心理学舞台剧。舞台剧的目的是通过有创意性的戏剧手段叙事，帮助参与者重新思考及审视他们的生活。一般他们要求外来的指导员，这样大家都是平等地参加活动。指导员的费用也是由社区支付。

1983 年虹谷面临一次重大变革，当时大家不能达成一致。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柴油发电机是社区内唯一的发电设备。社区的皮革工厂需要在墙上安装电源线插头，并且年轻的母亲也希望能在家里用电动洗衣机洗衣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墙上安装电源线是非常实际的行动，但是有一位成员坚持不同意。后来大家的耐心都耗尽了，他们也装上了电源线插头。卡罗说：“一开始我们做所有事情都要所有人同意，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也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我们后来咨询了公司法，得知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也可以做决定。后来我们就决定 75% 的通过率。”虹谷渡过了这次难关，但是后来不同意安装电源线插头的那位谷员也离开了这个社区。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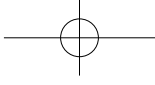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0

5

8

●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能够延续的能力，通常包括三层相关的方面：环境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如果一个社区要在经济上可持续，他们的会员就需要工作和收入。社会层面可持续的社区是平等的、多样的、连接的、民主的，并且有很好的生活质量。大家对环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最为熟悉。数十年来环境保护者和社会改革家都一直敦促大家减少消费，节约资源。我们整个星球的生态系统也受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丢失和环境恶化的威胁。除



非有资源的人士领导重要的变革，否则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是非常不可持续的。



这些忧虑带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简单化运动，还有后来七八十年代的深层生态学运动。如今的一些生态村看上去是想解决一些环境问题，通过结合简单化的生活方式和像永续农业（Permaculture）这样的综合系统以及类似太阳能的新科技。虹谷的改革者也要做出一些妥协。有的人也回归了他们曾经遗弃的旧有的消费文化。雪莉（Cherrie）说：“我曾经离开加拿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消费太多了。我不知道如何停止消费，所以就想重新开始。”但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容易。雪莉也看到了她身边的一些变化，工作在外的人们生活变得更富裕，时间更少了，他们时间少了之后就开始需要一些节省时间的器具和食物。雪莉说：“大家不再自己烘焙面包了，我自己也不做了。”1970年代的时候卡罗“对整个先锋时代都有非常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如今，她觉得自己也是“石油消费文化的一分子”，也享受着汽车的便捷。



西蒙回忆起早些时候自发的简单化生活曾经是虹谷的生活准绳，然而时过境迁，为了维持家庭，大家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在黄金湾很难找工作，即使有条件，也不是所有人都想靠政府救济。西蒙和卡罗一起建起了皮革公司，开始用负鼠毛制作大衣和其他衣物。后来公司关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保主义者反对毛皮衣物。这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到了城市里，一开始在惠灵顿，西蒙开始做房地产，卡罗继续完成她的学业。从1986年开始，事业发展成为他们生活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已经住在城市里十几年了。



经过将近40年的努力，虹谷的再生系统也日趋完善。安讲道：“我们早年种的树现在都可以投入使用了，我们可以用来生火或者盖房。这也像一个循环一样。”卡罗十分热爱永续农业，她认为这是用“最少的努力种出最多的果实，并且同时滋润整个星球”。西蒙讲到要建起好的永续农业系统会有很大的开销，然而不是所有虹谷内的居民都想获得更大利润。卡虎还是很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像其他社区一样，虹谷内的居民也都可以拥有不同的目标而和谐相处。虹谷社区农场的很重要的关注点是集体资源。他们有牛羊群、奶牛、一些山羊和猪。即使不是素食主义者，他们也都很关心动物福利。谷内的成员都十分喜欢家养的肉。种菜的成员就相对独立一些。



虹谷的成员都把各自当成是家里人。目前他们大部分是五六十岁。20年前孩子最多的时候有13个，现在只有一个。年轻人离开家让社区内的人非常忧伤，他们觉得和欧美其他的村子一样，他们的虹谷也变成了一个老年村。他们希望能够有带孩子的家庭搬入社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虹谷短暂地实行了这个政策，当时罗宾很支持，但是后来她对此政策也不大满意。她说：“有一段时间我认为，确实，我们需要年轻人薪火相传，但是现在我对年轻人很失望。我很少见到有年轻人像我们当初那样认真，能够带领我们前行。”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V



0

5

9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现今的年轻人可能对社区生活不太感兴趣，或者他们更喜欢主要由同龄人组成的社区。西蒙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他相信允许私人所有权的生态村也许会吸引更多年轻人。他说：“在我看来这一二十年来开始有一些变化。原来的回归土地运动开始慢慢转化成了生态村运动。他结合私人所有权和社区生活，这样能够吸引更多人。”他希望新人能够带来新的青春活力。

作为年轻的改革者，虹谷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摒弃了主流文化。西蒙说：“我们曾经总谈‘要过更好的生活方式’，现在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是住在社区。”但是他现在年龄大了，视野也宽广了一些。他说：“我对社区的看法也变了。大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社区。一些人对住在黄金湾的社区有很大的认同感。”虹谷体会着自身的老龄化。卡罗也感同身受：“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更少的精力，当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我更多地想知道别人的事情，但是后来开始更关注内在。”卡虎说：“年轻的时候我刚来，意气风发，但是现在我们老了，也没有精力了。”年轻人会想和孱弱的老年人一同分享土地么？或者这些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花甲老人会想让他们分享他们的土地么？

虽然虹谷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但是并非所有的理想都已消退。早期的掘土者在 1649 年就做出了他们的探索，并且至今还有很多现实意义。凯西说：“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就是总有一些边缘人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不代表整个社会都会发展成我们这样的社区。但是总会有机会，因为总会有先锋人士。”

※ 本文由赵雪节译自 Robert Jenkin 在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学士论文 Shared ownership, decision-making by consensus, and sustainability at Rainbow Valley and Tui Communities, 2011 年。经作者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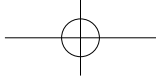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V

T

0

6

0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复兴社区

安那其实践

● Olive Jones ●

雅卡夫·欧弗德 (Yaacov Oved) 在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建立另类社区的年轻中产阶级时说：“他们以一种近乎幼稚的方法去探求人的本性；他们相信离开传统美国社会和文化，驻扎到另一个不同的人文系统之后，很多事都将有所改变，社交生活更会焕然一新。”其实新西兰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复兴社区的发展历程正鲜明地呈现了这种天真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2009 年，复兴社区 (Renaissance Community, 又名 Graham Downs)，以纪念它的创办基金“复兴信托基金”而命名，度过了第 30 个诞辰纪念。相对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新西兰另类社区，复兴社区的独特之处无疑就是它的创办人旗帜鲜明地宣布要尽可能打造没有束缚感的生活，每个想要在此居住的人都能乐在其中。尽管过程中仍有很多人连年不断地谋划着要“掌管”，但最终还是秉承这一宗旨长久发展。整个社区的组织架构简单且随性，没有公认的领导或是掌权，在财务、劳动付出、成员责任等问题上也没有强制的要求。尽管门户开放和松散的管理也会带来各种问题和矛盾，然而，复兴社区在

V



0

6

1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理想社区中仍属罕见，不单单是它开放的政策和无政府主义（安那其）的框架理念，还因为风云变幻，它始终顽强不屈。

● 最初的梦想

复兴社区的创办者们早在 1974 年便开始尝试一种公社化的生活模式，塔胡纳农场（Tahuna Farm）成了他们理想家园最初的实验田。这块 4 公顷的农地位于尼尔森（Nelson）市郊野，被蓬勃的城市化发展所包围：西面是工厂和未开垦的土地、南面是分割成小块的房屋搭建用地，东北面是早已建成的住宅区。整个社区由一个旧的农舍和被树木笼罩的农场外屋组成，其中的一大半都是开放的牧场。农场里没有电力和排水等都市生活的配套设施，这给对 19 世纪传统农业感兴趣的人们创造了一种农村生活体验：用驮马代替拖拉机，用原始工具代替现代器具。正因为决心过一种远离城市的生活，所以创办者们对“伟大的现代化事业”抱有更独立自主且超凡脱俗的态度。

当时创办者们对于生态运动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城市化这项“丰功伟业”是腐朽的，全社会处于过度管制的状态，资本主义是金钱至上的不合理不公平世界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要创造另一个世界，以不同的方式生存，抵制贪婪的物欲，从而获得真正的个人主义的新生。塔胡纳农场的生存理念为复兴社区定下了扎实的思想基调。作为社区早期的灵魂人物，托比（Topsy）的话代表着所有成员的心声，“我总是不断地反抗现实，去寻找生命的奇遇，而且一直深信革命是最棒的探险……其实，我知道社会是个怎样的东西，只是我不能好好地对待这种苟延残喘的日子。我想着拥有一块不受资本主义干扰的土地。为此，有两件事让我热情洋溢，筹划一个公益基金用于购买土地，赚些钱，同时不要为那些劳务缴税。”

在当时的环境中，创设“复兴信托基金”（Renaissance Trust）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保护土地而形成一个合法的法律实体，绝不是为了建立管理或支配的组织架构。创办人们的初衷是要在郊野大规模地劳动，但这个简单的愿望要获得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由于 1970 年代晚期工业发展的加剧，在塔胡纳生活的农民日益受到了驱逐，渐渐地，社区中有人产生了想卖掉这片土地的主意。另外，农场与当地政务部门的矛盾也更为激烈，议会要求农场遵从地方法规，包括限制农场人数、拆除非法房屋、和市镇排污系统对接，这些举措都在暗示塔胡纳农场的生存危机已经来临。

从塔胡纳农场的原始农业中可以看到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理想，这与那时普遍的劳动形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政府大规模地发放农业补助，农民在劳作时大量使用磷酸盐、除草剂和农药，有机农业的概念遭到了很多农民的怀疑和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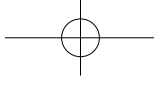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V

T

0

6

2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迫于残酷的现实，塔胡纳农场的创办者们通过帮忙房屋拆迁等零活来筹集资金。1978年第十期《蘑菇》杂志（*Mushroom Magazine*）上还刊载了一封倡议书，呼吁人们为建设新的家园而捐款，同时申明一旦确定新的选址，诚邀所有人共同分享新乐土新气象。最终，通过原成员们卖力苦干以及社会捐赠所获，以及成员的房屋贷款，他们买下了尼尔森市西南部近 60 公顷的土地。1979 年 5 月 1 日，依靠“复兴信托基金”，复兴社区正式成立。

● 重生之光

诞生的最初，复兴社区那块地仅有的建筑是荒废的农舍，近乎崩塌的谷仓。然而，它有高质量的土壤，是最佳的农作耕地。随着土地购买手续的完成，陆陆续续约有 30 人，从新西兰各地、欧洲、北美，以及之前的塔胡纳农场来到了这里，睡在大篷车、货车、棚屋、帐篷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响应了先前《蘑菇》杂志的号召，也有一些人是通过朋友间相传而得到的消息，复兴社区很快便人头攒动起来。

一大群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组成了新的社区，在没有规则和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复兴社区奇迹般地度过了头一个 10 年。社区的总人口在 40 至 60 人之间波动，核心成员约有 25 名成人和 10 个孩子。生活费用以较为随意的方式收集起来，清单、账目和其他日常消费明细都贴在社区大屋的公告板上，如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或者有意愿，都会为“农场基金”（Farm Fund）出一份力。一群驮马开始开垦土地，大量的农作物逐渐生长。专注耕种带来了巨大的粮食丰收：谷物、蔬菜、水果、奶制品、鸡蛋、蜂蜜还有禽肉。几位家长筹办了一所小学，随后在毗邻复兴社区的土地上买下了学校用地，吸引更多社区之外的小学生。

这是复兴社区的黄金时代。人们自由并慷慨地奉献，整个社区有一股强烈的共同精神，洋溢着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希瑟（Heather）回忆 1980 年第一次来复兴社区参观时的场景，“很迷人，真的有朝气蓬勃的感觉，有这么多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想试着改变世界”。刚到社区定居的几年内，还有其他团体和个人买下了临近的土地，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复兴社区不同，但都希望能拥有这样的共同生活。不过，复兴社区是一个中心，所有重大活动都在那里举行。

从一开始，短缺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有限的资源就难以满足日益涌入的人口，还得包括通常情况下 12 至 15 名成长阶段的青少年。社区最初为了建造“工人住所”而申请建筑许可时，当地政府要求提供一份发展计划。要获得建筑许可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长久的等待不仅加重了居住房屋和社区资源的窘迫，还导致了人们在应对这些外部权威的问题上的分歧，这也是第一次居民在思想上的分裂。最初对复兴社区的无政府主义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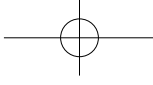
V

T

0

6

3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产生兴趣的通常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人，他们鄙视任何循规蹈矩的系统，排斥任何会削弱自由的制度。几位核心成员觉得搭建新房完全没有必要去征求政府的许可，或者依从那些房屋管理条例。



大部分离开都市生活来到复兴社区的人都缺乏耕田种地、搭屋建房等自力更生的能力。还有许多是高举自我发现的旗帜，厌恶自己中产阶级的出身，以毒品、性和恋爱等来寻求刺激的一代。然而，随着复兴社区的生活体验，他们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产生了热情，复兴社区展现更多元的生活兴趣和动力。当然在短时期内，迥然不同的人生目标、原则和思想信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人口流动变得越发频繁。希瑟对此总结说，“人们一开始是因为满腔热情，渐渐地发现，复兴社区是一个便宜又方便的地方，可以玩玩。然后，你会意识到周围谁真正在干活而谁又在浑水摸鱼，那么，我们能否把这些问题处理得更好，好让人明白你住在这儿就要做什么。或许，我们就要设定一些规矩。然而我们有抛弃规则的共识，因此问题就开始围绕我们想要规矩还是不要，我们如何做决定，谁来做决定，如何监督决策。于是，原本讨论如何办实事的问题变成了喋喋不休的争论。”



由于无法解决该如何一起做决定，更别说处理更揪心的社会问题，社区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一些成员随随便便就离开了，那些留下的就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局面。

● 离散之象

复兴社区创始人中的两位灵魂人物，托比（Topsy）与保罗（Paul），不仅有出色的领导才华和品格，还具备丰富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责任感。为了偿还买地时的贷款，他们要在距离复兴社区三小时车程的地方建造一个羊毛场。他们从社区动员招募了一批劳动力。整个项目的组织照旧随意散漫，劳力也缺乏技术和耐心，由于人们驻扎的基地没有通讯设备，与家人沟通的机会也只能是偶然之举。当时也正处于社区建设的早期关键时刻，这项工程持续了好几个月。由于对工程热情不足，加上通讯的中断，松散的组织，加重了人们的不满和失望，托比和保罗就此彻底离开了复兴社区。其他一些重要的初创人员也在头一两年中纷纷撤离。灵魂人物的离巢，和新社员的涌入几乎处于同一时间段，这样的情况使得社区人口严重不稳定。对社区建设的连贯性、目标以及社区身份的困惑等，成了一系列无助的难题。



创办者离开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是和别人在另一处恋爱结婚，有的是觉得无序的架构实在太艰难，人与人性格上沟通不融洽，生活理念的冲撞导致压力太大等。许多带着年幼孩子的人认为问题不仅是组织架构的随意，还有过于老旧的劳动设备、拥挤的人群、一大群不务正业的单身男人以及诸如吸食大麻等不良风气。希瑟想起当时的状况，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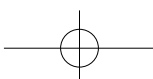
V



0

6

4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住说，“我们从美国回来，在卡车上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我感到这对我孩子的健康已经形成了危险。尽管我喜欢这儿的环境和人，但还是觉得这里的文化有点糟——猪肉和吸毒——所以我们离开，到山谷的远处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素食社区。”



第二波加入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雷 (Ray)，他充满活力、意志顽强、逻辑清晰而且能力极强。介绍雷到复兴社区的是他的好友伊恩 (Ian)，也是一位对社区建设和政治感兴趣，头脑聪明的人。他们俩发起了多次社区会议，讨论基金会的框架，权力的分布，试图建立一个责任制、有强制经济要求，而且包含对新成员监督的体系。这遭到了创始人们的抵制，他们觉得新来的人并不理解或欣赏这样冒险生活的意义，也不懂信托基金的哲学理念。持有同样怀疑态度的还有一群人，他们意识到了无序环境能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性格冲突和不良情绪的蔓延，让整个社区分裂成两派。从农场后来的地理分布上就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想设立一定程度上规则的群体把房子安在了土地的另一头，疏远于社区大屋、花园和中心农区。



社区成员艾米莉 (Amelie) 说，“我坚定立场，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考虑这些所有的事，比如我们怎么花钱、怎么办事，该如何更平均地分摊到每个人，又或是怎样阻止人们糟蹋环境，破坏他人劳动等，那么，最终的结局必定就是我们最初的希望都会化为泡影。我们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基金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成立，我们都是这份信任之托下的嘉宾。我们事实上没有发言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最后这句话指出了复兴社区生活哲学中自由概念的矛盾本质。她的无力感反映了一种无能：能随意做任何事的“自由”却让合作以及接受社区是一个大家庭显得异常艰难。社区另一个重大的缺陷在于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比如怎样做出决定并把它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社区无法以一个完整的集体来有效进步，也无法处理日益激增的恶性社会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至新世纪初又有一大群人离开了社区，其中还有几位已在复兴社区住了 20 多年的老朋友。约翰在 1995 年离开，如今他住在另一个集体所有的社区，在莫图伊卡河 (Motueka River) 的另一头；克劳斯 (Klaus) 和维瑞娜 (Verena) 在复兴社区住了 23 年后，也在 2003 年搬离。他们把新居安在河岸社区，因为在那里更有共同生活的氛围。这对夫妻与 1990 年代离开的人们一样，已经学会了种田护地，农具的保养和修理，掌握了灌溉、播种等实践技能。



克劳斯说，“我很舍不得这里，建了一所房子，慢慢地过上自力更生的健康生活，就在我决定搬离前，有更多的人找我帮忙做木活儿，我就开着皮卡到他们家，再做些割草的事儿，我在社区还算小有名气，热心帮助别人，也够负责的……可惜这些不会再有了。”维瑞娜则觉得复兴社区是“叛逆的文化，而且一直会这样”，任何“想用另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原有的叛逆，都会被击退”。事实上，这个群体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基

V



0

6

5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本没有合作，社区管理和日常事务也乱七八糟。土地的状况便是最好的证明，房屋毁坏日趋严重，环境中还弥漫着懒散的气息。

● 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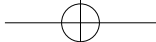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萨杰逊 (Sargisson) 和萨金特 (Sargent) 在《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一书中写到复兴社区，“它的无政府主义不仅表现在内部结构，也体现在它的所有权上”。在复兴基金和复兴社区间，除了客观物质性的联系，还有琐细的哲学上的联结。

经过多年的变迁，约翰 (John) 认同要管理一个无序环境是件十分艰难的事，他坦言，“复兴社区核心理念在于无政府主义。我们心底里的想法是不需要政府，因为我们有能力靠自己管理自己。但事实证明，我们对实现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充足的准备，也正因此，复兴社区今天才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事实上，从一开始，复兴基金的创立是为了合法地拥有土地，而不是统治或领导社区。理论上，它可以拥有许多土地的所有权，不单单只有复兴社区。基金会理事也从未被规定必须亲自居住或参与社区生活。克里斯认为基金会理事与社区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这关系到责任，把一个合法实体凝聚在一起……但基金会代表着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异常现象，因此它的责任就是在此情况下试着规范你的行为，为社区居民树立榜样。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告诉人们做什么，而是予以他们参与的自由”。

除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理念，基金理事常年都不愿践行自己的自主权力，比如当社区内部管理越发艰难，无法解决社区出现的许多事件。然而这些理事却在近些年承担起了管理房屋的职责，居民如今会支付一笔小额租金给基金会，租金被归入总的基金以应对房屋修缮和维护所需的费用。但年久失修的房屋和设备，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毒品和酒精问题都说明复兴社区住户的身体并不能以健康积极的姿态来实现复兴基金所期待的梦想。克里斯 (Chrissy) 说：“依照基金会文件上所说的最初的梦想，需要每个人对土地的爱，还有土地管理的技能。可是，我觉得要长期坚持这些非常困难，人们到复兴社区来是因为低廉的生活成本，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避难所。”

根据 2006 年的调查，复兴社区的居住人数有 40 名。其中的一些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更多成员依赖社会福利，一些人每年会做些季度性的工作以及募集福利等。还有一部分是病患和残疾人士，或是要依赖国家救济的人。社区居民人口也日趋老龄化。20 年来，临时住户群已经在社区断断续续地流动。整体上而言，社区的住户，并不是“能为这个国家的精神、智性等方面添砖加瓦的栋梁”，同样，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合作也没有确切可行的办法，除了重修社区花园和一小牛棚，社区的整体呈现出萧条。不过，



仍有一群继续农业劳作并打理最基本社区管理事务的人，时不时地召开会议和小组活动，只是他们不够始终如一。大量长期住户都有药物和酗酒的麻烦。事实上，复兴社区仍能生存下去已十分难得，但它的现状已与早年的情形大相径庭。■

※ 本文由朱喆译自 Olive Jones 在新西兰 Waikato 大学的博士论文 Keeping it togeth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long-established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2011 年。经作者授权。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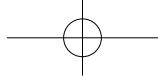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V



0

6

7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地歌社区

生态环保设计

● 黄 宁 ●

地歌生态社区 (Earthsong Eco-Neighbourhood) 位于奥克兰西南方向的怀塔其亚市 (隶属于奥克兰行政大区), 距奥克兰市中心约 20 公里。最初设想由 Robin Allison 等人于 1995 年提出, 原意就是要联系一些环保主义者在奥克兰附近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社区, 通过几个发起人自己筹资和银行贷款, 工程于 2000 年 11 月动工, 发起者同时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Earthsong。这个生态社区的一期工程共计 17 个联体住宅已于 2002 年初完工并很快住满了居民 (除了社区的发起者和响应者居住外, 多余的房子向外出售)。

按照 Mark Roseland 在 1998 年曾经提出的可持续社区的 9 个主要特征: 1. 绿化城市, 2. 水及排水, 3. 废弃物减量回收, 4. 能源效率高且可予更新, 5. 大气改变与空气品质, 6. 运输规划与交通管理, 7. 土地使用与都市形式, 8. 住宅与社区开发, 9. 社区经济发展,¹ 地歌生态社区虽然占地只有 1.6 公顷, 但已符合上述 9 个特征中的多数。

¹ Mark Roseland, *Towar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resources for citizens and their governments*, New Society Publishers, Canada, 1998.



所以，在其一期工程成功运作 2 年后，包括另 15 套住宅及公共设施（如公用休息室、公用餐厅、社区客人住宿处等）也于 2004 年动工兴建。此外，小区还在沿主要公路一侧预留约 0.4 公顷的土地以备未来的商业开发，同时也为了屏蔽交通带来的噪音干扰。



本文将主要依据 Roseland 对可持续生态社区的界定来分析地歌生态社区在建筑节能、水及排水、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应用和可推广之处。

● 建筑节能

节能是每一个生态社区所必须关注的首要事项，在一般生态社区中主要采用的自然节能方法包括：利用朝阳向开窗或太阳房来接纳阳光以满足冬季采暖需要，同时通过外遮阳设施在夏天过滤掉多余的热量，最终的目的是减少室内采暖和空调设备的使用以节约能源。在地歌生态社区中，所有住宅北向（奥克兰在南半球，北向为朝阳方向）均设计了法式落地窗，外部增加了木制的花架。



通过建筑的外围护结构来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能力是另一个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耗的途径。在地歌生态社区中采用了冲压捣土墙的外墙体系，因捣土墙对温度变化的稳定性，使其室内冬暖夏凉。这并非一项新技术，只是逐渐被许多新的材料和技术所代替，人类在探索先进的建筑技术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一些曾被实践过许多年的造屋技术，尽管它们中的一些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太阳能热水器同样在这个社区得到普遍应用，为了减少使用热水所带来的额外能源消耗。



因考虑到经济因素，光生伏打电池技术在这个社区还未被采用，但所有住宅的屋面部分已经预设了电缆接口，以便将来安装光生伏打电池板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的具体技术之外，人为方式提高节能的途径在社区内被广泛宣传，如建议住户选择节电效率高的家用电器和灯具等。总之，通过以上这些办法，地歌生态社区的建筑节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区电能消耗的调查报告（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的年度统计）显示，地歌生态社区住户人均电能消耗是奥克兰人均水平的 42%。

● 节水

虽然奥克兰并非一个缺水的城市，但地歌生态社区对节水（主要通过利用雨水）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奥克兰地区没有污染性的制造生产企业，这里的雨水足以达到饮用标准，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市政供水，例如市政供水管网过长而可能繁生出的氯、氟等化学物质。在地歌生态社区中，每6家共用一个用于收集储存雨水的混凝土大罐，每个罐子的容积为7000加仑。落于屋面的雨水流入水管再经预埋在地下的聚丙烯管道流入这些储水罐，在每个罐子的进水口都有过滤网以便清除雨水中的杂质，在通往住户的出水口加设了保证最终的水质的反渗透过滤器，然后通过抽水泵将其送入各家。每个管子的顶部都有溢水口，当雨水储满时多余部分自动溢出。目前，这个社区各住户的沐浴、冲刷卫生间、浇灌花园的用水基本上来自于这些储水罐。当然，每家也都和市政供水管网连接，主要是为了解决饮用水和干旱季节的其它用水。



通过用水管理措施同样可以达到节水目的，有时甚至可使用水量减半。在地歌生态社区的建造过程中，所有的用水设备均选用了当时奥克兰市场上最节水的品牌，例如：3升/6升互换式的冲便器，符合节水3A（新西兰节水标签）标准，每分钟流量9升的可调式水嘴和花洒等等。



通过这些措施，在节水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2002年和2003年的雨季，社区所有用水只有6%来自于市政管网的供应。

● 雨水排放

在地歌生态社区，没有专设的雨水井，落于地面的雨水全部留入低洼处，一部分被亲水性的植被所吸收，多余的部分流入区内的一个池塘。这样一来可减少对市政雨水排泄的压力，而且在池塘部分形成了一个小区内的自然水景。所以社区在最初规划时就确立了尽量减少硬化地面的思想，只把区内的小路用水泥铺设，停车场设在小区的边缘，其它大部分公共空间均为绿化地面。所以地歌生态社区的公共绿地是奥克兰一般社区的5倍。

●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的选择将和可持续性的诸多方面紧密联系，如减少能源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提高室内环境质量等。



前文已提到，地歌生态社区的墙体结构为捣土墙，这种材料不仅可加强室内的热稳定性，减少人们对机械采暖和空调的依赖，同时它还取自于本地，易于加工，减少了建筑材料加工和运输所需要的能量。而且，土壤对人体也不会产生影响健康的副作用。室内框架（如梁板）及楼梯、门窗等均选材于新西兰当地出产的松木和大果柏木，木材是一种可再生的材料，新西兰的树种成木期普遍较短，所以木材在这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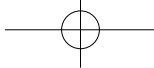
V

T

0

7

0



材料。所有木材只做简单处理，不刷油漆，是为了减少油漆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 交通管理

交通对于一个生态社区的可持续性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交通所使用的能源占有能源消耗的比重很大，而且产生于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温室效应的根本原因。根据新西兰环保部门的统计，2003 年全新西兰 45% 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由交通工具造成的²。同时，私人交通也对社区内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地歌生态社区的发起者在社区选址时已考虑如上弊端，将其定位于临近主要交通要道，并在火车站 500 米覆盖范围内，这样的目的是提倡人们更多地乘坐公共交通设施，减少对私人汽车的依赖。

社区并未给每家每户提供停车位，公共停车位也被设于社区入口的边缘，区内道路仅供步行和非机动车使用，这样大大提高了区内住户的交通安全性，也使居民免遭交通噪音和尾气污染的危害。

为了进一步加强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已有了新的计划，如即将试行的“共用车计划”（Car-sharing Programme），即搜集各住户的出行计划，同出行方位的人可以共用一辆车，以此来减少区内私人汽车的旅程数。另一个长远的提议也将进行讨论，在社区内尝试使用可充电的小型汽车，而这部分电能来自于太阳能或风能。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小区的交通完全可以做到不需要化石燃料并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正如 Brenda Vale 和 Robert Vale 于 1991 年在其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汽车可以使用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能产生的电力进行充电代替原始燃料，这样将会给人类能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³

● 土地规划和绿化

奥克兰是一个人口居住密度很低的城市，每公顷为 23 人，这样势必造成城市的不断蔓延和交通量的增加。地歌生态社区的人口规划密度远高于这一水平，按照现有水准，社区计划安排约 130 人居住，则其密度达 81 人 / 公顷。

为了减少住户驾车购物和娱乐的频率，社区预留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为将来建商业和娱乐设施所用，如果资金到位，社区的住户不久将可以步行购物和参加娱乐活动。

地歌生态社区的绿化同样做得很好，除保留社区北部原有的果园和灌木丛，区内处处可见绿色植物。社区 50% 的土地为公共绿地，另有 20% 为私人绿地。

FEATURE



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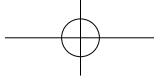
CASE STUDY



个案

²* 参见 <http://www.med.govt.nz>, 03-11-04.

³* Brenda Vale and Robert Vale, Vale,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91.



FEATURE



深度

CASE STUDY



个案

● 公众参与

地歌生态社区不同于奥克兰一般社区的地方还在于其住户完全参与社区的发展，决定社区的重大事项。从 1995 年生态社区设想最初提出开始，在社区内就采用了一种全部成员利用色卡投票裁决的制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决定了社区今天的模式，而且一直沿袭下来，使每个社区成员真正成了社区的主人，社区的每一项设计和变动都要开会通过，社区的设计更加为使用者着想。



除了以上这些方面，地歌生态社区还在其它一些领域同样考虑了可持续发展，例如通过宣传加强垃圾的分拣和堆放管理，正在试图开发污水自处理系统等。

● 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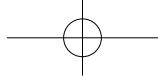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按照 Hugh Barton 的理论，地歌生态社区应接近于乡村生态型的生态社区⁴，这或许不是中国近期要发展的重点，但这个社区中关于可持续性的一些概念和具体手段却给了我们若干启发。像对于太阳能的利用，使雨水变废为宝，对于私人机动车辆的限制，小区的绿化，社区从设计到管理的公众参与等，对中国未来社区开发都能提供一些宝贵经验。近期在北京市已悄然兴起一股众多自然人联合购买土地共建住宅区的潮流，但愿他们的共同智慧能建造出适合中国发展的生态社区，使人们减少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使人们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资源。

● 结论

一些简单的方法和措施（不需要很大的额外投资）其实可以减少我们周围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我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减少我们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优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地歌生态社区虽然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住宅区，但它在建筑节能、节水、雨水处理、建材选择、交通管理、土地规划和绿化、社区成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出了长足的探索，并且已收到关于经济、环境和人文等方面的良性回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可持续社区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再次坚定了我们“有能力让人类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使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可危及后代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⁵的信心，布伦特兰夫人的倡议虽正被全地球人所接受，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确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3* Hugh Barton,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the Potential for Eco-Neighbourhood*,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ondon, 1999.

※ 本文写作于 2006 年，由作者授权，经重新编辑。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ソ

嬉皮岁月

-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虹谷社区
- Robert Jenkin 供图

P h o t o
S t o r y

图 片 故 事 0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ノ



FEATURE



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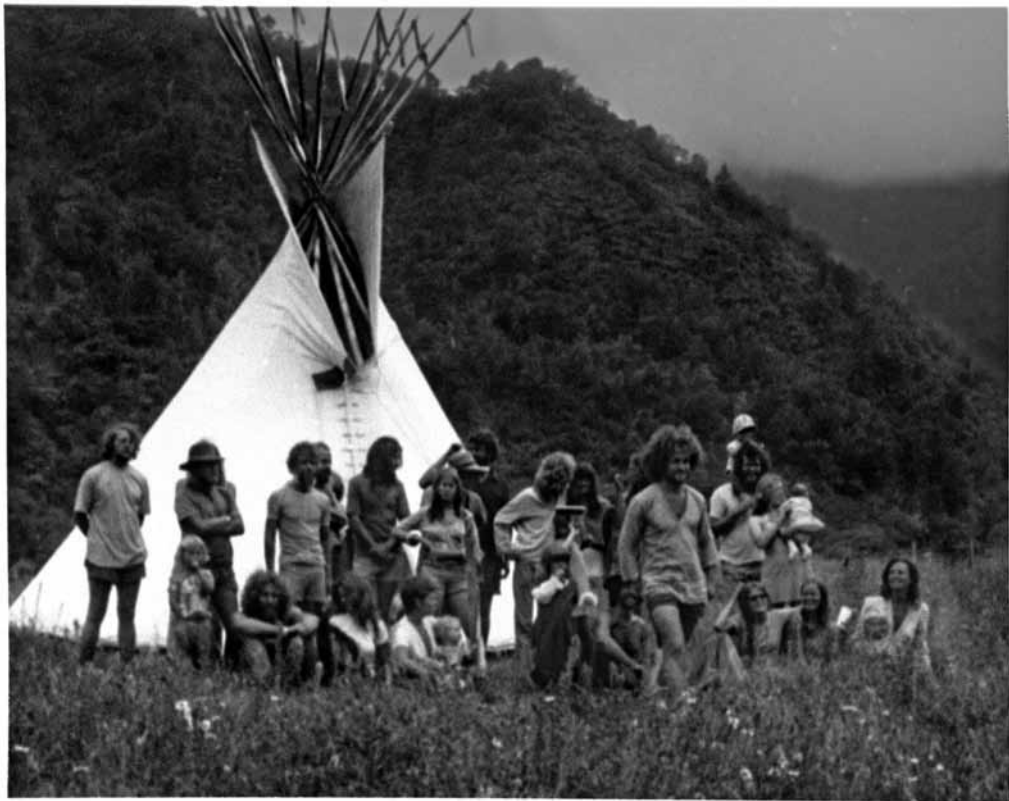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¹ 虹谷社区的第一个圣诞节，1975年。

² Bill Holloway 和 Carol Parkinson 以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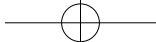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V



0

7

4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 2



V



0

7

5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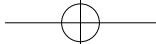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V

T

0

7

6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3 抓到两条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1975 年。

4 Lynn 在挤牛奶，1976 年。

5 热恋中的 Simon Jones 和 Carol Parkinson，1977 年。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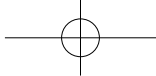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V



0

7

7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⁶ 嬉皮士 Bill Holloway, 1977 年。

⁷ Lynn 和她的孩子, 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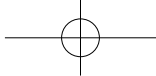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V



0

7

8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6 7



V



0

7

9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8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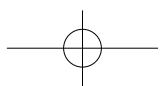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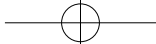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0

8

0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8 ~ 9 一起盖房子，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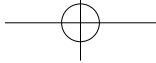
V



0

8

1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¹⁰ 开耕，1970 年代。

¹¹ 洗涤，1970 年代。

¹² 闲聚，1970 年代。

10

11

12

V



0

8

2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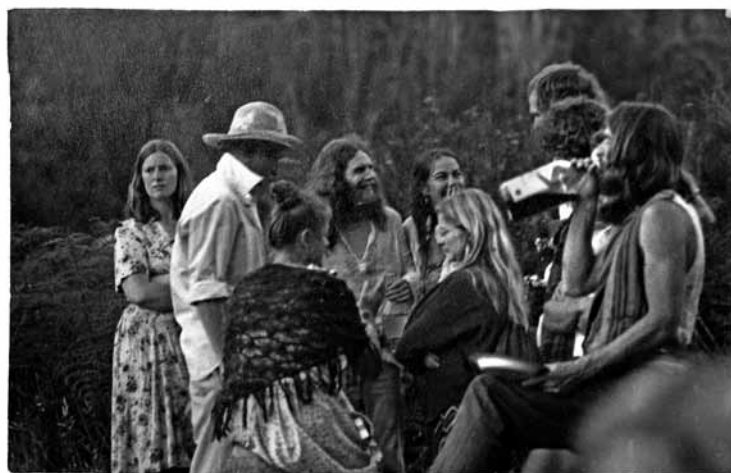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V



0

8

3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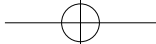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V



0

8

4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3 ~ 14 15

13 ~ 14 协力造屋，1983 年。

15 虹谷社区的小孩子们，1983 年。



V



0

8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

I n t e r v i e w

访
0

× ×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Robin Allison

2013年5月2日，地歌社区，兰努伊

地歌是一个生态邻里社区，一个共属社区。住在这里的人们或拥有自己的房子或租用房子，共享公用设施。1995年，我召集了一个公共会议，一些人前来参加，我们的小群体就开始形成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我们的群体越来越大。每个群体成员都成为了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包括我们想建立什么、如何设计、建造多少房子、使用什么材料，所有的协议、法律和财政程序等。大约五年后我们买下了这块地，和社区里的人一起进行设计，雇佣工人来建设。人们想要加入我们这个群体一起在这里居住主要是因为：一是我们尽最大能力建成对环境无害的社区，这是让人们坚持价值观的方法，也是保持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途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的社区里人们彼此熟悉，人们都是友好的邻居，一起建设，互相帮助，而离开城市中心区生活在远郊也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当时是个建筑师，有自己的项目。我找到了关于共属文化的书，里面描述的关于合作居住的方式实在是太鼓舞人心了。我们从外界聘请专业人士，包括建筑师、工程师和律师。我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与顾问牵线洽谈。于是外界的专业人士不用与整个群体进行沟通，而只需与一个人交流——那就是我。所以我的角色更像是翻译者，把我们群体想要的东西翻译给建筑师和工程师，然后再把专业人士的想法翻译给我们群体的成员，以协调两端的想法。

地歌社区的很多设计都是对生态有利的。如房屋的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设计、健康无毒的材料、低耗能材料等。我们的房子组成一个社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区域布局做许多不同的设计。我们把机动车辆控制在社区边缘，在房屋附近只供行人走动，这样有利于保持社区的安全与宁静，有利于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更适于人们互相交谈，同时也节约了很多土地，可多种植食物。所以，虽然我们这里有32栋房子，整个社区仍然感觉宽阔。我们也会收集雨水，作生活用水，种植水果。落在地表的雨水会汇集起来，被地表吸收，以防止水土流失。这些都是我们设计的主要部分，但没有太先进的技术成果——它们只是非常简单基本的技术，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使用夯土结构的墙壁，所以每座房子都有一座350毫米厚的基本土墙，这是一种非常固实的材质。我们使用混凝土地板，也有很多朝北开的窗户——这在新西兰是向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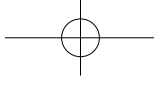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V

T

0

8

7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所以冬天阳光会从窗户照进来，使混凝土地板变暖，使土墙变暖——使房子真正的冬暖夏凉。我们也使用隔离设计及北面的遮光设计，让房子在夏天不会过热。同时也很注重通风设计，使用可呼吸的材质。



永续农业设计主要是关注自然中运转良好的环节，注意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然后把这些元素集中起来并使它们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所以它包括房屋以及种植系统和其他部分，如多样性，我们拥有多种建设和设计计划共同运行，互相帮助，繁殖种群。我们回收垃圾，将食物残渣转化成肥料，返回到花园里。



我们的决策系统使用一系列颜色卡片。如果我想表达对于会议进程的观察，如超时或在一个题目上停滞不前，我会举起红色卡片。如果我想说“这个太棒了”，我会举起橘色卡片。黄色卡片表示“我有一个问题”，绿色卡片表示“我想我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回答那个问题”，蓝色卡片表示“我有一个观点想表达”。主持人按照这个顺序来邀请卡片持有人发言。所以事实上有见解的人需要等到所有其他持有卡片的人说完才能发言。这种组织会议的方法给比较安静的参会人更多空间，因为对于比较安静的人来说，拥有一个空间比在一大群人的讨论中更容易表达观点，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当做决定时，论点会被写在一块板上，这时颜色卡片会有不同意义：如果我完全同意这个决策，就举起绿色卡片；如果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决定，但我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支持，以及我认为这个决策总体来说对整个社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就举起橘色卡片。如果我认为这个决定不够好或者不怎么有利，就举起红色卡片。举起红色和橘色卡片的人要说他们反对的理由，然后我们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时，只有红色卡片持有者可以让决定通过，所以你仍然可以坚持举着橘色卡片说：“我仍然不是非常同意这个决定，但是我愿意让它通过，给人们更多地选择，让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反对观点，但是仍然同意决策的实施。”



每项事宜都必须先经过工作小组讨论，在这些小组会议里，这些议题被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每个小组都会有轮流主持全体会议的机会，所以有几个人会成为全体会议的主持者，有五到六个人会轮流成为全体会议的主持人，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人是真正的组织者，人们只是轮流担当服务这个过程的角色，所以我们是类似议会的等级结构，非常平等。



我们有一个结构化的系统使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如果有什么变故，比如说在别的城镇找到了工作，或随便什么原因，他们可以卖掉房子，开始新生活，就像任何一个拥有房产的人一样。我们同时也有集体合作化的一面。我们巧妙设计这里的结构，使住在这里的人是真正想住在这里的，而不是因为离开太过困难。我们始终竭尽全力维持着一种平衡，在个人的权力和责任及集体的权利和责任中维持平衡。■

※ 录音整理，翻译：赵婷

V

T

0

8

8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Robert Jenkin

2013年5月4日，虹谷社区，塔卡卡

我第一次到虹谷的时候大约 22 岁，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 Gregor 的人，之后 Gregor 和他的伙伴 Simon 在美国人 Jim 和 Lynn 修了一半的基础上完善了这所我们叫做社区中心的房子。Gregor 在搬去现在住的地方之前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三个一起工作的那几个月是 1970 年代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所以我选择待在这里。

1978 年，我们投了一些钱让这块地方变成完全开放的社区，任何人都可以过来，可以住在这里，没有规则限制。这里的生活帮助人们建立信任。但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当时虹谷的会员制度非常严格，在最早的时候，你得先待上 3 个月才能提出长期居住的请求，然后你得再待一年才能真正成为虹谷的一员，前提是已经征得所有成员的同意。这种制度对来这里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阻碍。除非建立起信任，否则这种开放社区无法维持下去。

1970 年代中期，美国的嬉皮士为了避战来到新西兰，但从经济层面上讲，那些美国青年并没有对新西兰做出多大贡献，或者说他们的影响近年来才刚刚能看出来。因为嬉皮士们渴望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那时候土地很便宜，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你现在看这些地方，其实看起来并不像典型的乡村，能看出来其背后的别出心裁。这里适合想观光的人和疲倦的人，就像一个丰富的展览会一样。就像一个文化中心，聚集了各种人的创意，既有观光意义，也有教育意义。他们中有一半的人来自海外，他们建了这些房子，让这个地方彻底改观。当我们初次来到这里，他们叫我们“血腥肮脏的嬉皮士”（dirty bloody hippies）。

中国是一个政治模式的典范，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做给西方世界看的政治姿态。很多人会想，为什么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那是一次中国和美国的较量，类似的局面如今在朝鲜上演。美国的年轻人反战。我曾经和一些美国年轻人交谈过，他们是越南战争的难民。最优秀的年轻人为了逃避战争来到加拿大、新西兰或者任何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这对于美国是一个损失。我想是这种反战的情绪打败了美国，而我们很多人对此感到很高兴。

从我看的书里，我了解到的美国一直是很强势的，无论在越南战争还是朝鲜问题上，而

V

T

0

8

9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中国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一些中国人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变成一种全球性而不仅仅是国家意义上的思想力量。事实上新西兰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有个中国的纪录片里讲到父母为了工作无法与自己的孩子见面，把他们留给乡下的爷爷奶奶带大，看着很悲惨，一个家庭就这样分隔两地了。我相信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我穿的衣服、背的包、用的电脑，几乎所有物品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花的钱越少越好。所以我养牛、做奶酪，吃自己种出来的土豆。我也不出国旅行，虽然我知道那样能够削弱一些全球感。我有了马，现在又有了牛。■

※ 录音整理，翻译：周焰

Simon Jones and Carol Parkinson-Jones

2013年5月5日，虹谷社区，塔卡卡

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其实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一样。不过，在有一些社区议题起争论时，其他人可能会成为一个类似牺牲者的角色。每个人选择某个替罪羊，这是犹太人过去的行为，当事情的确糟糕、不知道如何是好时，他们就选出一只山羊，把山羊献祭给神。他们认为这么做会带走所有的麻烦。这就是替罪羊的由来。所以看起来就像：当你为发生的事情而指责一个人，作为平息人与人之间紧张气氛的方式时，他们就只是杀一个人，就像杀狼一样，来缓解他们间的糟糕局面。这就是执行同一阶层权力的难点。因为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只能尽力。

新西兰也有一些早期社区，比如在基督城驻扎下来的那些社区。在社区里，有时你必须暴露在来自全世界的奇思妙想下，还有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提出的所有可行性想法，必须非常有趣。1900年经由一场美国人挑起的运动，梭罗有了这个梦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了“社区”的概念。他们的确探索出了一种方式：到20世纪中叶时已传播到不同国家，在1970年代又卷土重来。

当我们成年后，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浩劫，抗议诸如冷战、越战、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环境污染之类的欺骗性事件。所以当我上高中



时，我们学到的唯一事情就是环境的影响，我们对环境的污染。科学家们说整个美国的人都在污染世界，如全球变暖。而我说的都已是 40 年前的事情了。许多年轻人认为社会太糟了。我们会毁灭所居住的星球。所以我们愿意回归土地、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种植食物。当我们有项目时，我们要尽快开展起来以求如所愿。种植热带植物、了解这个地区，可是现在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呢。我们在老去。



我们需要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年轻人来定居，但你会发现年轻人是那么虚弱，他们居住在城市中，他们都走不远。但如果你过来住在乡村，整天走啊走，很快就会强壮起来。生理上我们仍然非常健壮。如果换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认为还能如此。这种生活方式能保持你的强壮体魄。之前我们在城里住了 8 年。一周游几次泳，走路上班。当我们回到此地，开始在田埂上行走，我们感到比之前强壮多了。人能展开对他们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 录音整理，翻译：姚欣

Kerry Francis

2013 年 5 月 6 日，奥克兰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奥克兰开始了共同生活的实验。John Ringer 是第一个创始人。我们五个住在一个房子里，另有五个大概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住在另一个房子里，两个房子连在一块儿就像一个社区。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在城市里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的好机会，因为那时城市里有像西方文化和流行音乐这样有意思的东西，而且城市也对音乐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想要让我们的计划有可行性，就必须从这儿开始搞。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犯了不少错误，但那些错误却产生了一些奇特的有意思的效果。



1973 年 2 月我们参加了一个由政府部门主持的会议。好消息是，政府愿意为我们这些有兴趣做理想社区的人提供资金支持，就在那个会议上，所有感兴趣的人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我们的小组也在其中。每四到六个星期，委员会都会在惠灵顿开一次会。就像一般的会议程序一样，为了得到一块地提出申请，签各种文件，人们在会议上提出讨论，反对彼此的想法和意见。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V



0

9

1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我们的小组的申请是第一批通过批准的，申请交至土地管理部门，他们说暂时没有土地可以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请求相关负责人。我们一个星期看了五块地，最终挑选了在怀特岛的一块地，因为它离奥克兰最近。1974 年，新西兰政府正式颁布了“公社计划”（Ohu Scheme）。我们取得一年执照，然后就成立了地力提取公社（Earth Extract Ohu）。这块地原本是灌木丛生的，没有经过任何建设，我们首先要开路。80 亩地，有一条小河穿过，我们为此造了一座桥。头两年我们在北部的小坡上建了一个小楼，里面搭了壁炉和帐篷，接着造了更大一点的楼，但仍然只是一座庇护所，然后我们搞了几个睡觉的房间，又花了两年建了花园和果园，然后我们中的三个人开始长期住在那里。1975 年新西兰有一次选举，新的政党取消了“公社计划”，但也没有完全禁止我们，只是撤走了原先给予的支持和赞助，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有耐心、绝对的坚持。官方文件出来以后我们花了 2 年来讨论这个项目的进展。那时我对纪录片感兴趣，也带了摄影机去乡下，拍了一点关于这些地方的纪录片。

夏天的时候我们为当地的农民喂牛、喂猪。当地的一个小学老师加入了我们。我们用各种方式种蔬菜，因为需要水，所以必须足够靠近小河。我们找到一个靠近河流的小坡峰，想借助风力来为社区提供电力供应，那是在 1978 年左右。

1986、1987 年我和妻子住在那里时，新西兰出台了新的政策，新政策使我们得以买下了这块地。之后的问题是你如何在那样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获得盈利，毕竟它离城市还是有点距离。我们和另一对夫妻，总共 4 个人长期地居住在那里，那个丈夫是工程师，他在土地上动脑筋，想要砍掉那些灌木，然后在那里养牛来获得收入，而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做，应该利用专业所长，毕竟我们中有老师、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应该利用、而不是破坏灌木。我们的争论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后来他决定去别的地方做他想做的。

这种理想社区的模式在新西兰要比在美国推行得晚一些。中产阶级发现他们需要的不再仅仅围绕着工作、婚姻、孩子的生活，开始想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西兰中产阶级生活是严肃而乏味的，而加利福尼亚已经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离开城市、离开正常的生活轨迹，到乡村去干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过一种有趣的生活。我们是从零开始的，我们认为正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有点天真。

人们如果想离开城市，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带着 2000 美元过来，或者是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来的。但如果你没有任何在社区生活的愿望、又没有与人分享的经验、也没有技术和能力，就这样空手来到我们的社区，那可能是一场灾难。也有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人们的重心应该放在社区的共同建设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种社区家庭模式教会我们的东西，这种分享模式和决策模式能让人领会到民主的含义。学会如何在这种环境里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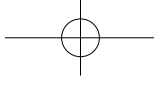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V

T

0

9

2



这就是最重要的教育意义，而这些我们从来无处可学，除非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

※ 录音整理，翻译：周焰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Malcolm Rands and Melanie Rands

2013 年 5 月 9 日，奥克兰

一切开始于我环球旅行时。那个时候，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天堂一般的地方。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年轻人没有灵魂，非常迷失。那是 1979 年，我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我还住过以色列的基布兹。老年人、退休者、抚养孩子的父母住在那里，剩下的人都走了。没有中年人，也没有青少年。在基布兹旁边，我去了一个叫 Moshav 的社区，这是和基布兹非常相似的社区。房屋和土地是绑在一起的，人们有自己的兔子和房屋。如果一个人需要额外帮助，他可以找邻居帮助他。傍晚时他们回到公共区域去参加活动，过集体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如梦初醒。我觉得需要扎根下来，不然就一直在漂泊。然后我去了奥克兰的图书馆，跟生态社区有关的想法从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完完全全是巧合，我拿起了一本书，跟有机生活有关的。一整个下午我看完了整本书，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尝试别的方式呢？

1981 年我在奥克兰给我母亲买了一个有机花园。后来我去 Mamaki 创办了生态村。我爱上了那里的人，爱上了 Melanie，然后在那里呆了 15 年。现在我们仍然相爱。刚开始和我一起建设生态村的群体是一群艺术家。Melanie 在 6 个月后加入了我们的项目。她没有很多生态有关的知识背景，只是被我拖进来，然后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我们整个项目的得力支持者。我非常幸运——在奥克兰我从事的工作就包括文化事业。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有一些人就在研究合作居住，所以我一直被这些观点和知识包围着，我学得越来越多。Mamaki 社区很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关于“让我们一直购买土地到我们自给自足为止”。

我们都很喜欢一本书，是 Christopher Alexander 写的一本《模式语言》(A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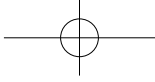
V

T

0

9

3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Language)。我有一些生意上的朋友，其中一位是个建筑师，是他让我对“模式语言”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就是永续农业，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永续农业的事情。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Mamaki 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词，它的意思是充满大爱和水的的女神。有很多孩子在这里出生，我们的孩子们也在这里出生。我们想要名字听起来像所有语言的词源。如果你看这个词的词源，“mama”大家都明白是母亲的意思，“ki”是一个非常通用的神，在很多文化里都是，就像在印度，它的意思就是“牛”。在不同的语言里它意味着不同的神和上帝，是一个跨文化的词。



我们可能失去了最开始的 60% 到 70% 的成员，因为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个观念：“为什么我来到了一个极乐世界，却只能盯着自己的鼻尖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无法明白。这是我们做的最勇敢的事情之一。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很勇敢的事是我们没有很多公共房屋、公共庭院、公共花园，我们可以这么做，这完全是可以自由选择。



Mamaki 生态村所在的地方是《国家地理》杂志去年评出的全世界最秘密的美丽海岸。这块地有名了，然后有人会想，为什么我不把这块地卖了，赚上一大笔呢？这样对整个生态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想把生态村的法律条文弄得苛刻，好保护我们的土地。有时你的邻居会在你家附近探头探脑，在盘算，这会改变你看待土地的态度。我们选择了最苛刻的法律结构，很难有人能找到漏洞乘虚而入。



我们竭尽全力保持水体洁净，就像刚从平原流出时那么洁净。这时我们开始想到洗洁精、洗衣剂、洗发水等等。有一个邻居比我们还早想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支持生态的人，我们总是想着土地，没有考虑到其它。所以我想到了一些概念，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无限潜力的生意。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村里，我们想要提供人们在未来使用的东西。John Ringer 制作的第一本产品手册诞生于 1994 年。其中 30% 都在讲生态问题和故事。有大量的信息，以教育为目的。



我们想用产品使人们的生活尽可能简约，所以当我们发现消费者说我们的产品很难买到后，我们必须进军超级市场了。我们决定做黑白照片的静态营销，基本上是传统营销的反面，几乎是反营销。这种营销策略给我们一个清晰而独特的声音，即使我们是国际化的连锁企业。



环球旅行最好的地方在于你会有很多信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或者要什么，我们非常确切和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我一开始就会告诉我们的生产商：我不要某某原料出现在我的产品里。不是说你一

V



0

9

4



开始生产自然、原生态、环保和有机的产品，你就从魔鬼变成了天使。这不是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Malcolm Rands)

／

我来补充说说 Mamaki 生态村的结构。土地归一个理事会所有，然后来自每家每户的每个人是一个理事，理事会把土地租赁给住在这里的家庭。所以每个家庭都拥有占据两英亩土地的执照，我们从理事会里租下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边界里做几乎任何事情。当然有时候你必须和自己最亲近的邻居商量，比如不能在边界上建造东西等。而关于 ecostore，我想说的是，我们生产的是高浓缩产品，产品成分更贵，但我们用的剂量不是很大。我们用尽可能最纯净的材料和最浓缩的材料。(Melanie Rands) ■

【※ 录音整理，翻译：赵婷】

John Ringer and Candace Bagall

2013 年 5 月 11 日，奥克兰

我出生于 1950 年，在奥克兰附近的怀乌库小镇长大，儿时居住在奥克兰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的马努卡港湾边，看着海水断断续续地拍打马努卡海湾，以及在附近西海岸沙滩上的嬉戏构成了我童年的历险奇遇。

／

怀乌库拥有大量的毛利土著居民，其中的很多人与我的父母相识，并在各方面共同合作。我家的邻居就是一大家子毛利人，两家的孩子一直相互串门玩耍。正是这样的生活，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公社生活。

／

直到 1968 年上了大学，我才开始认识到原来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并非总是一对父母和三四个孩子这样常见的类型。

／

上世纪 50 年代的新西兰是一个单调、保守、不容异己的社会，任何在规范之外的东西都不被允许。美苏冷战的紧张局面成了时代的背景，核战争也成了新西兰人生活中的紧迫的威胁。

／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V

T

0

9

5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这些都显露出人们强烈地渴望尝试不一样的生活，孩子们可以拒绝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和他们平庸的生活，不仅在新西兰，还有世界各地，都展示出一种更有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非军国主义的共同合作的生活方式。我进军新生活的方法是“到丛林中去”（Go bush!），这是新西兰人说明自己离开城市，回归土地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我带着妻子，一岁的儿子搬迁到北部，在那里渐渐学会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变成了新时代的农民。



同一时期，有很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了“到丛林中去”的队伍，开始有了许多体验，对共同生活的规划、公社、另类学校（alternative school）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爱的分享。旧金山的嬉皮士运动是这些变化的催化剂，鼓励了新西兰人相信自己也能够改变社会。《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成了另类生活方式的百科全书，“甜水”（Sweetwaters）和“纳巴萨”（Nambassa）等大型音乐节传播出了更多的信息，还创造了许多交流和分享创意的机会。



我与妻子，偕同一群朋友通过建立另类学校展开了理想社区之旅，下一步便要寻找一些公共的土地，建立一个新型的迷你社会。然而，随着婚姻的破裂，整个团队也随之解散。不过，好友们在北部成立了第一个公社（Ohu），这是由政府资助的针对边缘和废旧地区的公社建设计划。在那里，我体会到毛利土著生活与嬉皮文化碰撞的火花，使我意识到人们其实正在试图复制身边已经发生的变化。



在与前妻分开后，1981年，我与 Candace 相识相爱，Candace 是一名真正的嬉皮士，也是柯罗曼德尔半岛（Coromandel peninsula）的猿人社区（Moehau Community）的联合创始人。由于当时的状况，我见证了大量社区发展的过程，无尽的会议，无休止的辩论，争斗，还有乌托邦梦想的幻灭。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或是体谅并理解不得不在一起亲密生活的情况。



同样，Candace 也感到梦想的破碎，我决定将不再加入社区，取而代之，我们在奥克兰西部买了一间小农场，在这里沉浸于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没有会议，只有辛勤踏实的工作。（John Ringer）



1974年，我还是奥克兰大学艺术系的学生，由于受到美国嬉皮士“回归土地”的启发，再有当时核武器和橙剂的威慑，以至于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将于1984年毁灭的惶惶威胁中，我和我的同学们当时非常理想化，都觉得是时候要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听了一个演讲，演讲者说我们都应该停止学习，去农村开辟新天地。许多人受这种思想影响，觉得能找到一种不同于父母一辈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彼此分享照顾。



我们找到柯罗曼德尔半岛顶部一块1100英亩的土地，那是海滩边上的一个大农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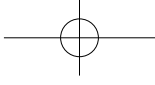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V

T

0

9

6



国家森林边缘，距离奥克兰大约 4 小时车程，是个美丽的地方，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块地要 10 万新西兰元，这是一大笔钱。我们都是学生，并不富裕。于是我们发动了能想到的所有人，成立了一个公司买下它，成立了猿人社区。我们共有 55 人，大部分都是学生，也有少数音乐家、电影导演、建筑师，还有一位农民。



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非常特别，受阿道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小说《岛屿》(Island) 的影响，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新西兰农民通常相当谨慎，但他们是不寻常的农夫。这些人太帮忙了，他们尽其所能帮助我们，他们说钱可以慢慢付。最终结果是 55 人每人支付 2000 新西兰元，我们要用很长时间的的工作来赚得这 2000 新西兰元。2000 新西兰元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那时，对学生而言是一笔巨款。对于这块地将来的用途，我们曾有过不同意见，但在那一刻都统一了。



那时候发生了许多社会运动，比如女权运动，因此有女生提出在整个地区、整个系统里，我们都平等分摊工作，而不是由女性主导烹饪或家务诸如此类的活儿。我们在大事与小事上都很理想化。我们试图创造就业岗位，鼓励人们前来。我们举办大型音乐会及其他音乐活动，为反核化募捐了许多钱。这是新西兰最激动人心与活跃的时代。有越战，有对于核武器的巨大担忧，因此我们非常想要作出改变。我们就是想以低成本去创造一个小规模的共同生活。



我们组织了许多音乐活动，其中之一是建了一个录音工作室。在 1970 年代的新西兰，全国都没几个录音室，所以不管哪里有个录音工作室都是非常稀罕的。许多乐队来过，他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因为这地方那么美丽，他们躲在专属的小天地里，录制美妙的音乐。年轻的新西兰到处都是就为了找点乐子的年轻人。



我们在那些年里也做了许多文化活动。其中一项是运营 Brown 的戏剧工作坊，农庄后端没有电力，也非常偏僻。每个人来都要沿河跋涉。夏天，我和一些朋友做烹饪，做了许多点心，因为那里有数以百计的人。我们做了所有的烹饪工作，作为 Brown 的演职人员巡回整个国家，沉醉其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Christopher 是新西兰童子军成员，他喜欢在午夜行动。我们还有演员、医生、职业人士、教育家、艺术家等许多有趣人物。



但后来，社区内有一些家庭的婚姻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些内部冲突，很多问题仍遗存下来，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充满冲突的会议，低效的集体活动，生命开始显得无力。或者有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获得足够多的东西，便大批走掉。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领域继续发展，其中一部分还成了名人。从一开始的 55 个人，最后留下的“元老”不过 8 位。(Candace Bagall) ■

※ 录音整理，翻译：朱喆，姚欣

FEATURE



深度

INTERVIEW



采访

V



0

9

7



*F u r t h e r
R e a d i n g*

延伸阅读₀





FEATURE



深度

FURTHER READING



延伸阅读

A Hard-won Freedom: Alternativ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Tim Jones and Ian Baker

Hodder & Stoughton, Auckland, London, Sydney, 1975

《难得的自由：新西兰的另类社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另类社区——它们更常被称作公社，开始出现在整个新西兰，当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有这样的社区建立起来。相对于美国的“回归土地”运动，新西兰的另类公社实践较少被人提及。但因为地处边远，远离主流，加上地权廉价，环境优美，自然资源充沛，又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新西兰的理想社区吸纳更多人群参与，规模和持久性比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这些以另类社区著名的国家更胜一筹。这本出版于 1975 年的书是第一本由新西兰作者撰写和拍摄的这方面的专著，作者和摄影师在新西兰走访了多处公社，与那里的居民一起，学习和体验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仍能从中学习如何得到开发新型社会模式的机会，如何找到一种针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解毒剂，以及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美德。■

Living in Utopia: New Zealand's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Lucy Sargisson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Ashgate, England and USA, 2004

《乌托邦生活：新西兰的理想社区》

Lucy Sargisson 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Lyman Tower Sargent 是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乌托邦研究》期刊的编辑，在这本书里，这两位乌托邦理论方面已有建树的作者，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乌托邦社区。新西兰是一个在乌托邦的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国家，而他们正是在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田野工作和广泛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此书。对怀着想要拥有更美好的生活的梦想的居民而言，新西兰是一片为他们提供机会的土地，在这里，理想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由自行选择结伴共同生活工作的人们所组成的社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Sargisson 和 Sargent 描绘和记录了他们在 50 多个这样的社区的体验，是首次关于这种活生生的乌托邦生活经验所做出的学术研究。他们在讲述新西兰的乌托邦生活经验时，其实提供了我们在思考和处理社区、合作和社会转变等问题时的可借鉴的经验。通常被看作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在这本书里成了一种真实存在的、可观察到的现象。

V

T

0

9

9



FEATURE



深度

FURTHER READING



延伸阅读

Permaculture One: A Perennial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s

Bill Mollison and David Holmgren

5th edition, Tagari Publications, 1990

《永续农业之一：人类居住持久循环的农业系统》

Bill Mollison 自称田野生物学家与浪游教师。然而，对他更准确的描述则是一位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的始作俑者。当他和 David Holmgren 在 1978 年合作出版这本书时，他发起了一次跨越国界的土地利用运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堪称革命的极具颠覆性的运动。在研究澳洲的热带雨林与沙漠生态系统数十年之后，他发展出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的概念。他观察各种植物自然聚集成为互助群落的现象，并利用这观念发展出特殊的农业策略与社区规划方法，其中的要旨是把适当的组成元素组合在一起，让他们相辅相成而持续不坠。永续农业是一套整合式的设计理念，包含农艺、建筑、园艺、生态，甚至财务管理和社区规划。基本的做法是建立可持续的系统，让该系统能自行供应所需，并不断循环利用自身的废弃物，这套方法既基于科学原理与研究，也汲取了传统的知识与原住民的智慧，还包含着哲学和道德特性，因为 Mollison 认为不包含伦理在内的科学，是一种社会病态。如今，他的思想几乎已经传遍全球，并且扎根深化。永续农业此刻正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也在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极地、更在遍布北美洲的许多社区被实践。书中有着锐利的描述和 Mollison 称之为“平静的煽动”的鼓励：他教导人们自给自足、尊重自然。■

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Kathryn McCamant, Charles Durrett and Ellen Hertzman

second edition, Ten Speed Press, Berkeley, California, 1994.

《合作居住：探索我们自己当代的居住之路》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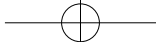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T

1

0

0

合作居住（Cohousing）的理念源自 1960 年代的丹麦，当时一篇《每个孩子都需要 100 个父母》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共鸣。1967 年，50 个丹麦家庭自发组建了现代的第一个合作居住社区。Kathryn McCamant 和 Charles Durrett 将这一概念传到了北美洲，他们访问了丹麦的合作居住社区并完成了这本书，他们设计组建了美国第一个合作居住社区。合作居住社区由私人住宅及广大的共用空间组成，由居民一同规划及管理，居民之间有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那是一种强调社区成员间合作关系的居住方式。不论是市区、郊区或乡村，都能建立合作居住社区。合作居住社区的外观通常紧凑，但非常多样化，有低



层公寓、排屋、独立住宅社区等。社区内通常会禁止车行，良好的步行环境促进邻居互动，以及让社区内的儿童更安心地游玩。公共的绿地是另一个特点，居民能在公共绿地作园艺、游戏或是交流。为了在社区建筑之外有更多可用空地，建筑的结构会尽量聚集，尽可能地增加“开放”供所有居民使用的空地。合作居住在这方面直接解决日益严重的都市扩张问题。合作居住社区不同于其它理想社区，居民并非共有经济，也没有共同的信仰，而是倾向于创建交流丰富紧密的社区。社区管理没有阶级之分，通常采用共识决策的方法，本书对此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FEATURE



深度

FURTHER READING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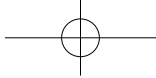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V



1

0

1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

·

2

- 1 · 复兴社区远观。
- 2 · 麦田中的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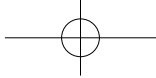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V



1

0

3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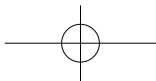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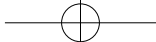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1

0

4





3 .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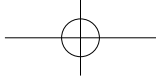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1

0

5

3 . 收获。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4 · 共同耕作。



V



1

0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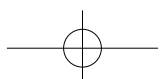
FEATURE



深度

4

.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5

·

6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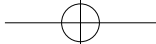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V



1

0

8



FEATURE



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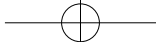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 5 · 麦垛。
- 6 · 暮归。
- 7 · 嬉皮家庭。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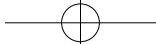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V



1

1

0



FEATURE



深度

8 · ·
· 10 11
9 · ·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8 · 劳作。
9 · 农机。
10 · 羊圈。
11 · 开荒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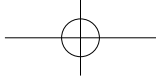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V



1

1

1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2 · 共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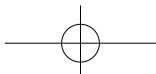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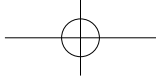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1

1

2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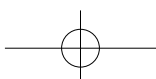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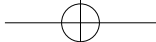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1

1

3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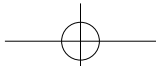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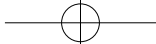


1

1

4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13 · 小孩与狗。
14 · 自制的食物。
15 · 猫儿。



· 14
13 ·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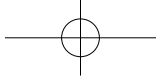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V



1

1

5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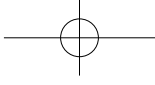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新部落主义

● John Glasgow ●

不论住在 Tahuna 农场，还是之后到 Graham Downs（又叫复兴社区），常常有人问我，“你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成千上万的答案，可能是老一套的泛泛而谈，也可以是极其深刻的哲理般的回答。

我对此采取更折中的观点。“自力更生”的概念其实是蕴藏在我们社区背后一股潜在的驱动，但其本身并不随着时间流逝而能永恒不朽。然而，生活的策略正要让这个梦想成真。实际上，土著文化、西欧文化、前工业革命的文明等等所有已长期存在的文化都是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运用的一个机制，是一种“礼”。

过去在 Tahuna，后来在 Graham Downs，我们总是试图想找到仪式般的场合或是一种传统，来形成群体的认同，使公社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融洽合作，建设成功且可持续发展的自给自足的家园，那里会有丰足的粮食、健康的社交活动，还有充盈的精神生活。尽管我表现得让这些看起来似乎是有意识而为之的精心策划，可事实远非如此。如果



你在 1985 年左右来到 Graham Downs，便会看到并听到上述所有的一切，而同时也会发现它们都那么杂乱，毫无章法。当然还会看到只顾一己私利的人，和为了迎合西方市场体系所制作的产品。跟他们说安那其，他们便联想到“炸弹和动乱”，而不是由个体组成的有责任担当的自治。当时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新西兰的中产阶级，不过也有欧洲或其他地区的新移民，还有零零星星的未受过教育的叛逆新西兰少年，组成了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群体。



正如我提到的，并不存在一个为了实现最终理想的策略规划。不过，为了美好的梦，我们时不时地会尝试不同的可能，做多一点试验。我们通过社区会议去建立大家都认可的关于社区土地的“规则”（尽管我并不想用这个词），通过农场例会去设法落实确定的协议。会议中常年出现的议题包括狗的管理，个人可以为社区作出怎样的贡献，每人应当在农场资金中投入多少份额，个人是否可以拥有私产，如果可以，这些资产是否需要公开等。讨论的话题非常多，但不幸的是，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探讨狗儿的事情上。



说到“新部落主义”，我刚才已提到“礼”，它是把社区融贯一起的黏合剂。“礼”应当切实可行，意义深远，明确清晰，“礼”的重要性要获得普遍的认同，并且为人们所接受。



对于新加入的成员而言，“礼”会显得颇有威慑力，有时还会成为新人加入社区的关卡。“礼”也允许社区成员有自我意识，在工作或其他社交场合，也鼓励相互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礼”支持新成立的社区或组织谋划各自的未来。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礼”让众多组织有了更辉煌的明天：推广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的教育理念、生物动力学的传播、任何新的宗教团体；这些都在促进“礼”的发展，或许某一天，“礼”应当被描述为共同分享的社会互动。



Graham Downs 社区今天仍然存在，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它的过去和未来抱有复杂的情感。一些人仍把它想象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大社区，森林、瓜果、木柴、花草等共同生长，组成他们眼中巨大的漂亮公园；另一些人选择居住在这里则是因为生活成本低，他们觉得无政府状态能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了让“新部落”成为一个真正的“部落”，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前路漫漫。■

※ 本文是作者应 V-ECO 之邀为他在 1970 年代拍摄的复兴社区的旧照片而写的说明，朱喆译。

FEATURE



深度

PHOTO STORY



图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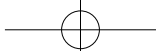
V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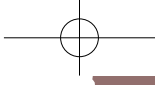
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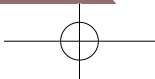
TOP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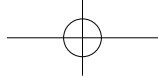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 (



话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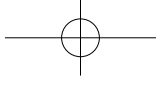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食物

F o o d

『 』 『 』 『 』 『 』 『 』 『 』 『 』 『 』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大有机

从超市到农场

● Michael Pollan ●

● 超市田园诗

在“全营养食品”连锁店（Whole Foods）购物所带给我的愉悦，堪比在一家品味高雅的书店浏览书籍所带来的享受，如果仔细想一想，这或许并非巧合：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购物，也是一种文学体验。所谓的文学体验与食品本身无关。这里的食品基本上都是高品质的，多数都经“有机认证”，要么就是“用人道方式饲养的”或“放牧的”。然而，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引人遐想的描述，使这种食品与众不同，将一个鸡蛋、一块鸡胸肉或一袋芝麻菜，从普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提升至令人痴迷的境界，使这种体验兼具复杂的美学、情感，甚至政治意味。以我最近在内品柜中看到的“牧场放养”的里脊牛排为例。根据柜台上的宣传册，这块牛排之前所属的那头牛，在“多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了”它的一生，“从植物种类多样的高山牧场，到茂密的杨树林，再到绵延数英里长满艾灌丛的平原”。那么，这样的一块牛排，其滋味必然胜过“安全食品”超市（Safeway）中的牛排，那里仅有的食品信息就是数字：也就是价格，可以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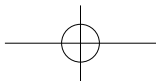
V



1

2

1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那儿的价格要低得多。不过，我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愿为一个美丽的故事支付更高价钱的购物者。

随着有机食品的发展，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工业化食品对健康的影响，近来这种带有故事的食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的超市中，但是，持续提供这类最新食品文学课程的，只有“全营养食品”超市。在最近的一次购物中，我的购物车中塞满“无笼放养的素食母鸡”所产的鸡蛋，生活在“解除了无必要恐惧与痛苦环境下”奶牛所产的牛奶，阿拉斯加亚库塔特（Yakutat，人口 833 人）的美洲原住民所捕获的野生大马哈鱼，以及“有机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的卡佩农场（Capay Farm）所生产的秘传番茄（每磅 4.99 美元）。我所挑出的有机肉鸡甚至还有名字：罗琦（Rosie），这其实是佩塔卢马家禽饲养场（Petaluma Poultry），以“可持续养殖”及“牧场放养”方式生产的一种鸡，这家公司的“养殖方法力图创构和谐的自然关系，以保持生物与自然的健康”。还行，虽说算不上最流畅、甚至不是最有意义的措辞，但至少其心可嘉。

在超市的好几个柜台前，我还真就被迫在几个微妙竞争的故事之间进行选择。举例来说，牛奶柜中的有些有机牛奶标称“重度杀菌”，意指加工过程多了一个额外的步骤，因其延长了保质期，被视为对消费者有益。但另一家较为地方性的乳品厂，则标榜他们对“深度消毒”说“不”，暗示他们的产品更新鲜、更少加工，所以也就更加有机。这就是那家标榜其奶牛生活在无忧虑之中的乳品厂，而此刻我却开始有点焦虑了。

这家乳品厂的标签，透露了许多有关乳牛生活形态的信息：它的霍斯坦奶牛生活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包括遮风避雨的牛棚和舒适的休息区……充足的空间、良好的设施以及同类相伴生活在一起”。这一切听起来都还不错，直到我读到另一家销售生乳——完全未经处理——的乳品厂的故事，它的“奶牛一年到头都在葱郁的牧场上放牧”。这一描述让我顿生疑窦，上一家乳品厂所谓的适宜环境，是否包括一个我一直认定应该有的牧场。突然之间，他们的故事中缺少牧场一词，显得格外惹人注意。对此文学批评家会说，这位作家似在删除整个牛与青草相关联的概念。的确，在“全营养食品”超市逛得越久，我就更加相信，这是一个文学批评技巧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地方——除了这些技巧外，也许还用得上新闻记者的技巧。

冗长的标签、介绍采购点的小册子以及认证制度，应该帮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模糊而复杂的食物链。在工业化食品经济体系中，将食物链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唯一信息，差不多就是价格了。只要看一看报纸上典型的超市广告，你就明白了。所列出的唯一品质，实际上是数量：番茄 0.96 美元一磅；绞肩肉 1.09 美元一磅；鸡蛋 0.99 美元一打——本周特价品。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产品，会以如此简单直接的方式销售

V



1

2

2



吗？这种精简到最低限度的信息，当然会同时向两个方向传递，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消费者只关心价格，于是他们也就只会关心产量。廉价食品经济机制就这样被不断强化。

* * * * *

有机食物链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能让更多的信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传递——在数字之外加上一小段含蓄的叙述文字。有机认证标志可以透露些许信息，告诉人们某种食品的生产方式，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渠道来反馈信息，告诉农民他们看重不含有害杀虫剂的番茄，或者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饮用那些来自未注射生长激素之乳牛的牛奶。

“有机”一词已成为超市中最具实力的招牌：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农民与消费者协力打造了一个产值达 110 亿美元的行业，如今已是食品经济体系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门。然而，有机标志本身——与超市中其他这类标志一样——其实只是直接观察食品生产过程之不尽如人意的替代品，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因为在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将自己的食物追溯至农场，况且今天的农场与我们之间的平均距离，通常会达到 1500 英里。要跨越这一距离，我们只好依靠认证机构和标签作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些生产食物的农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机标志留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是一种更加简单的农业，但其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农场本身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些故事相符合？

总体来看，“全营养食品”超市所提供的是个田园故事，其中动物的生存环境，与我们儿时所读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水果与蔬菜则生长在像萨拉丁农场这种小型农场上均衡施用堆肥的土壤中。标签中的“有机”一词，让一篇篇内容丰富的故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虽然大部分细节都是消费者自己补充的。这些故事为我们塑造了英雄（美国家庭农场主）和恶棍（农业集约经营者），还创造了一种文学类型，我考虑将这种类型冠名为“超市田园诗”。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对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会轻信这种过于简化的故事，但了解的程度还不够，而超市诗人们则尽其所能，怂恿我们主动放弃怀疑。

超市田园诗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文学形式，其欺骗性之大，足以让它面对诸多挫败，仍能继续存在。我猜想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中某些最深切、最古老的渴望，不仅渴求安全的食品，也渴望与土地以及我们长期依赖的少数几个驯化生物之间保持关联。“全营养食品”超市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这家公司的一个营销顾问向我解释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者觉得，通过购买有机食品，他们可以“体验真实的存在”，在想象中“回到往昔的乌托邦，同时又不会失去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这听起来很像维吉尔也试图共享两者的田园诗。利奥·马克思（Leo Marx）在《花园中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一书中写道，维吉尔的牧羊人提提洛斯（Tityrus）并非童蒙未开，他“兼享两个世界最美好的部分——文明秩序的优雅和自然天成的淳朴”。为了保持田园传统，“全营养食品”超市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提供了一种利奥·马克思所谓的“和谐景观”，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V



1

2

3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正如市场营销顾问所说，在这里，人们通过有机食品走到了一起，从而回到万物的始源——也许是通过大家坐在一起享用那种堆放在冰柜中的、可用微波炉加热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我从未想到这几个字可以放在一起使用）。以这种方式兼顾自然与文明，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全营养食品”超市最难调和的矛盾，是有机食品产业的工业化与田园理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有机食品工业既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建立在田园理想之上。有机食品工业曾经被称作“有机运动”，它在过去的30年中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发展得更像一个大型产业，不再像一个运动。在我购物的那家“全营养食品”超市中，琳琅满目的农产品货架上方的墙上，挂满了当地有机农场主的彩色照片，配有阐述其农业理念的文字说明。其中不多的几家农场——卡佩农场是其中一家——仍将其产品售予“全营养食品”超市，但大多数农场的产品早已从货架上消失了，尽管其照片可能还挂在墙上。这是因为近年来，“全营养食品”超市采用了食品杂货业标准的区域分销制度，使得支持小农场的做法变得不切实际。大型仓储系统同时为几十家连锁店采购货品，迫使它们只能与大型农场进行交易。所以，尽管店内海报仍在展示家庭农场主及其理念，下面货架上所销售的产品却主要来自加州两家大型有机产品生产商：扎根大地农场（Earthbound Farm）和格林韦农场（Grimmway Farms）¹，这两家农场一同主导着美国生鲜农产品市场。（仅扎根大地一家所生产的有机生菜就占全美市场销量的80%。）

当我将扎根大地农场生产的一盒免洗混合色拉扔进“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车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冒险进入乔尔·萨拉丁（Joel Salatin）所谓的“有机帝国”这头工业怪兽的腹地。（说到我的混合色拉，另一位小型有机农场主，也是萨拉丁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他“甚至不会用它来做堆肥”。——此乃有机纯粹论者常用的贬抑之词。）但是，我并不愿意接受有机工业肯定是件坏事观点，除非其目的是要改造这个基于连锁超市和消费者对方便与廉价食品预期的、市值5000亿美元的食品系统。

不过，考虑到有机运动曾被认为是工业价值的一种批判，确实有一天工业化进程会使有机运动丧失其原有的灵魂（有机派使用此词时并无嘲讽意味），那时超市田园诗将从事实变为虚构，成为经销商的又一个谎言。

问题是，这一天是否如萨拉丁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到来？超市田园诗能够经得起细读和新闻调查吗？

¹* 格林韦农场拥有“加州有机”（Cal-Organic），后者是超市中最常见的有机品牌之一。原注。

在一个110亿美元产业的重围之中，我们又能指望有多少真正田园的东西得以保持，也就是说，情况一点也不乐观。至少，这是我循着购物车中的几项产品，回到其生产地农



场时，所发现的事实。举例来说，我发现有些（当然不是全部）有机牛奶来自工厂化农场，上千头从未见过一片草叶的霍斯坦乳牛，被关在四周有围栏的育肥场，吃着（经认证的有机）谷物，一天三次被拴在挤奶机上挤奶。大部分牛奶之所以要经过重度消毒（一种会破坏牛奶营养成分的高温消毒工艺），是为了让地平线（Horizon）与曙光（Aurora）这样的大公司可以远距离销售牛奶。我发现了在“有机育肥场”饲养的有机牛肉，以及有机高果糖玉米糖浆——我从未想到这么多字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我还了解到前文提到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的制作过程，这种可用微波炉加热的餐盒中有“米饭、蔬菜，烤鸡胸肉拌美味香料草酱汁”。他们给这道主菜起名为“乡村芳草”（Country Herb），实际上它却是高度工业化的有机产品，由31种原料经奇妙组合而成，原料则来自散布于六七个州和两个国家的农场、实验室以及加工厂，包含了诸多神奇的现代食品科技成果，比如高油酸红花油、瓜胶和黄原胶、大豆卵磷脂、角叉胶以及“天然烤肉调味料”。其中有几种成分是符合联邦有机法规的合成添加剂。全营养食品原来不过如此。“乡村芳草”的生产商是华盛顿州的喀斯喀特农场（Cascadian Farm），原来是有机农场的首倡者，后转型为加工商，现已成为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的全资子公司。（从那时起“乡村芳草”鸡肉便不再生产。）

我还去访问了有机肉鸡“罗琦”在佩塔卢马的农场，其实，与其说这是家农场，倒不如说是座动物工厂。它与其他两万只罗琦肉鸡生活在同一个鸡舍中，除了经认证的有机饲料之外，其生活与其他工业肉鸡并无二致。噢，标签上所承诺的“放养”生活方式又是怎么回事呢？没错，鸡棚中确有一个小门，通往一片狭小的草地。不过，如果你发现这扇小门始终紧闭，直到这些家禽长到五至六周大的时候——因为担心它们会在外边感染什么疾病——而且两周后它们就会被宰杀，这个放养故事似乎就有点夸张了。

● 人民公园

如果从柏克利的“全营养食品”超市出发，沿电报大道往北步行五个街区，然后右转入德怀特街，很快你就会来到一片遍地垃圾的草地和树林，其中点缀着几十个无家可归者的破烂帐篷。这些人大多在50到60岁之间，有些人还留着嬉皮士的发型，穿着他们的服装，与各地的许多贫困者一样，这些男女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睡觉和饮酒之上。但在这里，他们也会花些时间在一些不成样子的地块中种点花卉和蔬菜——几株玉米，一些已经结籽的花椰菜。今天的人民公园（People's Park）是最令人黯然神伤之地，1960年代的希望早已灰飞烟灭，徒剩此破败不堪的纪念碑。然而，尽管徜徉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货架间的富裕购物者，与人民公园中无家可归的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但这两个相邻的阶层却是同一棵前景暗淡之树的不同枝杈。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善恶报应之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管理层早就应该在人民公园立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一块匾，而且应设一摊位来派发有机水果和蔬菜。有机运动与环保主义及女权主义极其相似，同样肇端于 1960 年代曾在此处盛极一时的激进主义；有机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几个支流之一，而反主流文化最终还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不过在此之前，它已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行进方向。如果你沿着这条支流一路回溯至它的源头，你的旅程最终会穿越这座公园。

人民公园始建于 1969 年 4 月 20 日，当时一个自称为“罗宾汉委员会”（Robin Hood Commission）的团体，占据了一块本属加州大学的空地，开始大张旗鼓地铺草皮、种树，而且还开辟了一片菜园，这或许是最具前景的举动了。这些激进主义者自称为“农业改革者”，宣称要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新型合作社会的典范，包括生产自己的“无污染”食品。这个委员会非暴力反抗行为的灵感之一，来自 17 世纪英国的“掘土派”（Diggers），这些掘土派占领公共土地，同样也是为了生产食物以派发给穷人。在人民公园中，所生产的食物应该是有机的，此用语在当时含义众多，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其描述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如何改变了我们饮食方式的权威著作《食欲的变化》（Appetite for Change）中，历史学家沃伦·J·贝拉斯科（Warren J. Belasco）写道，发生在人民公园中的事件，标志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绿色”倾向，这一田园转向会导致乡村中的公社运动，诱发食品合作社和“游击资本主义”，并最终导致有机农业和“全营养食品”超市这类企业的兴起。这一迈向自然的转向成熟于 1969 年：DDT 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圣巴巴拉沿海的石油泄漏污染了整个加州的海岸线，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在大火中燃烧。一夜之间，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生态”，紧随其后的便是“有机”。

正如贝拉斯科所指出，“有机”一词在 19 世纪英国社会批评家中就被广泛使用，他们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和个人主义，与已经逝去的有机社会理想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仍然保持着爱与合作的纽带。有机代表着与工业化截然相反的东西。但是，将“有机”一词应用于食品和农业则要晚得多：出现在 1940 年代的《有机园艺与农业》（Organic Gardening and Farming）杂志中。来自于纽约下东城的健康食品狂热爱好者 J·I·罗代尔（J. I. Rodale）于 1940 年创办了这份杂志，此杂志致力于探讨农业方法及不使用合成化学物质——“有机地”——生产食物所带来的健康益处。乔尔·萨拉丁的祖父长期订阅此杂志。

《有机园艺与农业》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直到 1969 年，《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中一篇令人神往的评论引起嬉皮士对这本杂志的注意，当时嬉皮士正努力寻找一种在不为“军事-工业复合体”作贡献的情况下种植蔬菜的途径。“如果我是个决意要控制全国媒体的独裁者，”《全球目录》的记者写道，“《有机园艺与农业》将是我封杀的第一份出版物，因为它是最具颠覆性的杂志。我认为这些有机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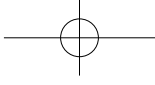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v



1

2

6



丁正在前线努力战斗，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来拯救世界，力图摆脱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工业化的国家，尝试与地球建立一个更简单、更真实的一对一关系。”

两年之内，《有机园艺与农业》的发行量，从40万份攀升至70万份。《全球目录》的赞誉表明，反主流文化已与“有机”一词的广义及狭义定义紧密结合。人民公园中的有机菜园（很快在全国各城市中被竞相效仿），已被视作一个更为合作型社会的典范，是一块和谐之地，人们在此试图以一种更温和、更和谐的态度，取代工业主义对自然所持的征服者姿态。作为一个微缩的田园乌托邦，这样一个园圃不仅接纳了照料它并从中取食的人类，还包容了——用署名为“柏克利人民园圃”的一篇发表在早期的地下报纸《美好时光》（Good Times）上的文章所用的措辞——“尽可能多的物种”。从这些地块中收获的蔬菜，有时被称为“土地的协同作用”，除了提供健康的卡路里之外，还会提供一种“动态饮食”——一个“新的媒介，人们可借此与他人以及他们的饮食建立关联”。举例来说，有机运动拒绝使用农业化学制品，就等于拒绝了战争机器，因为生产杀虫剂的道斯化工（Dow）及孟山都（Monsanto）这两家公司，同时也生产汽油弹和橙剂，后者是种除草剂，美军在东南亚用它来向大自然宣战。这样，有机饮食把个人行为变为一种政治行为。

这正是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农作方式而已。以万物彼此关联的生态理念为准则，早期的有机运动不仅试图建立一种替代生产方式（无化学制品的农场），还试图建立一个替代分销体系（反资本主义的食品合作社），甚至还力图创造一种替代消费模式（“反过度烹饪”）。这就是有机革命得以立基的三个支柱；由于生态学主张“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所以你所食用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其生产和加工方式截然分离。

以全谷物和未加工有机原料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膳食，作为对传统的工业化“白面包食品”的挑战而风靡一时。（“人造食品”是其广泛使用的贬称。）各种褐色食品——稻米、面包、小麦、鸡蛋、蔗糖、酱油、日式酱油——在道义的层面上被认定优于白色食品，这种观念的理由形形色色，现在回头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不错，褐色食物的加工程度较低，但同样重要的是，食用这类食物表示你与全世界的褐色人种休戚与共。（这类全营养食品的健康益处后来才被认识到，一个牵强附会的有机理念终被科学验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不过，或许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褐色食物是父辈不吃的食物。

如何在不使用化学品的情况下种植这些东西是个挑战，尤其是对那些来到农场或菜园、满脑子田园理想却毫无园艺经验的城市孩子来说。乡村公社就像有机农业仓促建成的研究站，新手们可以在此进行各种实验，制作堆肥或寻找控制虫害的替代方法。他们的学习曲线大起大落，这种情况在食品合作社表现得很明显，那儿的有机产品外观不佳的现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象持续了好多年。但一些痴迷者却坚持不懈，步步为营地实践罗代尔的方法，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出色的农场主。

● 从嬉皮士到农场主

其中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就是吉恩·卡恩 (Gene Kahn)，喀斯喀特农场 (Cascadian Farm) 的创始人，这家农场就是生产我购物车中套装电视便餐的厂商。今天，喀斯喀特农场首先是通用磨坊旗下的一个品牌，但起初却是个准公社制的嬉皮士农场。它位于西雅图东北约 75 英里处、嵌在斯卡吉特河与北喀斯喀特国家公园之间的、一片狭长而绚丽的沙洲之上。(食品包装上田园诗般的小农庄结果还真的存在。) 农场于 1971 年由卡恩创建，最初的名称为“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 (New Cascadian Survival and Reclamation Project)，他创建这一农场的目的是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嬉皮士团体生产食物，这个卡恩混迹其中的嬉皮士团体聚集在邻近的贝灵汉。当时卡恩只是个来自芝加哥南区 24 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受到《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² 和《一座小行星的饮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³ 的启发，意欲回归土地——并从这里改变农田的食品体系。在 1971 年的时候，这一梦想算不上惊人，但卡恩竟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梦想，却令人大跌眼镜：他再接再厉，成为有机运动的先锋，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机食品进入主流文化，并让它脱离食品合作社，进入超市。今天，这座以其所在地命名的喀斯喀特农场已成为通用磨坊对外展示的亮点——正如它的创办者坦率承认的那样，是个“公关农场”——而从前的嬉皮士卡恩，则成为通用磨坊的副总裁。乔尔·萨拉丁谈到有机帝国时，心中想到的正是喀斯喀特这样的农场。

与大多数早期有机农场主一样，卡恩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而且也经历过作物收成上的失败。1971 年，有机农业尚在襁褓之中——几百位散布于各地的业余农民，通过反复试验，学着不使用化学品来生产食物，这是一种特殊的草根研发尝试，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支持。(实际上，直到最近，美国农业部一直对有机农业抱有强烈的敌意，认为它是——相当准确地——对农业部正大力推广的工业化农业的一种批判。) 由于不能得到美国农业部推广服务的支持，有机农业的开拓者可资借鉴的就只有《有机园艺与农业》(卡恩订阅了这份杂志)，再就是一些书籍中所描述的各种前现代农业体系的模式，这些书籍包括 F. H. 金 (F. H. King) 的《四千年来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 (Sir Albert Howard) 的《土壤与健康》(The Soil and Health) 和《农业圣约书》(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其中最后这部著作完全可被视作有机运动的圣经。

霍华德爵士 (1873-1947) 对有机运动的贡献，也许胜过任何一位书籍作者，这位在印

2* 美国当代环保运动的发轫之作，作者 Rachel Carson，首次出版于 1962 年。编注。

3* 探讨食物与健康及环保的畅销著作，作者 Frances Moore Lappé，首次出版于 1971 年。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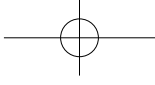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度进行研究 30 年之后受封为爵士的英国农学家，为有机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即使那些从未拜读过他发表于 1949 年的那本《农业圣约书》的人，也会通过阅读罗代尔的《有机园艺与农业》及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的文章，吸取他的思想。在《有机园艺与农业》中，霍华德被视作名人，而贝里则在 1971 年出版的《最后的全球目录》（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中写过一篇关于霍华德的、颇具影响的文章。贝里的文章着重阐述了霍华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具有预见性——的观点，即我们应将“土壤、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问题，当做一个重大课题来对待”。

对于一本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如何正确制作堆肥的书籍来说，《农业圣约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农业科学的书籍，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的确，霍华德将如此众多貌似无关的领域联系在一起——从土壤的肥力到国民健康；从动物尿液的极度重要性到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是他的杰出贡献，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尽管霍华德从未使用过“有机”一词，但我们却可以从其著作中读出对这一概念的各种含义所做的阐述——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农业革新计划，而且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方案。参照霍华德真正体现了整体论观点的界定，来看今天对有机一词的定义，你会发现它的内涵已被大打了折扣。

与许多社会和环境批评著作一样，《农业圣约书》总体来讲是一个“堕落”故事。在霍华德看来，那个诱惑夏娃的蛇就是 19 世纪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利比希男爵（Baron Justus von Liebig），而他用来引诱的苹果则是一组首字母缩写：NPK。正是利比希将农业推上了工业化道路，在 1840 年出版的《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一书中，他把近乎神秘的土壤肥力，分解为一目了然的化学元素清单，将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列入其中。突然之间，土壤生物学让位于土壤化学，尤其是被利比希强调为植物生长关键因素的那三种化学滋养成分：氮、磷和钾，如果用元素周期表上首字母缩写来表示，就是 N-P-K（这三个字母对应于化肥袋上所印的三位数标示法）。霍华德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这种他所谓的“NPK 心态”。

然而，NPK 心态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化肥的使用。的确，在阅读霍华德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会想到，这种心态也许正是造成现代文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霍华德看来，NPK 心态浓缩了还原论科学的长处与局限。利比希的追随者发现，氮磷钾“的确有效”：如果对作物施用这三种元素，它们就会生长。这一成功让人们觉得只差一小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土壤肥力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让我们彻底重新定位土壤（以及农业）的形象，从将其看作一个生命系统，变为将其视作一台机器：从一端输入氮磷钾，在另一端就会收获小麦或玉米。由于至少在短期内，将土地看作机器效果颇佳，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再为蚯蚓和腐殖质这类古怪的东西操心了。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腐殖质是少数几种土壤中含有的物质，让土壤具有黑色的外观和特殊的气味。很难精确地说腐殖质究竟是什么，因为它可以是太多的东西。腐殖质是生物体被有机体分解后的残余物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有机体在一匙土壤中就可达数十亿个——负责分解工作的有细菌、噬菌、真菌和蚯蚓。（《圣经·诗篇》的作者将生命描述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来自腐殖质，归于腐殖质”。）但是，腐殖质并不是分解的最终产物，它只是分解的一个阶段，因为另外一大群有机体会慢慢将腐殖质分解成植物生长所需的化学元素，这些元素包括，但不局限于，氮、磷和钾。这不仅是一个化学的，同时也是个生物性转化过程，需要植物与生长在其根部之中及之上的菌根菌共生共存；这种真菌向植物根部输送可吸收的养分，同时得到一滴蔗糖作为回报。另一个将植物与细菌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共生关系，是富含腐殖质土壤中的细菌，可以汲取大气中的氮元素，将其转化为植物可用的形式。但是，给植物提供一顿养分自助餐，并非腐殖质所做的唯一工作：它还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将土壤中细小的无机物微粒黏合成透气的团块并留住水分，这样，雨水可持续向植物根部提供水分，而不致立即流失。

将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物过程，简化为氮磷钾三种元素，最典型地暴露出还原论科学方法的弱点。复杂的质量被还原为简单的数量；生物学让位于化学。这种方法一次只能处理一或两个变量，霍华德并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问题是，科学一旦把一个复杂的现象简化成几个变项，不论这些变项有多么重要，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忽略其他的方面，会让人以为需要考虑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或至少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被考虑到了。一旦我们把自己所能认识的事物，错误地当作事情的全部，面对土壤肥力这样的难解之谜，人类那种认识到自己知识局限性的自知之明，便会让位于将自然当作一部机器的傲慢自大。一旦迈出这一步，便会产生连锁反应，于是，当施于作物的合成氮肥使其对昆虫更具吸引力，因而也更易遭受虫害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农民使用化学杀虫剂，来修复这部受损的机器。

说到人造肥料——合成肥料的最初用语——霍华德宣称，人类的傲慢自大，不仅威胁到土壤的健康（因为剧烈的化学品灭绝了腐殖质中的生物活动），而且还威胁到“国民的健康”。他把土壤的健康，与依赖土地为生的所有生物的健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工业化农业出现之前，这种观念已是老生常谈，许多人，尤其是柏拉图和杰佛逊，都对此进行过探讨。霍华德如是说：“人造肥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造营养、人造食品、人造动物，最后将是人造的男人和女人。”

霍华德奔泻的修辞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毕竟我们讨论的只是肥料而已，但这本书写在关于化肥的论战进入白热化之际，这场论战是由英国于1930与1940年代引进化学农业而引发的。这场争论被称为“腐殖质大辩论”，竟然于1943年将战火燃烧至英国上议院，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议院在这一年应该有更加紧迫的议题要讨论。但是，英国农

V



1

3

0



业部竭力推广新型肥料，而许多农民则抱怨说，由于使用新的肥料，他们的牧场和动物都不如从前健康强壮。霍华德及其盟友确信，“历史将证明（化学肥料）是降临在农业与人类身上的重大不幸之一”。他声称大规模使用人工肥料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使作物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并对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与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因为这些植物怎么可能比滋养它们的土壤更为健康呢？况且，因使用化肥而造成的短期收成剧增也不可能持久：由于化学品最终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今天的高收成不过是透支未来。

不用说，1940年代的这场腐殖质大辩论，以“氮磷钾心态”获胜收场。

霍华德已经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必须原路返回”，他在书中写道，这意味着抛弃利比希的遗产和工业化农业。“我们必须回到自然，去效法在森林中和草原上所看到的方式”。霍华德主张通过模仿自然来重新规划农场，他的呼吁并非只是个口号；他心中已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步骤，在《农业圣约书》开篇的一个段落中，他就清晰地勾勒出有机理想的轮廓：“大地母亲从未试图将农业与畜牧业分开；她对各种植物总是兼容并蓄；竭力保护土壤免遭侵蚀；种类混杂的动物的废弃物被转化为腐殖质，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废物；生长过程与腐败过程相互平衡；精心保存雨水；动植物均有保护自己免遭病害的机制。”

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每一种生物过程，都可在农场上找到与之对应的生命过程：动物可以像它们在野外生活时那样，以植物的废弃物为食；动物的粪便反过来又可滋养土壤；土壤的覆盖层可以像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层那样，保护裸露的土壤；堆肥像落叶层下充满活力的分解层一样，可以制造腐殖质。甚至病虫害也如它们在大自然中那样，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可以淘汰最弱的动植物，据霍华德预测，一旦这一淘汰系统运行正常，这类动植物的数量就会少得多。在霍华德看来，被工业化农业视为灾祸的病虫害，只不过是“自然的监测仪”，有助于农民“辨识不能适应的物种与不适于当地的农耕方法”。在一个健康的农场上，害虫的数量不应大于健康的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数量，这才应该是农业的标准。因此霍华德呼吁农民，将农场视为生物而不是机器。

师法自然的理念，与还原论科学的立场截然相反，后者将系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便认识其运作机制并对其进行处理——一次一个变项。以这种角度来看，霍华德的有机农业概念是前现代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他的理念是，我们无需了解腐殖质的工作原理，也无需知道堆肥的作用，就可以很好地对其加以利用。即使我们对土地这个肥沃的荒野一无所知（甚至把土地看作荒野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精心呵护。相反，对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保持一种健康的态度——甚至一种神秘感——可使我们避免走向过度简化与技术万能的境地。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有机农业时常遭受一种责难，认为它更像哲学，而不是科学。如果它真是哲学，这一非难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不过，有机农民为什么会极力为有机农业辩护，拒绝承认它不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谜，或许是科学拜物教的遗风所致，认为科学是应对自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在霍华德的思想中，效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优先于认识自然的科学。将鸭子和鱼放养于稻田中的稻农，也许并不懂得他所造成的这种共生关系——鸭子和鱼为稻子提供氮肥，同时把害虫吃掉——是什么。即便如此，他还是能从这种巧妙的混合栽种养殖中获得高收成。

支撑霍华德有机农业理念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变体，当然，这一哲学流派愿把一切有效的东西视为“真”。达尔文教导我们，实用主义——他称之为自然选择——实为大自然的本质，是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能生存者即有用。这正是为什么霍华德用了这么多时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研究小农经济的原因：这些最佳的农耕方式生命力持久，因为它们年复一年，从同一片土地上获取食物，却不让土地的养分枯竭。

在霍华德的农艺学中，科学主要是用来描述何为有效，以及为何有效的工具。碰巧的是，在霍华德的著作出版以来的岁月中，科学已经为他的许多不科学的主张提供了佐证：施用合成肥料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其营养成分低于使用堆肥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前者更易受病虫害的侵袭；混合栽种比单作生产力更高，而且更不易受病害侵袭；正如霍华德所宣称的那样，土壤、植物、动物、人类，甚至整个国家的健康，实际上彼此息息相关，根据经验，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也许我们尚未准备好按照这一认识行事，但我们明白，滥用土地的文明终将崩溃。

如果效仿自然系统的农场，运作起来真的像霍华德所说的那么好，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这样的农场呢？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由霍华德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有机理想，受到的尊重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尤其是随着有机农业越来越成功，开始进入超市并与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结盟，有机农业越来越像它原本试图取代的那个工业化系统。到目前为止，工业化逻辑比自然逻辑显得更具必然性。

V



1

3

2

从“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到沦为通用磨坊的子公司，喀斯喀特农场的经历，仿佛预示着这一进程的结局。几年前冬天的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卡恩开着一辆挂着“有机”特许车牌的崭新森林绿雷克萨斯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斯卡吉特河东岸，带我去看最初的农场。卡恩 50 多岁，一张娃娃脸十分惹人注目，若将现在不留胡子和多出 20 磅体重的因素考虑在内，不难从办公室里那些以胡子、汗珠和拖拉机抢眼的照片中，认出他的脸。在前往农场的路上，卡恩向我介绍了公司的历史，他坦率而且毫无遮掩地谈论



着从有机农场主到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家，一路走来所作出的各种妥协，还说到“任何事情最终都将回归正道”。

到 1970 年代后期，卡恩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有机农场主，而且还成为更为精明的商人。他发现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用冷冻的蓝浆果和草莓制成果酱）可增加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而且一旦喀斯喀特农场开始加工食品，卡恩便发现，与自己生产原料相比，从其他农场购买原料可以让他赚更多的钱——传统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很早以前就有了相同的发现。

“最初的‘合作社’模式，逐渐开始效仿工业体系的经营方式，”卡恩告诉我，“我们用柴油将食品运送到全国各地——我们变成了工业化有机农民。我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讲求实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提高私有化程度。”

1990 年，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在“丁酰肼恐慌”之后，卡恩几乎失去了一切——喀斯喀特农场的控制权也落入大公司手中。在有机运动的历史上，丁酰肼事件是个分水岭，经过阵痛，诞生了现代有机工业。纵观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每次发生公众对工业化食品感到极度担忧的情况之后，有机食品就会迎来一次高速增长期。有些评论家指责有机业一次又一次从“食品恐慌”事件中获益，尽管这一指责有几分道理，但这种不满应该指向有机食品，还是指向工业化食品，还有待商榷。有机农场主的回答是，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杀虫剂、食物中毒、转基因作物及疯牛病等事件，使公众从中“受到教育”，了解到什么是工业化食品体系，什么是其替代品。丁酰肼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 分钟新闻杂志”节目，措辞激烈地披露，果农在苹果种植中使用了丁酰肼，这是种在传统果园中广泛使用的生长阻滞剂，环境保护署已认定其为致癌物质，这次报道之后，美国中产阶级忽然发现了有机食品。“抢购有机食品”是当时一家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一夜之间，超市连锁店的需求剧增。然而，散兵游勇所组成的有机食品工业，尚未对其鼎盛时期做好准备。像许多有机食品生产者一样，卡恩大量融资来进行雄心勃勃的扩张，并与其他农场主签订合同，收购他们生产的大量有机产品——然后，在恐惧中眼睁睁地看着需求的泡沫，随着丁酰肼渐渐从媒体头条中消失而破灭。由于过度扩张，卡恩被迫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卖给韦尔奇公司 (Welch's)，于是，这位曾经的嬉皮士农场主，开始了他所谓的“公司奇遇记”。

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是食品工业的一部分。但是，我想突破现有格局，重新界定我们生产食品的方式——不是人们想吃什么，或我们分销食物的方式。这些肯定是不可以改变的。”成为食品工业的一部分，意味着放弃有机运动得以立足的最初三项原则中的两项：反过度烹饪食品——人们想吃的东西——还有食品合作社及其他替代分配模式。



卡恩确信，只要把有机食品基本定位为可利用现有营销渠道的缝隙市场产品，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稍作调整，就可适应有机运动的第一项原则——以新方法生产食物。正统的有机理念认为，此三要素不可分割，因为（如生态学所教导）万物皆关联。但卡恩是一个（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务实主义者，一个需要支付薪水的企业家。他不会踌躇不前。

“你可以为此悲伤难过，也可选择继续前行。我们曾经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合作型社区和地方性食物系统，但最终却失败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午餐而已。只是个吃饭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神圣的，可以谈论共进共享，但它就是一顿饭而已。”

● 小有机与大有机

1990年丁酰肼泡沫破灭后的几年中，有机工业逐渐恢复了元气，随着主流食品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有机食品（或至少认真对待有机市场），有机工业进入了一个每年两位数增长、企业间合并频发的时期。格伯（Gerber's）、亨氏（Heinz）、都乐（Dole）、康尼格拉（ConAgra）和ADM，这些公司都创立或并购了有机品牌。喀斯喀特农场自己也变为一家小型联合企业，它收购了加州有机番茄加工商缪尔格伦（Muir Glen），合并后的公司更名为小行星食品（Small Planet Foods）。1990年也是联邦政府开始认可有机农业的一年：国会于当年通过了“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此法案指示农业部——它历来公然蔑视有机农业——就有机食品与生产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对众说纷纭的有机一词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由于有机一词在市场上已成为一种神奇的魔力，有机运动内外的各种力量竞相争夺对它的控制权，结果为其定义的过程费时耗力，竟用了十年之久的时间。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竭力将其定义界定得尽可能宽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主流食品公司更容易进入有机领域，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一旦一个产品被视为不有机——例如转基因食品——它就会从此背上一个官方认可的污名。起初，美国农业部按其一贯的做法，再次照顾了农业集约经营者的利益，于1997年颁布了一系列不痛不痒的标准，这些标准——令人诧异地——允许在有机食品生产中使用转基因作物、辐照技术及下水道中的污泥。有些人认为，这是孟山都和ADM这类公司暗箱操作的结果，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农业部想当然地认定，有机产业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所需的规范越少越好。但是，有机行业毕竟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其内在构造中仍保留了许多有机运动的传统价值观，因而愤然反击如此软弱无力的标准。愤怒的有机农场主与消费者，发出了潮水般的指责，其汹涌之势，前所未有，迫使农业部重新制订标准，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有机原则的一个胜利。

然而，就在为了“有机”的定义与政府的博弈成为1997年媒体头条之时，美国农业部内部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同样重要的斗争，争议的焦点是大有机与小有机的定义——换



句话说，是有机工业与有机运动之间的争论——其结果显然更加含糊不清。工厂化农场算是有机的吗？有机奶牛是否必须在牧场上放养？在生产有机食品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加入食品添加剂与合成化学品？如果不假思索就能给出答案，说明你仍然执着于过时的田园有机观念。大有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赢得了胜利。最终颁布的标准，令人满意地为农业生产中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或许是官僚机构和食品工业界，在思想观念和时间上，所能承受的极限了，许多“有机”一词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也就是阿尔伯特·霍华德所表述的那些价值观——都被排除在联邦法规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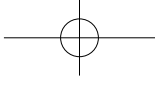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1992 年到 1997 年，卡恩效力于美国农业部的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在为有机套装电视便餐，及许多其他有机加工食品制订安全标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业绩非同小可，因为卡恩及其盟友必须对最初颁布于 1990 年的那部法案，设法做一些变通，那部法案严禁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各类制剂。卡恩认为，没有合成制品就无法生产有机加工食品，对于超市中所出售的产品来说，在其生产与保存过程中，合成制品都是必要的。标准委员会中的几位消费者代表则据理力争，认为这恰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合成制品就意味着没有有机电视便餐，那么有机产品根本就不应包括电视便餐。反过度烹饪这一概念本身已成问题。

琼·戴伊·古索 (Joan Dye Gussow)，一位营养学家，同时也是标准委员会中一位直言无忌的成员，在 1996 年一篇题为《有机指状甜糕可以获得有机认证吗？》的文章，抨击了合成制品，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在证明了这样的产品，按照拟议中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得到认证之后，古索提出了她的质疑：有机标准应该只是简单地反映食品供应现状，即那种高度加工、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还是应该追求某种更好的东西——以全营养食品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食品。卡恩以一种强调大众需求的平民主义市场观，来回应这一质疑：如果消费者需要指状甜糕，我们就应满足其要求。正如从喀斯喀特农场返回的路上，他对我所说的：“有机理念可不是你妈，用不着什么都听她的。”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传统有机运动与新型有机工业之间的一场争论，获胜的是新兴有机工业。最终的标准完全置 1990 年法案于不顾，列出了一个添加剂与合成制品清单，其范围从维生素 C 直到黄原胶⁴。

卡恩对我说：“如果在合成制品上失利，我们就从这个行业出局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最大的有机肉品与乳品生产商身上，他们也在努力争取使新标准对有机工业化农场有利。地平线有机农场的马克·雷茨罗夫 (Mark Retzliff) 不遗余力，力保其位于爱达荷州南部的公司——此公司是有机乳品业的微软，控制着一半以上的市场——作为大型工业化乳品厂的地位。在西部这片只能长一些被当做宝贝似的小草的荒原上，这家公司从几千头奶牛身上吸取乳汁，而这些奶牛整日挤在一个没有青草的围

⁴* 一位缅因州的蓝莓农场主亚瑟·哈维 (Arthur Harvey)，于 2003 年赢得了一场诉讼，迫使美国农业部遵守 1990 年法案的条文。之后，有机行业协会的游说者，于 2005 年成功地将相关表述塞入美国农业部的拨款预算案之中，恢复了——而且可能扩大了——有机工业在有机食品中使用合成制品的权力。原注。



TOPICS



话题

FOOD



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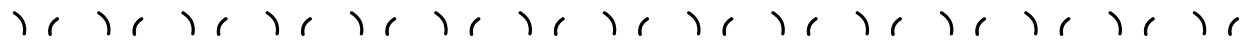
舍中兜圈子，而不是像大多数消费者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有机奶牛放牧于草场上。即使一家乳品厂真想把这么多乳牛放牧于草场，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一头奶牛至少需要一英亩草地，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每天早晚两次把这么多奶牛赶到遥远的草场，然后再把它们赶回挤奶场挤奶。所以，就像在典型的工业化乳品厂中一样，除了每天三次挤奶时间外，这些奶牛便整日站在圈中，嚼食谷物和青贮饲料。它们的有机饲料来自西部各地，而它们的排泄物则堆积于粪池中。雷茨罗夫辩解说，把牛关在圈内，意味着他那些带着听诊器的农场工人，可以更加密切地监控它们的健康状况。当然，只有生活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而且还不能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奶牛才需要这样的监控。

对于标准委员会中那些小型乳品经营者来说，这样的有机农场听起来与有机理念相去甚远，至于消费者代表的看法，更可想而知。而且，“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也规定，有机动物的福利应考虑并顺应它们的“天性”，对于这种进化而来的反刍动物来说，当然是指它们必须放牧于草场。你可能会说，生活在田园之中已成为这些动物难以更改的天性，是对其实施工业化养殖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工业化逻辑怎能指望赢得胜利呢？

美国农业部听取了两方的观点，最后作出裁定，奶牛必须享有“草场进入权”，这听起来似乎是田园理想的一场胜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施。“草场进入权”本身就是个极为模糊的标准（“进入”的含义如何界定？每头动物应拥有多大的草场？放牧的频率又是多少？）。而且，其效力还被另一条款进一步削弱，这一条款规定，在动物生命中的某些特定阶段，就连这种进入也可被免除。一些大型有机乳品厂，便将泌乳期自定为这种特殊阶段，而美国农业部至今也未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一些农业部的有机认证人员已有抱怨，认为“草场进入权”太过模糊而无实际意义——因而也无法执行。此观点的确难以辩驳。

“草场进入权”，以及对其它有机动物适用的“户外权”，加上政府允许使用的合成制品清单，表明“有机”一词已被曲解滥用，为它曾经批判并试图取代的那种工业化方式，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颁布的标准也验证了卡恩所言：“一切最终都将回归正道。”然而，有机一词中所蕴含的田园价值观和田园意象，仍然深藏于许多人的心中，对此有机食品经销商了如指掌：只要看看有机牛奶包装上那些快乐的奶牛和青翠的牧场，你就明白了。一个令人景仰的理念就这样被掏空，沦落为一个印刷在牛奶盒上的自欺欺人的梦幻：超市田园诗。■

※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杂食者的两难困境：人类饮食方式的发展进程》一书，迈克·波伦（Michael Pollan）著，毛刚译。获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经编辑。原著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由纽约企鹅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作者曾于2011年访问北京，接受《天南》文学双月刊采访，采访全文请查阅天南文学网站 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A g r i c u l t u r e

农

业





TOPICS



话题

AGRICULTURE



农业

世界各地的 社区支持农业

● 石 嫣 ●

● 社区支持农业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阶段。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CSA）是此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诸多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运作模式之一。

替代农产品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AAFNs）或者替代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Respatialization）和社会属性重构（Resocialization）的努力。替代食物体系一方面

V



1

3

8



与主流食物体系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有所区别,主要包括 CSA、农夫市场 (Farmers' Market)、消费者合作社 (Co-Ops)、观光农业 (Agri-Tourism),强调从生产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生态化和短链化。

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数量日渐庞大,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需求与主流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之间存在矛盾。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 (Rural Reconstruction) 思潮的兴起等因素成为世界范围内替代食物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动因。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 AFNs 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

CSA 中文译作社区 (社群) 支持农业,在英文里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对于社区的含义, Hillery G.A. 指出在生态学意义上,社区是一群互动的有机体,共同分享同一个居住环境。在人类社区中,意愿、资源、偏好、需求、风险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是相同的,影响参与者的个体认知以及凝聚力。在社会学上来看,社区的概念有很多讨论,一般来看,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 (区域)、经济要素 (经济生活)、社会要素 (社会交往) 以及社会心理要素 (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 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到 1950 年代中期,大约有 94 个对于社区不同的定义。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在美国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目前从事 CSA 的生产者都认为社区的含义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CSA 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

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CSA 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 (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 的关系。

CSA 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 1971 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 *Teikei* (日文





TOPICS



话题

AGRICULTURE



农业

原文为“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建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JOAA，日本有机农业协会，1993）。Teikei 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1986 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 CSA 农场（Henderson & Van En, 2007），如今的美国已经有近 3900 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localhavest.org），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罗宾·范·恩（Robyn Van En）总结它为“食品生产者 + 食品消费者 + 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 = CSA 和无数的可能性”。这个相互承诺的关系的精华在于：农场养育了人；人支持农场并分担内在的风险和潜在的收益。目前，CSA 已经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广泛开展，大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CSA 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达到本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影响因素和生产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 CSA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虽然其核心理念和兴起的背景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国的农业形态不同而模式有所区分。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态应该可以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大型农场国家，因其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空前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工业化，对应的则是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第二种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如欧盟国家，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 60% 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简称 GSP）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因此，CSA 这种需要高度信任与合作文化的模式在日本率先萌发，主要得益于综合农协形成了易于合作的农村组织结构；其次，欧盟的市民农业得益于市民社会成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 NGO 组织，作为中介，这些组织起到了连接城乡，连接市民与农民，连接消费和生产的作用；美国是大农场国家，其农业政策有利于大公司运作大农场以获取规模效益，而不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 CSA 的形成和发展较晚。

V



1

4

0



● 社区支持农业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

TOPICS



话题

AGRICULTURE



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最早于 1970 年代出现于日本，当时一些日本的消费者群体主动与生产有剩余的农户结合起来，并且彼此共担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也出现与此类似的形式。1985 年底，美国的第一个 CSA 农场开始筹备并于 1986 年开始运作。

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主要形态是由农场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其中约 20% 是由消费者主动发起的 CSA，由消费者组织起来寻找愿意参与的农户；另外一种就是由农户采用 CSA 的模式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 CSA 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但需要提前预付一年的费用，并与农场共担风险；在另一些 CSA 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 CSA 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一些农场的消费者几乎都需要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美国的 CSA 发轫于上世纪 80 年代，消费者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底层人群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化学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底层人群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趋势。CSA 之外，消费者合作社、农夫市集等替代食物体系（AFNs）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有 3000 多家农夫市集，与 CSA 相互配合发展的 NGO 组织开始涌现，如纽约市长岛的公平食物（Just Food），该组织的工作任务是介绍纽约市民加入就近的 CSA。甚至还演化出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Local Currency）。

Teikei（提携）于 1970 年代在日本出现，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 Box”，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至 2001 年，55% 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 Teikei 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包括主妇联盟）等组织有力促进了 Teikei 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连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结构，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

在欧洲，瑞士于 1970 年代成立了类似日本 Teikei 的农民——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 Cocagne）。德国于 1986 年建立了“托柯楠堡”（Topinambour），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1990 年代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农场给预订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于 1999 年开始为 100 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 Aarstiderne，这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 2004

V



1

4

1



年已经增长到 44000 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 CSA 叫做 GAS，1994 年建立了第一个 GAS，1996 年成立了 GAS 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 600 家 GAS。葡萄牙将 CSA 称为 Reciproco，其国内有 52 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 CSA 关系；法国将 CSA 称为 AMAP，第一家 AMAP 农场于 2001 年建立，40 位份额成员。2001 年 5 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 (Alliance Provence)，帮助其他农场形成 AMAP 的组织。2004 年，该地区有将近 100 个 AMAP，他们重新构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 AMAP 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2006 年参与的农场数量就达到了 300 个。现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 - 生态学家 - 消费者联盟” (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 支持 AMAP 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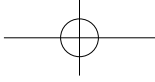
AMAP 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在经济和道德上与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则需要遵循有机农业耕作模式，致力于保证农场经济，生产方式和产品源的透明性。通过本土的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AMAP 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并促进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的多样性。

英国的土壤学会 (Soil Association) 研究结论认为 CSA 对农民和消费者都好处多多：“消费者可以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新鲜的食物，拥有机会重新和土地联系并影响他们生活的土地的面貌。CSA 传递了环境的收益，如较少的食物里程、较少的包装和生态敏感的耕作，并且看到了本地各具特色的食品生产的回归和地区食品生产及更高的就业率，更多的本土加工、本地消费和在社区中的金钱流通以促进当地的经济。”

● CSA 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进而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 2 亿，约占总人口的 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 40%。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2000 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逐渐爆发，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曝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寻解决的办法。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 2006 年发起的“购米包地”和 2007 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 (PCD) 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也开始在国内推动小农户做生态农业，其中包括：成都河流研究会从 2007 年开始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为出发点，号召



四川成都郫县安龙村村民转变化学农业种植方式为生态农业，几经波折形成了 9 户农民参与的生态农业种植小组，并以 CSA 的模式销售农产品；广西横县、贵州流芳村等乡村也在 NGO 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开始转向生态种植模式。2008 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体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替代食物体系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 80 多家 CSA；此外，还有 NGO、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农夫市集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依好农夫市集、南京原品农夫市集、常州大水牛有机农夫市集、广州有机农夫市集、成都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组织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北京市民有机考察组，北京消费者面对面，苏锡常健康消费考察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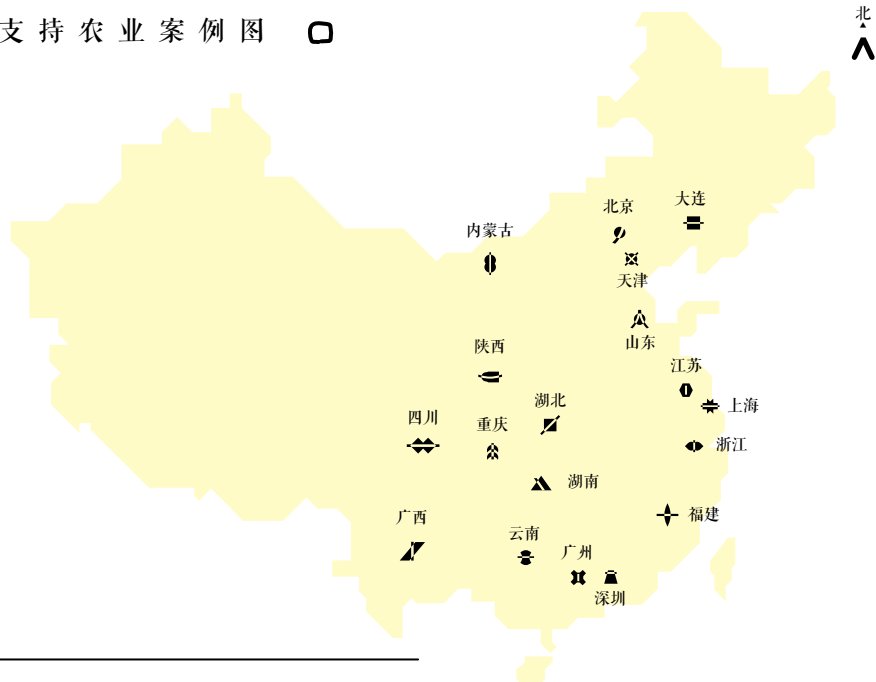
对这 80 多家 CSA 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 CSA，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全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南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 CSA 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 CSA，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芭芭等，在全国诸多 CSA 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 CSA 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 CSA，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多种形式推广 CSA；由 NGO 发起的 CSA，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 NGO 发起并操作的 CSA 案例还不多见，但是 NGO 在 CSA 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CSA 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 CSA，PCD 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贵州、北京的多家 CSA，NGO 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 CSA 运作起到积极作用；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 CSA，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由政府发起的 CSA，如浙江丽水

[illegible][illegible]



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案例图

- 蔬菜
- 水果
- 猪肉
- 羊肉
- 蛋禽
- 粮食
- 网购
- 餐饮
- 住宿



- 内蒙古原生态
- 白鹿原城乡互助
- 慈惠蔬菜园
- 拉图尔农园
- 绿心田生活汇
- 果园香猪
- 安龙村
- 园田环保农耕小组
- 合人初农场
- 爱农会土生良品
- 山水涅槃
- 双山自然农园
- 三岔谷物种植合作社
- 花木兰
- 昆明绿耕
- 昆明健康生活帮帮馆
- 城乡汇
- 绿耕
- 杨学斌
- 绿手指
- 虫剩山庄
- 乐圈圈体验农庄
- 农夫市集
- 深圳艾维塔
- 愚夫农庄

- 小毛驴生态农业园
- 国仁绿色联
- 天福园
- 耕年华
- 水木田
- 分享收获
- 众禾生态园
- 凤凰公社
- 德润屋
- 芳嘉园
- 自在农庄
- 大自然农场
- 活力有机菜
- 圣林
- 龙泉慈心有机农场
- 乐土市民农场
- 龙达绿色种植基地
- 日照美甜花园
- 原品农夫市集
- 阳澄湖悦丰岛农场
- 大水牛市民农园
- 农好农夫市集
- 上海菜园
- 丰地农场
- 喜乐农场
- 智耕农
- 上篱笆有机农场
- 榕树下市民农园
- 佳美农场



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促进城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贵阳市将倡导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写入地方性法规，有望让“替代”逐步融入“主流”，让更多的平民有机会享受健康食品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健康地生产。

广东南岭会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

南岭会是成立于 2007 年 1 月份的广东本土环保 NGO，最初以关注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生存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状况而走进了广东的天然屏障——南岭。他们曾多次进入当地做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生活方式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影响。南岭会发现，因为生存压力而破坏环境是当地居民无奈而为的主要原因。

目前，南岭会正积极尝试通过 CSA 的方式，希望联结乡村社群和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根据南岭各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在保护区内推广可保育土地的永续生态农业，鼓励当地农户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种植农作物，实现土地的永久可持续耕种。同时积极联系城市关注环境保护、关注健康生活的消费者直接购买这些地区出产的健康农产品并与农民直接建立联系，倡导他们转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和“公平购买”的消费体系，借此减少中间商对农户的盘剥，令他们有更合理的收入，减少他们对当地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和破坏，减少砍伐和盗猎的行为。

在南岭会的新浪博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机种植农户介绍和有机农产品的宣传文章。另外南岭会定期组织城市消费者下乡进行考察，建立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

成都郫县安龙村

从 2005 年底，由成都河流研究会实施的“成都府南河上游安龙村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开始在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启动，这个项目由成都市政府批示，在郫县县政府、安德镇政府、市水务局及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展开，环境专家及成都市各级政府希望在安龙村建立一种具有“生态效益、零污染”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让府南河水质得以改善。

成都河流研究会的工作和南岭会类似，一方面他们鼓励安龙村的农民种植有机蔬菜，另一方面他们帮助一部分感兴趣的消费者先到村里亲身体验有机农耕，增加对生态化蔬菜种植以及农户的了解后再决定订菜。希望有机种植不仅为农户带来收益，为市民带来健康食品，也有利于河流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illegible]

2010年3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南马庄启动“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项目,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消费群体与农民合作社在生态农业方面的对接,同时总结分析南马庄在实践中面临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广其中的成功经验。2010年4月,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借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运作经验,开展了市民多功能生态农园项目建设。项目计划占地面积53亩地,其

农业

7



中拟种植 20 亩有机蔬菜，2-3 亩果树，供市民前来观赏采摘；拟建设 8 个猪圈，2 个沼气池，1 个市民休闲庭院。

南马庄合作型生态农业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其成长路径，即在政府和知识分子干预下村庄形成了村两委兼合作社+村民和社员的良性治理结构，在外部力量的引导和资源注入下，经济发展合作社成为村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向生态农业，由无公害过渡到了有机，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分享收获 CSA

。 。 。 。 。 。 。

“分享收获”是清华大学社区食品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合作基地，是由一群热爱农业、希望推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于 2012 年 5 月创办的社会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分享收获试图探索出一条食品安全的解决之道，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消费运动推动市民重新认识乡村，进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分享收获”采用和农户、合作社或者小型农场直接合作的方式，与合作主体协商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分享收获和农户都是参与决策的主体，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保证生态种植的方式和基本运营成本。分享收获的使命就是组织并服务于农民和消费者，同时促进双方的公平与信任，使农民的健康产出不再经过过多的中间环节，直接到达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

目前，尽管只有一年的发展时间，“分享收获”已经有四百多位会员，团队的年轻人有 20 多人，他们都工作和生活在村庄中，并逐步开始建立与村庄内部的互动关系，同时，“分享收获”由开始的一个基地发展到三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从目前来看，“分享收获”的 CSA 理念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事关乡村社会的建设；其二，事关消费者联合；其三，事关可持续理念的践行和宣传。■

※ 延伸阅读：《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修订版）》，伊丽莎白·亨德森和罗宾·范·恩合著，石嫣、程存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英文原版 Elizabeth Henderson and Robyn Van En,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2nd Edi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7。

△ Robin Allison

出生于 1950 年代，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建筑学学士，地歌生态社区创始人。

△ Candace Bagnall

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艺术系，猿人社区参与者之一。

△ Kerry Francis

建筑师，地力提取公社创始人之一，现任教于新西兰奥克兰联合理工学院。

△ John Glasgow

摄影师，生于 1945 年，毕业于新西兰尼尔森学院和坎特伯雷大学，复兴社区参与者之一。

△ 黄宁

生于 1971 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 Robert Jenkin

生于 1951 年，虹谷社区参与者之一，新西兰梅西大学硕士，新西兰理想社区历史研究者。

△ Carol Parkinson-Jones

虹谷社区参与者之一。

△ Olive Jones

复兴社区参与者之一，新西兰 Waikato 大学博士，新西兰理想社区历史研究者。

△ Simon Jones

虹谷社区参与者之一。

△ 欧宁

生于 1969 年，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碧山计划发起人，《天南》文学双月刊和本书主编。

△ Michael Pollan

美国作家、记者，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学院教授，著有多本关于食物安全的书，《纽约时报书评》曾称他为“酷爱美食的自由知识分子”。

△ John Ringer

平面设计师，出生于 1950 年，新西兰早期另类社区参与者。

△ Malcolm Rands

Mamaki 生态村创始人，环保家居清洁和身体护理品牌 ecostore 创始人。

△ 石嫣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曾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建，现为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 (URGENCI) 副主席，分享收获 CSA 创始人。

△ 徐轶婧

生于 1985 年，毕业于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建筑师。本次新西兰另类社区实地调研参与者。

△ 姚欣

从事金融业，现居上海。

△ 赵婷

媒体研究者和自由写作者，现居巴黎。

△ 赵雪

曾任《金融时报》英文记者，现在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 周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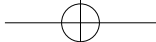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在读。

△ 朱锐

生于 1982 年，摄影师。本次新西兰另类社区实地调研参与者。

△ 朱喆

上海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毕业，曾参与翻译 Mark McGurl《创意写作的兴起》一书，现供职于《天南》文学双月刊和本书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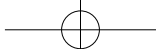


ACKNOWLEDGMENTS 鸣谢

本书深度报道得到以下人士、机构和社区的鼎力相助，特此表示感谢：

- 侯瀚如
- Louise Pether
- Jaenine Parkinson
- Meg Nicoll
- Eloise Veber
- Rick Pearson
- Jun Tsujimoto
- Ross & Sally Gaddes
- Mark Leong
- Celia Goldsmith
- 黄宁
- Robin Allison & Amanda Garland
- Robert Jenkin & Anne Taylor
- Bill(William) & Robyn Holloway
- Simon & Carol Parkinson-Jones
- Dufour Carole & Garnier Stephane
- John Ringer & Candace Bagnall
- Malcolm & Melanie Rands
- Kerry Francis
- John Glasgow
- Olive Jones

- 第5届奥克兰三年展
The 5th Auckland Triennial
-
- 奥克兰美术馆
Auckland Art Gallery
-
- 奥克兰理工大学
AUT University
-
-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
- 地歌社区
Earthsong Eco-Neighbourhood
-
- 虹谷社区
Rainbow Valley Community
-
- 河岸社区
Riverside Community
-
- 天空之城奥克兰社区信托基金
Skycity Auckland Community Trus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V·ECO·回归土地 / 欧宁主编.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53-1789-2

I. ① V… II. ①欧… III. ①环境保护—丛刊 IV. ① X-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8704 号

V·ECO·回归土地

V·ECO·GO BUSH!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100708)

网址: [http://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马惠敏

设计: 小马·橙子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87mm × 1092mm 1 / 16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978-7-5153-1789-2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